

聲

同



氣

同

鄧芝珊、伍詠欣 著

香港年長女同志口述史

	推薦語		ix
代序一	不願帶着遺憾到遠方	文／黃淑嫻	xiii
代序二	酷兒女性生存指南	文／盧好	xix
前言	文／鄧芝珊		xxiii
故事一	現代李後主：三個人的探戈		5
故事二	戀愛腦狂熱：獨居三十年只怕這輩子未曾被愛		37
論文一	渴望與等待：以亞際取徑探討年長女同志與 雙性戀女性的愛與親密關係		71
故事三	The GAYLINK：下一世，我要做 Gay Man		99
論文二	都市密度中的日常情慾：香港年長女同志與 雙性戀女性民族誌		119
故事四	50+ 求愛記：趕上千禧同運列車 由 ICQ 搭到 Les Peches		151
故事五	愛情長跑三十六年：秘訣是 No Comment		183
論文三	唔夠 Man！田野現場的亞洲酷兒陽剛特質 文／鄧詩薇、鄧芝珊		207

故事一 現代李後主：三個人的探戈

阿安今年六十六歲，1958年於香港出生。成長於粵劇風靡一時的年代，任劍輝與白雪仙的感情啟蒙她遊走於兩性之間談情。阿安曾任職紀律部隊，體會過當中的文化與禁忌。這些年，阿安經歷過好幾段戀情，她曾感嘆：「我們這一類感情，好多披荊斬棘；但是解決眾多困難之後，已經接近分手。」過去十七年，她一直與一名有夫之婦維持戀情；最近，一段三角關係逐漸演變成兩段三角關係。

在天台的操場上，一位短髮女生正在與幾名男生對峙。那位女生梳花旗裝，看起來相當英氣，身後站着一個矮小的女同學。

「剛才是誰講粗口欺負她？」女生大聲吆喝。

一位小男生趨前說：「開玩笑而已，何必認真？」

「就是你吧？」女生舉手揮拳，男生差點閃不開，二人扭作一團，在地上打滾。圍觀的男孩們起哄，直到老師趕來，平息紛爭。

女生回到家中，媽媽見她鼻青目腫，見怪不怪，只勸了一句：「阿安，別老是與男生打架。」

這句話像一陣風，來不及飄到阿安的耳邊，已經跌入大氣電波的粵曲之中。

旦唱：「相擁抱，」

生唱：「相偎傍，」

合唱：「雙枝有樹透露帝女香。」

生唱：「帝女花，」

旦唱：「長伴有心郎，」

合唱：「夫妻死去與樹也同模樣。」

阿安隨着音樂哼唱，這是媽媽喜歡的戲寶。她記得媽媽說過，男女主角都是由女人飾演，一個叫任劍輝，一個叫白雪仙，她們又叫「任白」。二人感情要好，表演動人，擁有很多戲迷。

任白啓蒙 遊走於兩性之間談情

1971年，阿安理應要升中一，但是全校只有三人獲得派位，她並非其中之一。阿安就讀的天台學校由基督教團體營運，屬於私校，學費由每月一元起，校方會提供免費校服、書簿以及膳食，旨在為基層學童提供基礎教育，不過師生質素也相對參差。¹

1 香港在1841年開埠之後，只有極少數官辦學校，其餘都是由慈善團體、教會、社團或私人營辦。二戰結束後，香港人口開始增加，加上1950年代因政局動盪，大量移民從大陸湧至香港，香港出現房屋荒及教育荒。1953年12月，石硤尾木屋區發生大火，五萬多名災民無家可歸，促使港英政府改革房屋政策，加快興建徙置大廈及廉租屋。大量基層家庭入住徙置大廈之後，各個團體申請利用天台開辦學校，為失學兒童提供基礎教育。徙置大廈以H型及日型設計為主，天台學校設於天台兩翼，有時甚至兩校各佔一翼，中間就是操場，是學生小息以及上體育課的地方。學校也會租用大廈七樓的單位，設置校長室、辦事處及教員室。與此同時，由於英國的工黨政府推行「教育機會均等」政策，加上香港社會多年來要求港英政府增加教育投資，當局也於五十年代開始增設中小學、訓練教師及改善私校教員待遇，並於1971年開始實施免費小學教育，1978年推行至中學。

參考資料：麥肖玲、方駿，〈1930-1950年代香港基礎教育的發展與挑戰：中文剪報鉤沉〉，《基礎教育學報》第16卷第2期（2007）。香港中文大學，「從天台學校到後千禧學校：戰後香港學校建築的演變」展覽。香港教育學院主辦，香港教育博物館籌劃，2001。

由於當時的中學學位仍然短缺，²不少學生因為家貧或成績不夠好而未能升學。³就像阿安最後考上了利瑪竇私立中學，但是父親拒絕支付學費。

自小學開始，阿安不時跟媽媽到蠟燭工廠做幫工。老闆見她眼明手快，有時也會着她放學後去做件工。其他包裝工人做足全日才賺九元，她從兩點做到六點半，已經賺到十一元。於是，阿安由中一開始半工讀，直到工廠在中二學期末倒閉為止。即使只是做收入最低的雜工，⁴她也成功在短短兩年儲夠學費讀到中五畢業，並且有餘裕購買自己喜歡的食物，甚至豪氣請同學一起吃，以至後來還可以與暗戀的女同學在中三、中四拍拖行街。

媽媽看在眼內，總是勸說：「你跟那個誰這麼要好？她們不會鍾意你一世的，到最後你都是孤伶伶。」

2 港英政府於1971年宣佈實施免費小學教育，所有官立及資助小學一律免收學費。然而，根據1971年的《香港年報》，政府、補助及津貼學校共收生逾七十萬人，但是私立學校的學生人數仍然高達五十六萬七千多人，免費教育尚未完全普及。

3 根據1971年的《香港年報》，小學的學生人數高達764,313人，中學學生人數卻只得295,820人。換言之，當時只有大約三份一的小學生能夠升讀中學。

4 根據1971年的《香港年報》，製造工業中也有日薪工人，但是大部份半熟練工人與雜工皆為按件計酬，每日工資如下：熟練工人由十元八角至四十一元，半熟練工人由八元至三十元二角，雜工則由七元三角至十九元二角。

兩年後，為了專心準備中五會考，也或許是厭倦了（愛哭的）女朋友，阿安提出分手。畢業後，媽媽見女兒未有再拍拖，心急如焚，拜託經常出埠的好姊妹為女兒介紹好人家相親。

有一天，媽媽帶着阿安來到石門河畔花園旁邊的麗豪酒店。剛步入中菜廳，就有一位外國大爺招呼她們坐下，豪氣地說：「只要你的女兒嫁我，回去紐西蘭就有餐館，還有一層樓。」

阿安心想：「阿媽，你是傻了嗎？覺得甚麼人都可以試一試？」

到底是怎樣的人才對得上阿安的口胃？她在粵劇之中找到答案。

1976年1月30日，《帝女花》從舞台搬上電影銀幕，⁵ 上映之時吸引大批戲迷支持，風頭一時無兩，也點燃了阿安的粵劇魂。當時任白已經息影，主演的龍劍笙與梅雪詩是二人栽培的徒弟。就像大部份戲迷，阿安也發現了任白演出中的火花，絕非其他生旦能媲美。阿安開始沉迷任白之間的感情，愈是了解，愈是欣賞二人對彼此的堅貞，甚至渴望成為她們的徒弟，在粵曲之中尋找「非主流」的一片天。

5 電影《帝女花》由吳宇森執導，由雛鳳鳴劇團龍劍笙（阿創）及梅雪詩（阿嗲）主演，另有大老倌靚次伯及梁醒波參演。



那段日子，阿安剛畢業，一心想投考紀律部隊，但是未夠歲數，又未找到其他工作，閒着沒事，很快成為追星族，跟出跟入接機送機，相當神心。幾個月後，一間運輸公司聘請她做會計文員，追星熱才漸漸減退。

1978年1月，阿安考入訓練學校。受訓期間，她暗戀一位Madam。

「對方這麼高級，怎麼可能？別想了。」同班同學相勸。

一段可能可歌可泣的愛情故事，尚未開始已經結束。暗戀來得快，去得也快，阿安沒多久便與另一位師姐結下情緣。正式拍拖並不代表長久，同年六月從訓練學校畢業，對方在幾個月後就提出分手，說是要去識男人結婚。

閒着沒拖拍，愛車的阿安決定學車。一天，她站在新蒲崗麗宮戲院⁶的門口等候教車師傅，一輛紅色私家車停下，旋即吸引眾人目光。那輛車，一開賣就被搶購一空，正是電視劇《家變》主角汪明荃的座駕，同款同色的Honda Accord。

6 麗宮戲院（Paris Theatre）於1966年8月25日開幕，座位多達三千，號稱全港最大的戲院；收費平民化，正場票價由五毫至一元七角不等，五點半公餘場票價低至四毫、七毫及一元。戲院於1992年3月結業，拆卸後重建成越秀廣場。〈香港史上最大戲院是？〉，《on.cc 東網生活版》，2018年12月12日，https://hk.on.cc/hk/bkn/cnt/lifestyle/20181012/bkn-20181012080007913-1012_00982_001.html。

阿安定睛細看，發現司機是之前在運輸公司認識的同事「雞佬」。接下來的日子，雞佬經常載阿安遊山玩水：去深水埗食冰凍西瓜，去旺角永合隆飯店食燒鵝腿，去海洋公園、去行山燒烤……二人相處時非常規矩，拖手已經是最親密的行為。

一年之後，比她年長六歲的雞佬多番暗示明示想結婚。不吸煙，不講粗口，不賭錢，不太飲酒——雞佬其實完全符合阿安想像的「好男人」形象。雞佬雖然做運輸，月入卻高達四、五千元；阿安雖說是公務員，月薪也只得1,360元。

可是，愛情不是性價比，沒有規格可依，也沒有清單可填。

「不是吧？我才二十一歲，這麼快就要結婚？」驚恐之下，阿安一下子斷絕所有聯絡。當時的聯絡方法只有家居電話，媽媽化身接線生之後，阿安成功「失蹤」半年，「和平」分手。

「回想起來都覺得自己幾衰，他算是男朋友吧——阿媽都覺得他是我的男朋友。」阿安呷了一口1664啤酒，「要不是你問起，我也差點忘掉了這一段愛情，是（跟）男人（在一起），不是女人。」

適逢訓練學校有新一批畢業生，阿安也不愁寂寞，很快遇上一位師妹，彼此相當投契，經常一起去酒吧聽歌，酒醉三分之時，也會親吻一下。拖拉一年之後，即使阿安已經認識對方

的家長，有時還會留宿過夜，但是一切止乎於禮，她們仍然停留在朋友以上、戀人未滿的狀態。

後來，阿安換了新崗位，同時換了一個新對象。這一次，阿安不止與對方同居，還與她的家人共住，而且更進一步，在睡床上開展親密關係。

那一刻，問題來臨。

「原來她也是 TB。」憶述至此，阿安哭笑不得。「我們在外表上都比較中性，沒有分得很清，但是 TB 與 TBG，在相處上一定是有不同方式，親熱……也不太一樣，有一點距離。」

那一點距離，可能是一對情侶之間最遙遠的距離，兩人的關係維持兩年便告終。

紀律部隊的文化與禁忌

當時正值 1980 年代，香港社會仍然視同性戀為禁忌，為何在部隊內外，阿安談情說愛似乎毫無障礙？

「我現在將當年發生的事情講出來，並不代表當年我會將自己的事情周圍跟人講。」阿安說。

那時候，別人問她是不是同性戀，阿安只會一笑置之，有時最多加一句「要不，你猜一猜？」

「我從不怕是非謠言，所以不會說是，也不會說不是。你認為我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阿安採取模稜兩可的態度，但是她從來不會表現閃縮。「別人知道你驚，不就會以此攻擊你嗎？你只會更容易被打壓。」

問題是，就算阿安表現得無畏無懼，並不代表別人不會仗勢凌人。「紀律部隊自命最 open、最開放，一定不會明碼實價說明『我歧視你』。不過，隊內有無不喜歡？大家心照。」阿安說。

入職之時，阿安只是最低級的職位，她先後遇過兩位上級，同屬督導，一攀一直，一先一後，不約而同打壓她。第一個是阿安口中的老 TB，講到明不喜歡她；另一個就人所皆知，她不接受同志。她們毫不掩飾，態度完全反映在阿安的年度工作表現評核報告。連續兩年，即使阿安平日小心翼翼行事，從無出錯，成績都只是僅僅合格。

紀律部隊講究階級，阿安知道自己只能肉隨砧板上。為了求生，她申請調職。住在九龍，駐守九龍，她卻請纓入上水，務求盡快調走。

歧視、投訴、機制——無論是當年還是今日，這些字詞仍然只是字詞，實際作用不大。

「投訴只是最後手段。」即使各個紀律部隊現時都設有相關機制，她認為只有逼不得已才會投訴。「人生有好多方法，找不到方法可能說明你的方法比較有限，錯過了其他機緣，結果只能做到最盡。」

這番說話由曾是受害者的阿安說出來，難免令人遺憾。

回顧多年紀律部隊生涯，阿安只數得出兩位女長官是會穿西裝、帶同女朋友出席工作場合。二人一入職就是督導，後來更晉升至總指揮級別。阿安私下也認識一些同僚，擔心公開性取向會影響前途，即使做到很高級也是深藏不露。她估計，部隊中至少有百份之十至十五是女同志，但是她不肯定男性之中男同志的比例。

「基呢……通常都是自己埋堆，好神秘，直到現在都不會公開講，我也沒有認識幾多個。」阿安說。

當年，男男性行為在香港仍然是刑事罪行。阿安於1978年6月從訓練學校畢業，兩個月後，一名歐籍男士因犯同性戀罪被捕，被判罪名成立。警隊因此案發現若干證據，遂成立「特別調查小組」，調查與同性戀有關的賣淫活動，像介紹和利用青少年賣淫的非法行為。

蘇格蘭籍幫辦麥樂倫（John MacLennan）被舉報後，警務處將他革職。麥樂倫因此向杜葉錫恩議員投訴，此事驚動港督麥理浩，警務處批准他復職，但是小組仍然繼續調查，並於1980年1月決定檢控他。然而，小組於1月15日前往拘捕時，發現他被反鎖於警察宿舍內，而且身中五槍，已經身亡。

一個多月後，死因裁判官與陪審團開展死因研訊，裁定麥氏「死因不明」，律政司其後發表新聞稿，表示有充份證據證明麥樂倫是自殺，說法引起社會輿論。政府於1980年7月8日委任最高法院原訟庭按察司楊鐵樑獨自調查，一年後發表報告書，結論仍然是「麥樂倫死於自殺」。⁷

雖然麥樂倫事件促使政府成立「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檢討同性戀行為的法律，但是相關報告書要待1983年4月15日才發表。⁸

7 1983年發表的《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研究報告書：有關同性戀行為之法律》的第五章論及「現代香港的同性戀問題」，結語開首曾引述1981年發表的《麥樂倫事件調查委員會報告書》，第32頁第38段：「麥樂倫只是一個平凡的人。倘若這些不幸事件從未發生，他可能會優悠地過活，不為人知。他稱不上完人，卻也不是社會的渣滓。像常人一樣，他有優點，也有缺點。他不是一個特殊的人物，對性的癖好也沒有甚麼特別，很多人也具有同樣癖好。」

8 報告於1983年建議非刑事化男同性性行，但是政府直到1988年6月才展開諮詢，公佈一份名為《有關同性戀罪行的法律應否修改？》的諮詢文件。政府於1990年在立法局動議，成年男子在彼此同意下進行性行為不再違法，法定年齡定為二十一歲，立法局於1991年通過非刑事化法案。2004年，當時二十歲的男同志梁威廉就有關條例提出司法覆核，高等法院於2005年裁定勝訴，認為法例規定二十一歲以下男同性戀者在彼此同意下肛交屬於違法，但是異性戀在彼此同意下肛交，只有男方會遭受檢控，直接顯示男同性戀者受到不同對待，屬於歧視。法官又指出，異性戀者及女同性戀者只要年滿十六歲便

紀律部隊之中，警察人數最多，同志人數也相對更多，麥樂倫事件令整個同志界為之震憾。「事件發生於警隊，當時我只是新人，職級又低，所以對事件沒有太大感覺。」不過阿安也記得，此事成為同僚之間茶餘飯後的話題，有人猜測麥樂倫是被滅口。⁹ 可想而知，阿安入職首兩年，紀律部隊對於同性戀，尤其是男同志，取態仍然相當保守。

早於1990年，英國警隊已經成立同志員工協會，現已發展成全國組織。假如當時任職的部隊也有類似的協會，阿安會否參加？

「我會。」阿安沒有多想，「就算回到八十年代，我覺得當年的我也會參加。既然有人膽敢牽頭，我當然要支持，不然就更加沒有人爭取你的福利。」可惜，阿安當年只能靠自己。調

可進行性行為，但是男同性戀者唯一的性行為方式是肛交，法例變相歧視男同性戀者。終審法院於2007年駁回律政司上訴，裁定條例歧視同男同志，違反《基本法》及《人權法》內人人平等的原則，條例確實違憲。然而，政府直到2014年才正式修例，將男同性戀者合法肛交的年齡下調至十六歲，與「與年齡在十六歲以下的女童性交」屬非法一例看齊。法律改革委員會於2016年發表諮詢文件，並於2019年發表《檢討實質的性罪行》報告書，建議「同意性行為」的年齡劃一為十六歲，且不論性別和性傾向均適用，並廢除男子與二十一歲以下女童異性肛交的限制，以及廢除一些關乎同性的罪行。

9 科利特（Nigel Collett）多年來追查涉事檔案，檔案大部份來自英國檔案館及杜葉錫恩留下的文字記錄。科利特亦訪問了多位前警官和同性戀圈子中人，重新檢視麥樂倫案的交際活動、性傾向和香港當年的同性戀非法活動。科利特的結論認為，因為麥樂倫看過一些同性戀高級警官的資料，警方高層為掩蓋警隊內的同性戀醜聞，乃向麥樂倫施壓，最後還要與同性戀有關的罪名起訴他，麥樂倫為避免出庭成為被告，被迫自我毀滅。見 Nigel Collett, *A Death in Hong Kong: The MacLennan Case of 1980 and the Suppression of a Scandal*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18).

職至上水兩年後，她開始明白只要自己的職級愈高，別人的面色就愈好。「只要離開最底層，自身有一定影響力，別人對你有不滿也會收起來。」

阿安自知英文程度不足，有礙仕途，於是自1982年開始在工餘時間進修英文。她在英文班有兩個收穫：第一個收穫是結識了女朋友，第二個收穫是在一年後獲晉升為隊目。可是，無論是談戀愛還是拼事業，阿安在兩場探戈之中都變成了「第三者」。

這邊廂，阿安發現女朋友一直與前男友藕斷絲連，甚至已經談婚論嫁；那邊廂，已婚男上司屢獻殷勤，多番暗示喜歡她。阿安一方面要狠下心與女朋友斬纜，另一方面又要婉拒有婦之夫的非份之想。

沒想到，失戀只是一時三刻，失勢卻要賠上一年半載。

那一年，阿安本應獲推薦參加高級隊目的面試，然而負責寫報告的男上司因為佔不了便宜，心生不忿，表示會推薦另一位女下屬，還羅列一堆冠冕堂皇的理由。結果，阿安要待調職之後，改由另一位上司推薦，才於1985年升職。

女友結婚了 還要做姐妹

調職之後，阿安重遇當初在訓練學校暗戀的 Madam。經過六年洗禮，阿安榮升高級隊目，地位與 Madam 足夠匹配。兩

人互生情愫之後，阿安才發現，當日勸退她不要高攀的同學，原來一直都是 Madam 的愛人。「不過，將仰慕的人變成身邊的人，原來會痛苦到不得了。」阿安感嘆。

開始真正相處之後，阿安發現二人在生活各方面都合不來，「在床上亦然——我不怕直接說。」拍拖期間，Madam 與前度一直保持聯絡，前度的母親也視 Madam 為契女。「再見亦是朋友」本來不是問題，但是前度一家後來要去美國生活，Madam 堅持陪同前往，期間還不准阿安電話聯繫。莫名其妙變成「第三者」，阿安向 Madam 坦言如此一別等於分手，但 Madam 仍然執意離開。

回復單身不要緊，外面的世界依然精彩。阿安很快就與一位酒廊歌手「好上了」。唱粵曲是阿安與歌手媽媽的共同興趣，阿安因此常常到訪她的家，有時還會過夜，與她的家人相當熟絡。

一開始，二人一拍即合，但是阿安心裡知道，二人一拍就會散。

「第一，她靚女；第二，男人見到她都像蒼蠅般撲過去。敵人這麼多，雙拳難敵四手。」阿安歎氣，「她知道我想長長久久，但是她也知道自己不可以長長久久。」當時她們還未到三十歲，女友是家中的大女兒，家人希望她嫁個好人家，只是一直將說話放在心底。

阿安預計女友遲早會結婚，也預計二人遲早要分手，但熱戀中的她說服自己活在當下，將「遲早」想像成「可能」。然而，為了減低日後的傷心程度，她也先做好期望管理。

「你識到男仔不緊要，我不會生氣。我只想你帶給我見面，好讓我幫忙給意見。」

兩年後，女友也真的遇上了一位男生。三人第一次見面，一起去長洲。在海灘，女友問阿安：「他好不好？」

「他始終比你年輕，將來你走下坡的時候，你要有心理預備，就像我與你一起要有心理預備一樣。」

大婚之日，阿安穿上裙子做姐妹，送女友出嫁，沒有表現一丁點傷心。

「傷心，或多或少一定有，但是我不想表現出來，不想她有壓力。」阿安說：「真正鍾意一個人，會將對方的福祉擺最先——我是舊式人，愛人就是這樣。」

披荊斬棘 育成已近分手

阿安與歌手女友拍拖這段日子，其實仍與 Madam 糾纏不清。Madam 與前度復合不果，回港後又發現阿安另結新歡，心有不甘，只要阿安一提分手或搬走就要生要死，關係糾纏接

近十年。直到阿安在1995年升職做幫辦，首次置業後才正式與Madam分居。

1994年，阿安開始在訓練學校教班，班上的風氣與1980年代相比，已變得更加開放。訓練學校的學生不但互相喜歡，也會互撬牆腳，從自己班玩到隔離班；還未畢業，伴侶已經轉了又轉，而且男女通吃。阿安看在眼中，覺得部份學生可能只是對同性戀好奇，「並非對真愛有追求與領悟，不是我們那一種（按：女同志）。」她自言對於每一份感情都是以一生一世為前提，只是並非人人能夠配合，結果不盡人意。

作為學生眼中的Madam，阿安自然難逃狂蜂浪蝶追趕，有好幾名學生曾向她表白，但都被她嚴詞拒絕。「她們當下會覺得我好有型，但是到她們四十歲的時候，我已經六十歲，到時不又會嫌棄我嗎？」

升職後，阿安認識了一位同期入職做幫辦的新同事。她不時向阿安請教，阿安也樂於給建議，甚至出手相助，幫她解決困難。這位新同事才二十五歲，年齡雖然比訓練學校的學生大一點，但是與阿安還是相差十一年，何以阿安又願意跳入愛河？「感覺上有點像湊細路，我想做保護她的角色，我亦的確在事業上協助她成熟。」阿安還為她寫下了人生第一份遺囑，「我覺得，與她一起，我是有價值。」

二人交往之時，對方的父母其實不太接受。直到有一次，對方的哥哥發生意外，阿安動用了自己的人脈幫忙，期間又擔當司機，接送她的家人出入醫院。女友的父親自此對阿安改觀，阿安也終於可以自由出入女友的家，可以與她的家人同枱吃飯。

「我發覺我們這一類感情，好多披荊斬棘；但是解決眾多困難之後，已經接近分手。」阿安無奈說。

2001年，女友升職高級幫辦，與阿安同級。當時，連同阿安在內，部門內有六、七個女幫辦比較投契，又有共同嗜好，每星期都會相約「大快活」，有時去酒吧，有時索性留在家，痛飲暢玩。慢慢地，阿安發現只要其中一位 TB 在場，女友就會特別開心。那位 TB 笑起來像有四條眉毛，口甜舌滑，年輕有型又玩得，阿安知道自己被比下去了。

「其實拍拖三年之後，她已經不像以前那麼乖。」阿安感嘆：「即是沒有那麼純，不再事事問你，始終工作上軌道，開始在公在私都與我對着幹。」可能因為當日仰慕阿安的東西也自己做到了，可能因為二人一起已經五年了，可能純粹感覺悶了——女友對這位 TB 的愛慕愈發明顯，一見面就全都寫在臉上，只是一直未向阿安坦白。

那夜，凌晨兩點，大伙兒仍在唱卡拉 OK，阿安已經喝到忘記自己喝了多少杯。藉着酒意，阿安決定攤牌。

「我放你走，你們兩個在一起吧。」

眾目睽睽之下，二人手牽手離開房間。

阿安尚餘三分清醒，待至大門關上那一刻，她開始哭，哭得不能自己，哭了個多小時。

「這是唯一一次，我喊得如此淒涼。」阿安說：「因為感觸，感觸自己估計的事情發生了。」

然而，冷靜過後，阿安卻跟女友說：「如果你們分開了，到時就回來吧。」

為甚麼如此大方？「因為當時未有其他對象——我很坦白。」阿安說：「始終大家都有五年感情，就算她有所改變，亦非變到我不能接受。倒不如讓她放心去玩，至少她之後失戀受傷，也不至於兩頭不到岸。」

不出三個月，女友與新對象的戀火就燃燒殆盡。不過，女友沒有靠岸，失戀換來了自由，她放生了自己，也放生了阿安。

踏入千禧年，互聯網興起。阿安雖然不諳電腦，但是她的學生緊貼潮流，還幫她註冊電郵戶口，介紹她使用網上聊天室。阿安發現一位網友常用英文寫愛情詩，文筆相當好，她決定以文會友，將對方詩句以中文重寫一次。網上傳情幾個月之後，二人相約見面，地點是銅鑼灣利舞台的皇后飯店。

那一天，阿安穿了一件風褸，就像《英雄本色》的 Mark 哥。沒料到，寫詩的網友原來會騎電單車，甚為有型地拿着一個頭盔進來。同行的朋友對阿安說：「喂，她看上去像一個 TB，啱唔啱你㗎？」

「今日回想都覺得好笑。」阿安說：「她是第一個與我真正同居的女友。」二人雖然各有一間屋，但是彼此的住所都有對方的生活痕跡。阿安開的平治房車，是女友贈送；女友騎的珍珠白 Vespa 綿羊仔，是阿安相贈。阿安裝修住所需要現金周轉，女友二話不說借她二十萬元；女友想盡快完成住所供款，阿安也回敬二十萬元，還為她訂造全屋傢俬。

回顧過去的關係，如果要從中選一個人結婚，阿安表示一定會選擇她：「我最鍾意她，她很有才華，很特別。」她們曾自資出版一本書，收錄二人談情說愛的詩文，其中一篇名為“Notes to Hearts in Custody”，靈感來自發給羈留人士的通告書，原文輯錄如下：

Without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the heart arrested should be kept in custody.

There will be no pre-specified upper limit to the duration of detention.

During custody, only two parties should be involved exclusively.

The person under custody can and will be searched by arresting officer for evidence that love subsists.

You have the right to request for reasonable action to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During custody, all the love in your possession must be surrendered.

All forms of behavioural and psychological loitering are prohibited.

You will be personal privacy rights and liberties (provided that the exercise of such does not compromise the basis of mutual trust and affection).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equity, the above terms and conditions will be conferred upon the person in custody as well as custodian.

然而，二人的年紀相差九年半，在阿安眼中，女友始終比較任性，每一次道理講不過去就會提分手。拍拖一年多，女友已經講過兩、三次分手，令阿安精神疲勞。二人的感情每況愈下，不時因生活小節起磨擦。

有一次，阿安因為膝頭狀況欠佳，她問女友：「將來行動不便的話，該如何是好？」

女友不假思索：「很簡單，入老人院不就可以了？」

「一般人都會說想照顧對方吧？就算是假話都好。」

阿安本來已為她立下人生第二份遺囑，但是在「羈留」的最後一段日子，阿安已經找不到相愛的證據。在女友面前，為免爭執，她情願少說少錯。朋友們看在眼內，都覺得阿安太受氣，為她感到不值。其中一位不時聽阿安訴苦的朋友是有夫之婦，但是與阿安愈走愈近。就在女友第四次提出分手的時候，阿安順水一腳推走舊舟，兩腳正式踏上另一條船。

十七年的圓舞曲會否終結？

這條船，一開始已經有三個人。這對夫婦為了給女兒營造一個完整的家庭，協議維持婚姻；阿安認識妻子一方的時候，他們已經結婚十六年。初相識之時，三人還未退休，無暇正視彼此關係。現在，他們仨比較像兄妹，阿安有時會親自下廚，哥哥偶爾送禮回敬，孩子多了一個契媽，貌似相親相愛一家人。

阿安認為維持現狀最好，「其實我都怕她離婚，如果有一個太自由的人在我身邊，對方就會用自己的自由來換我的自由。」女友比阿安年輕八年，三人行的船程由2006年開始行駛至今，阿安也立下了人生第三份遺囑。受益人的名字，是否不用再改？

「我不敢擔保。」阿安自嘲：「初相識時，每一個都說仰慕我、欣賞我，覺得我學富五車，言語吸引。相處下來，就會怪

責我多口，講來講去三幅被。」訪問之時，阿安隨手拈來一個例子。

「炆花膠加排骨好嗎？」女友問。

「好呀，排骨可以吊起花膠的鮮味。」阿安答。

「我只是問你吃不吃排骨，沒有問你鮮味，多嘴甚麼？」

「你以前又話我說甚麼都可以？」

「當然啦，你以前都不是這樣子。」

「我有甚麼不同？你不是叫我不擔心會得罪你嗎？」

「是啊，但是我已經忍到無可再忍。」

「即是你忍了很久？那麼，一開始你就不應該忍。」

阿安覺得自己由始至終都是做自己，只是對方改變了，她忍不住訴苦：「明明我從不會逼迫身邊人做些甚麼，但是我命中遇上的身邊人，總是要逼我做這做那，就是要箝住我。」

或許，這就是阿安的人生功課，看來仍然有待完成。

這些年來，阿安都是自己住，即使對方提出三人共居，她也沒有答應，認為寄人籬下始終不太舒服，希望為彼此留一些空間。「你不捆綁我，我不會變心；你捆綁我的話，我就很可能會變心。」

然而，即使沒有任何束縛，也不見得能夠長治久安。

女友在2017年退休，二人一星期總會見面幾次。新冠肺炎爆發之後，因為擔心其中一方染疫後無人照顧老狗，即使大家都住新界，只是幾個鐵路站的距離，見面還是少之又少。2022年1月，阿安在凹凸不平的石屎地跌倒，落地時手掌借力，虎口位下面的厚肉被削掉了一整塊，流血不止。她在等候救護車時，粵曲老師來電想要取消當晚飯局，意外得知她受傷後，立即趕到急症室探望。

出院之後幾天，阿安因為雙手受傷包紮，難以自理，上廁所或洗澡都需要別人協助；結果老師請纓，上門照顧。老師一住便是幾個月，女友事後得知，極度不安。

「當初叫她擔心新冠就不要來，結果她真的幾個月都沒有出現。」阿安說：「我的朋友都說，我叫她不用來她就沒有來，其實也沒有很想來——連老師都是這樣說。」

老師似乎有所暗示，阿安也略有所感，但是二人並無明言。

老師比阿安年長五年，年近七十，子女結婚的結婚，移民的移民，只剩她孑然一身，自然樂得有人相伴。「她為人倔強，性格實在很像我的母親——我對母親的確有情意結。」阿安感激老師在緊要關頭相伴，心中把她當成半個母親，待她極好。

不過，在女友看來，阿安並不只是把老師當成母親。她要求阿安叫老師搬走，而且不可再出現在阿安的住所。

面對女友的要求，阿安第一時間反問：「這些年來，如果你有少許感染到我的個性，是否不會這麼計較，而是將我的開心放在第一位？」阿安認為自己一直將女友放在第一位，體諒她要兼顧家庭，相識多年從未麻煩她照顧自己。她希望女友能夠理解，難得有一個人主動照顧她，無論她們之間是甚麼關係，也可以有一個和平共存的方式。

然而，女友決不讓步，禁止阿安讓老師踏足家中。阿安知道這個要求會令老師傷心，但目前還是選擇妥協。

「女友從來沒有變心是主因。」阿安一再強調：「我們的感情到後期的確很淡，但是有沒有愛情都好，親情也是很深厚，我仍然珍惜這段關係，希望將來可以用親人的方式互相關懷。」這段日子，阿安與老師一直都有見面，她打算忍讓女友兩年，讓這段關係軟着陸，不用傷害任何人。

是次意外之後，女友曾提出兩家人搬近一點，方便互相照應，阿安依然拒絕。踏入銀髮之年，阿安唯一的預備就是將全副身家留給女友，相信她有良心，到時會照顧她。「我唯一擔心只是行動不便，但是到時也不由我拿主意。人生與天氣沒有多大分別，到時再決定吧——可能是十年後？」

如今，女友重拾主動，不時要求上門探望，「她喜歡上來就上來，但是我依然會通街走。」阿安笑言自己坐不住，興趣廣泛，朋友又多，退休之後比螞蟻更忙。打麻將、跳舞、唱卡拉 OK、打草地滾球……只要朋友叫到，她都不會推搪。

要數阿安最熱愛的活動，一定是唱粵曲。除了上課，她還會參加義演。為求進步，阿安學起來也相當認真。阿安專注粵曲對唱，對唱分為子喉及平喉。子喉嗓音高，又稱旦喉；阿安則唱平喉，飾演生角。平日練歌，阿安喜穿 Polo 上衣；義唱時，阿安會穿西裝皮鞋；義演的話，當然是隆而重之，化上小生妝容，換上粵劇戲服。



練歌有兩種方式，一種像是去卡拉 OK，播音樂跟着唱；另一種是聘請樂師，在錄音室以樂器伴奏拍和。拍和能夠烘托歌唱，強調與歌唱者互動，更像真正的表演。拍和局必定要有兩名樂師，掌板領導擊樂，頭架領導音樂，並有下架樂師協助。頭架通常以小提琴（又稱梵鈴）、高胡或二弦領奏，下架樂器包括笛子、洞簫、二胡、中胡、揚琴、琵琶、古箏、中阮或大提琴等。

拍和局通常由八至十人夾錢，每支曲子喉平喉各付 200 元。為了節省開支，略懂樂器的同學也會兼任下架的樂師，阿安懂得拉二胡，老師則懂得彈揚琴。一支曲通常唱二十至三十分鐘，大伙兒會預先排好次序，按時出現。錄音室外經常人來人往，有人上來唱一支曲就走，亦有人會留下來喝茶聊天，順道聽歌。

阿安現時已是助教，每一次開局，她和老師都是鐵腳，通常最早去到中心，煲水、沏茶、預備曲譜。由於唱粵曲都是女性居多，而女性多唱子喉，會唱平喉的阿安就比較吃香。每一次開局，阿安至少會唱兩至三首曲，有時還會唱四首。演唱曲目愈多，花費愈多，可見一次練習的費用相當可觀。

粵曲基本上都是取材自中國歷史，旦生角色都有定型。一首歌要唱得好，一定要理解其歷史背景，才能代入角色。阿安最愛唱情歌，最喜歡的角色是李後主。「李後主是悲劇人物。

在兄弟之中排行第六，原本不輪到他做皇帝，他也絕無野心當皇帝。他根本就是一個詩人，為人傷春悲秋，如何當一個統治者？」阿安娓娓道來，感同身受，似在說自己的故事。

採訪當日，阿安與老師對唱了《李後主之情殤》一曲，姑且引用曲譜末段的故事簡介，作為這個故事的總結。

「李煜（李後主）與元配周娥皇（大周后）的故事。周娥皇系出江南望族，端莊貌美，工琵琶，精音律，善詩文，與李煜婚後，恩愛逾恆，李煜繼位，立娥皇為后。未幾，娥皇染病，臥床不起，藥石罔效。其妹（小周后）入宮探病，與李煜情愫互生，李煜填一闕《菩薩蠻》記與小周後幽會情景，一時傳遍朝野，娥皇得知其事，深憾之，病逾重。此曲即敘娥皇於彌留之際，與李煜話別之依戀。」

旦：「得失生死平常事，懇君再娶美人莫抱憾。」

生：「執手夫妻偕老，」

旦：「司命催逼分散。」

生：「續愛尚有仙丹，可盼親身訪探。」

合：「做過夫妻——」

生：「恩義兩酬還，」／旦：「恩義算酬還，」

生：「別抱憂煩，」／旦：「別抱命殘，」

生：「共抱擁清暉花香雪泛。」／旦：「待抱擁清影瓣。」

1971年，阿寶十七歲，學校來了一位轉校生。那是一位女生，美國華裔，說得一口流利英文，但廣東話帶着奇怪口音。那個年代，社會風氣比較保守，認為外國長大的華裔是「黃皮白芯」的香蕉人。¹耳濡目染之下，有些同學歧視轉校女生是「怪物」，在班上排擠她。

阿寶本着鋤強扶弱的心態，主動與女生聊天，邀她一起午膳。二人由傳紙仔進展到講電話，阿寶最終成功約到她一起看電影，就在銅鑼灣怡和街行人天橋旁邊的豪華戲院（現為富豪香港酒店）。

大銀幕上，一男一女正在演出《愛情故事》（Love Story），觀眾席上的阿寶也首次嘗試拖手。

Where do I begin

To tell the story of how great a love can be

The sweet love story that is older than the sea

The simple truth about the love she brings to me

*Where do I start*²

1 「香蕉人」是一個諷刺及歧視的名詞，調侃只懂得西方語言但是不懂中文的華人。黃皮白芯意指外表是黃種人，內在卻像白種人。

2 《愛情故事》的電影主題曲“Where Do I Begin”歌詞。

女生沒有甩開她，阿寶既開心又緊張，她擔心拖得太久對方會拒絕，沒多久就鬆開手。

電影結束後，阿寶鼓起勇氣表白；女生顯得不知所措，下意識拒絕。

可能剎那間的身體觸碰是大件事，也可能是阿寶死纏爛打終於感動伊人，她們終究開展了自己的愛情故事。

「我算是前衛，當年甚麼也不理。」阿寶說，「別人歧視又好，眼望望也好，因為我不在乎，從來都不覺得有問題。」阿寶認為女同志比男同志「着數」，始終兩個女生拖手比較「平常」，在街上沒有那麼礙眼。阿寶當年的髮型也不是太短，陌生人根本無法察覺她們的關係。

少年的青澀愛情，注定難以長久。兩年後的一天，女友突然對阿寶說：「我好鄙視你。」

阿寶愕然，「你鄙視甚麼？」

「我鄙視 lesbian 這種關係。」

一瞬間，阿寶由愕然變成憤怒。「我認為 being a lesbian is nothing wrong。」表明立場之後，阿寶不想繼續在這個問題上糾纏，「分手就分手。」

兩年多以來，女友忽冷忽熱，阿寶有時覺得自己更像跑腿，所謂交往只是自己單方面付出。不出所料，對方在分手後兩個月便與校內另一位 tomboy 拍拖。

對方是阿寶的第一位女朋友，但是她不認為這是初戀。「我喜歡她遠比起她喜歡我多太多，與其說是初戀，其實更像單戀。」阿寶感嘆。

結束一段「不知所謂的交往」之後，阿寶一直未有再拍拖。六年後，阿寶正在大專院校修讀三年級，她如常在校園走動，如常走進一個轉角，卻意外地遇上了另一個她。

一面之緣，阿寶已經拜倒在對方的風姿神采之下。她精心部署兩星期，每天倚在欄杆觀察進出課室的學生，打聽對方的年級和學系，查閱時間表。

有一天，乘着下課之際，阿寶終於捕捉到機會跟她打開話匣子。

「你長得很像我的一個朋友。」阿寶說。

她嫣然一笑，阿寶知道這句老土的開場白奏效了。

「你放學了嗎？不如一起去搭巴士？」阿寶試探。

一趟愉快的巴士旅程之後，阿寶隨即展開密集攻勢，以坦誠取得對方信任。一個月之後，阿寶表白。對方沒有承諾，但是也沒有拒絕。

二人在街上親暱行走，身軀貼近彼此。「她願意跟我拖手，甚至靠着我肩。」對方願意在公眾場合光明正大地拍拖，阿寶至今仍然欣賞。

1978年盛夏，《周末狂熱》(Saturday Night Fever)在香港上映，Disco(的士高)文化已經席捲全球，她們也經常與朋友去灣仔分域街的Disco跳舞。「每一次熱吻，碰上嘴唇已經叫我欲仙欲死，整個世界好像只有我和她。」阿寶一臉神往，「那一刻，真係要我死都抵。」

阿寶曾經想再進一步，可是對方心理上未準備好，阿寶也沒有勉強。比起性關係，阿寶更重視二人之間的感覺，單從親吻已經能夠感受到對方從未說出口的情感。「我深愛她，我鍾意一個人是鍾意對方在我身旁，感受到我是屬於她，她是屬於我。」

時光變幻，阿寶至今依然懷緬過去常陶醉。可惜，一半樂事，一半令人流淚。

女朋友家境富裕，家教甚嚴，但家庭氣氛欠佳。父親娶了三個老婆，其母是第二房，身份從來見不得光。女友的母親鬱

悶多年，每有不快就用言語發洩在女兒身上；又不准女兒胡亂出街識朋友，擔心她遇上壞人，步自己後塵。

「她有沒有鍾意過我？應該有的。」阿寶說：「不過她的鍾意與我的鍾意可能是兩回事，我比她大四年，她可能覺得我疼惜她，只是需要一個避風塘。」

阿寶後來決定去加拿大升學。在最後相聚的時光，女友經常瞞着家人去阿寶住所。一整個晚上，她們只聽一首歌“Blue Balloon (The Hourglass Song)”，黑膠唱盤轉動一圈又一圈，二人聽了一遍又一遍，每次別離時都淚眼婆娑。離港那一天，女朋友到啟德機場送行，那是二人最後一次吻別。

「我至今仍然保留她送的格仔頸巾。」阿寶說。

給我喜歡過的男孩們

「其實我又不是不鍾意男生。」阿寶突然擲下一個震撼彈。

這邊廂與女友傷別離，那邊廂原來有男生向阿寶表示好感。他知道阿寶要去加拿大讀書，說要送上她喜歡的那件格仔恤衫。「我當時的外型與現在分別不大，只是比較瘦。」阿寶今日依然愛穿格仔恤衫，她輕托眼鏡，笑說：「就是有點 boyish，但是頭髮沒有現在這樣短——當時潮流不興太短。」曾經有一

剎那，阿寶覺得自己可以與對方進一步發展，但是內心出現一把聲音，煞住了她。

「等一等，究竟你鍾意男定女？」

阿寶無法回答，她也為此困惑。

1965年，十歲的阿寶除了上學，課餘時間都是與大廈內其他孩子遊戲。不知怎的，阿寶當時與鄰居的一名男孩特別投契。在漫天烽火的日子，二人偷偷做了一件事。這件事，一直沒有其他人知道。

那一天，二人在睡房，關上了門，鑽進被窩堡壘，各自脫光光，觀察彼此赤裸的身體。二人只是對望，沒有觸碰對方。

「我們覺得能夠這樣坦誠相對，才算是真正的死黨。」阿寶說。「我們都對另一個性別感到好奇，在雙方同意之下，用最簡單直接的方法了解男女之別。」

男孩搬走後，阿寶與住在樓上的女孩成了好朋友。孩子總渴望變成大人，她們也不例外，街外處處「土製菠蘿」，她們卻在屋內上演溫馨的角色扮演遊戲，穿越到森林和原野。阿寶順理成章做「爸爸」，要外出工作；女孩就是「媽媽」，會在家煮飯。

「小時候會有這些概念，覺得自己要擔當『男人』的角色。」阿寶說。

孩子對性感到好奇，標誌青春期的開始。1968年，升中後的某一天，阿寶突然發現自己喜歡上這個女孩。「鍾意的程度不止是朋友——我好想鍾意一個人，然後與這個人好親密、好親密，我才發現自己鍾意這個女仔。」

女孩當時已經有男朋友，但是三人行的日子沒有維持太久——不是因為阿寶忍受不了做電燈膽，而是她發現自己同時喜歡上對方的男朋友。「我問自己，what's wrong？我係咪有咩事呢？」阿寶覺得夾在他們中間實在太辛苦、太複雜、太矛盾，唯有減少見面，初戀尚未萌芽便已無疾而終。

「我喜歡跟那個男孩玩，我覺得自己能夠跟他拖手行街的話已經很開心。」阿寶說：「但是與女生在一起，我反而會想親吻她。」多年後回想，她覺得可能是社會規範從小教育男女授受不親，她才沒有勇氣向那位男生表白，情願全身而退。

「你會否覺得自己是雙性戀？」

「我真的不懂——觀看成人影片的話，我比較喜歡看男人跟女人交歡，但是我會代入自己做男人。」阿寶有點苦惱，「雖然我認同自己是同性戀，通常都是喜歡女性，但是這輩子我也曾經鍾意三位男生。」

第一位是鄰居女孩的男朋友，第二位去加拿大之前主動表白的男生，第三位則是阿寶唯一有表白的男生。

到加拿大後，阿寶在大學迎新活動重遇在香港讀書的師姐，很快就展開追求。對方雖然喜歡她，但是事先聲明自己在香港已經有男朋友，讀完書就會結婚。

「那段時間，我們是互相依靠吧？她需要我，我也需要她，既然相處得開心，那就待在一起。」阿寶說。那段日子，她還有兩位男性好友，撥一通電話就會約得成局。三個人經常一起通宵聊天、食煙、飲酒，甚麼話題都聊得開。女友知道阿寶與他們飲酒，但是從來不會同往。

其中一名男生喜歡開車，而且是開快車，拿手好戲是飄移。

「阿寶，坐穩，我掙彎喇。」

在副駕，阿寶享受風馳電掣的快感。

「他好瀟灑，總之我好喜歡他。」

有一晚，阿寶與一班同學一起去 Disco。她知道心儀的男生會出席，特意化了妝，弄好髮型，上身依然穿白色恤衫，下半身換了一條灰色半截裙，腳踏一雙皮靴，還在頸上繫了一條絲巾。

直到背景音樂換上慢曲，二人在舞池搖曳之時，阿寶鼓起勇氣表白。

「我鍾意你。」

簡單的一句說話，只需要簡單的一個答案。可惜，男生回了一串長長的說話。

「我不是不喜歡你，不過我是作為一個朋友般喜歡你。」

阿寶沒有後悔，她選擇大醉一場作結。

後來，那位男生跟一名花俏亮麗的女人在一起。阿寶知道，他們的結局並不美滿，男生帶着兒子自殺身亡。當年得知消息，阿寶曾冒出一個奇怪的想法：「為甚麼你當時不選擇我？我會對你忠誠的。」

見光之際 分手之時

畢業後，阿寶未能在加拿大找到工作；在媽媽催促之下，她於1981年回港，輾轉加入圖書館做公務員。機緣巧合之下，她於1985年認識了一位女同事，與對方開展一段十年的出櫃長跑。

阿寶一向我行我素，早期拍拖已經會跟女朋友在公眾場合拖手親吻。沒料到這一次，對方甚至不肯讓阿寶在街上碰一下她的手臂，一切親密行為只能留在家中。對方似是想為自己留一條後路，一直未向家人出櫃，也從不肯跟阿寶出席同志朋友聚會。

二人相識之時，正值1980年代中期，社會風氣仍然保守。直到1990年代初，港英政府才免除二十一歲或以上男同志進行性行為的刑事責任。³ 阿寶在朋友面前從不隱瞞性傾向，但是從未向家人出櫃。每一次回家與七十多歲的媽媽見面，總是離不開以下對話：

「為甚麼你還不結婚？你是不是像那個誰不鍾意男人？」
媽媽問。

「不是，只是未遇到。」阿寶答。

有時，媽媽又會使出軟功：「我擔心你將來孤伶伶一個人。」

阿寶也不是省油的燈，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勉強找一個人，但是兩個人一齊根本不開心，就像你和爸爸那樣，又有甚麼意思？」

3 1991年7月11日，立法局通過《1991年刑事罪行（條訂）草案》。

兩母女你來我往，高手過招不知多少次。有一天，阿寶終於決定出絕招。

「媽媽，我是 lesbian，你不用指望我會結婚了。」

「我不想你被人欺騙。」媽媽並不意外，反而擔心阿寶容易為情所困。

「怎麼會呢？」阿寶驚訝。

「你份人太好，有時好過頭。」

「我又不覺得自己很好。」

「總之別讓人欺騙你，無論是騙錢還是騙感情。」

阿寶明白媽媽是傳統的女人，覺得做人一定要結婚、組織家庭、生兒育女，老年才會有所依靠。「不過我知道，假如我真的愛上一個人，她會接受。」

當時，阿寶與女友已經拖拉五、六年，她覺得彼此都辛苦，索性提出分手。

過了一段日子，女友竟然提出復合。這一次，她似乎接受了自己的性傾向，正式向父母介紹阿寶。世伯沒有甚麼反應，

伯母則對阿寶愛護有加，還暱稱她做「肥貓」。以前與女友拍拖，阿寶像個見不得光的第三者，如今終於「坐正」，以為守得雲開，沒想到女友同時也打開了花花世界。

女友轉工後認識了新同事。阿寶一見到合照，立即看出苗頭。

「這是誰？」

「我們一班同事之後會去她家作客食飯。」

「她看起來十分 tomboy。」

「你又知？」女友覺得她想太多，「她與另一名女生合租單位。」

「看樣子就知道。」阿寶說：「你到時看看她的睡房有幾多張床。」

聚會之後，女友回家稟報，睡房只有一張床。

「不就是嘛，合租的女生是她的女朋友。」

阿寶與女友一直沒有同居，女友通常在周五至周日才留宿阿寶的家。後來，女友與這位同事約在周末見面，阿寶心知不妙，但是依然開車載她從港島入新界。

「我去食早餐，在附近等你，之後載你出去？」阿寶盡最後努力挽留。

「不用等我了。」

再後來，這位同事搬進了女友居住的大廈，女友對阿寶的態度也愈發冷淡。「我有考慮搬過去，但是始終沒有這樣做。」阿寶說：「我不想乞求一個已經變心的人。」

有一天，阿寶如常回家探望母親。阿寶出櫃之後，兩母女其實沒有特別談及此事。那天，媽媽突然說：「阿女，其實我都覺得，你不結婚是好事。」

「為甚麼？」

「好多人結婚後也不是好開心——最緊要你同身邊的人開心。」

「多謝媽咪，我會的了。」阿寶說。

母親突然吐露心聲，每一個字都包含愛意。「她真的算是豁達，她作為媽媽愛錫我、接受我、尊重我，我知道自己很幸運。」

阿寶知道不少人因為性傾向與父母鬧翻，她也知道父母並非全無擔心，但二人從未將指責或埋怨宣之於口，她對此十分感恩。「有些父母因為子女的性傾向而覺得羞恥，為甚麼他們不願意了解孩子的想法？真正的愛是無條件的，不會因為孩子是 les 或 gay 就不愛他們。」

出櫃，其實也是阿寶與自己及親人和解的過程。她與父親疏離已久，兩父女難得坐低食飯，年過七旬的爸爸與媽媽一樣，擔心女兒的感情狀態。

「為甚麼你不結婚？為甚麼你總是這般男仔頭？從來沒見過你着裙。」

「就是因為你。」

「我？甚麼？我從未這樣教過你，怎可以入我數？」

「你當年從未解釋自己為何要離開，我曾經以為是因為自己做錯事，或者媽媽做錯事，所以你唔鍾意我們，才要丟低這個家。」

這番話，憋在心中多年，阿寶從沒想過爸爸有一天會聽到。

父親年輕時在廣州經商，本已富甲一方，後來因為政局動盪，父親需要放棄一切，單人匹馬到香港闖蕩，家人其後才陸

續團聚。來港數年，父親東山再起，建立了自己的品牌。1960年代中期，台灣為了吸引僑胞投資，向商人提供不少優惠；父親雄心壯志，帶同資本，毅然隻身前往台灣設廠。

「我只是知道，我突然失去了爸爸。」阿寶當時就讀小學三年級，家人從未向她解釋父親離開家庭的原因。「我好失落，然後開始好憎爸爸——為何你拋低我？為何你不再愛我？」當年的航空交通並不發達，來往香港和台灣要搭船，舟車勞頓且曠日累時，父親一年最多只能回港一、兩次。

從此，阿寶沒有再為爸爸等門。每一次知道爸爸回來香港，阿寶都寧願避而不見。

「你記得嗎？有一次你回家，因為做生意要錢周轉，媽媽抱怨，然後你當住我面鬧媽媽，一手抓起桌上的杯砸落地，嘩一聲，水杯碎裂一地，猶在耳邊，歷歷在目。」一說起當年，阿寶就生起怒火。「你知不知道，你這樣做令我有多傷心？甚麼兄弟如手足，老婆如衣服？我不明白，為甚麼你在台灣又有另一個家？為甚麼你要這樣對媽媽？」

面對遲來的控訴，父親沒有作聲。

「我唔鍾意男人，你是其中一個原因。」阿寶說，她想讓爸爸內疚。

「你別學人，別學你堂姐。」堂姐是家族中出名的 tomboy，阿寶從小就非常欣賞她。

「爸爸，我是鍾意『人』，不一定要指定一個性別。」

對話告一段落，父親沒有送上祝福，但是兩父女此後比較頻密見面吃飯，父親也未有再提醒女兒結婚，「我覺得，爸爸已經接受了。」

真愛有如夢幻泡影

踏入千禧年，阿寶結束了一段五年情。對方也是同事，也是從未與同性拍拖，自然也未向家人出櫃。不過，阿寶這次的「情敵」是耶穌。「可能天主想我學懂一些事情。」她自嘲。

阿寶本想避世療情傷，但是又心思思去夜蒲，在保險經紀介紹下認識了一個夜蒲群組，從此不愁夜生活。群組內有男有女，大約十來人，經常相約落蘭桂坊。

沒多久，阿寶看上了其中一人，她是一位藝術家。「我從未試過遇到一個人，這麼快就對我有好感。」阿寶說：「我終於不用花唇舌解釋，lesbian 冇罪，不用內疚，別人歧視是別人的事。」

這一次，阿寶終於遇上一個女同志，而且對方剛好與前度分手不久，剛好也喜歡身材微胖的另一半——阿寶剛好符合她的要求。

走在街上，她們總能吸引路人注視——不止是因為她們毫不忌諱拖手親吻，也因為女友的打扮相當有個性。女友一頭金色短髮，濃眉下配一副粗框眼鏡，即使只穿一件爛T恤，依然渾身散發一種特立獨行的魅力。

「我們現時吃飯用的這隻叉，還有那隻碗，都是我與她一起購買，她有一種特別的品味。」阿寶說：「我會形容自己是膚淺的，她滿足到我的虛榮和慾念，特別是性事。」由於女友是同志，二人都能夠享受同性之間的性愛。

「她是唯一與我同居的女友。」女友帶着貓咪搬進阿寶的住所，阿寶亦樂於在經濟上支持她的生活。女友在藝術圈內略有名氣，但是沒有固定收入，只會不定時為媒體供稿。她從來不會開口問阿寶要錢，但是阿寶會主動為她增值八達通卡，知道她要出街與朋友見面也會主動提供金錢。「或者，我可能縱壞了她。」阿寶說。

同居期間，女友經常表示自己想去外國留學，阿寶也相當支持，甚至陪她撰寫計劃書。女友獲英國的大學取錄後，阿寶還與她說好會在聖誕節請假前往陪伴。

「我覺得我哋唔 work。」臨出發前兩星期，女友突然跟她說。

阿寶晴天霹靂，追問之下，得知女友已在網上另結新歡，對方也是女同志。

阿寶沒有怪她，只是怪自己。「我覺得是我做得不夠好，不夠別人叻。」今日憶述，阿寶仍然哽咽，「我否定了自己過往所做的一切，甚至否定了自己。」



分手沒多久，愚人節，新聞報導張國榮的死訊。阿寶與許多粉絲一樣，極度傷心。「我當時不知道 Leslie 有抑鬱症，但是在我眼中，他有名有利有男朋友，但是我甚麼都沒有，要跳的人應該是我。」

那一刻，阿寶打開窗，一陣風撲面而來。她低頭，望向街道，深呼吸。

「喵。」前度留下來的貓咪，叫住了她。

回過頭來，阿寶崩潰大哭。

「假如我不在，貓貓誰來照顧？牠肯定會被送去人道毀滅。」理智在剎那間歸位，阿寶冷靜了下來，「為了她這樣做，值得嗎？」

很久很久之後，阿寶才想通，自己如此傷心不是因為對方出軌，而是她等到最後一刻才攤牌。「我覺得她不是真的鍾意我，但是我竟然為此否定自己，我為自己傷害自己感到難過。」說起此事，阿寶依舊生氣，「她可以告訴我，她喜歡了另一個人，我不會不接受。就算我不接受也得接受，她已經心繫別人。」

這段情，維持了十五個月。

對方一走了之，阿寶當時尚抱一絲希望，還租了一個地方，裝修成開放式空間，以便對方回來落腳，可以改裝成畫室。

一年又一年，阿寶足足等了四、五年，對方始終未有回來。

避世多時，阿寶終於重出夜蒲江湖，很快又遇上了另一位女士。對方身高1米73，外形亮麗，阿寶暱稱她做模特兒，但是她從不化妝，也不穿高踭鞋，甚至不用名牌手袋。對方年紀比較小，但與阿寶非常投契；她還不時親自下廚，邀請阿寶放工後上她家用膳。

有一晚，飯後二人聊天談心，慢慢進展至身體接觸，就在親吻之後，對方停了下來。

「阿寶，你好愛錫我，我不想傷害你，將來我會結婚——我真的好想結婚，我還想有自己的子女……」

阿寶知道，對方在小時候失去父母，隻身從馬來西亞來港打滾，十分渴望建立一個「家」。無論這番說話是真情抑或假意，阿寶也欣賞對方的處理方法，大家都容易下台。

「聽說她已經結婚，還生了BB。如果有一日再見，我想送一件禮物給她的孩子。」阿寶重情重義，她坦言不會否認任何一段感情，因為她曾經真心鍾意她們每一個。「我從來都不是找人攝時間，也不追求純粹的性愛，而是真的想找到一個人，

她或他是屬於我，我又可以屬於她或他。」然而，阿寶似乎從未遇過真心想與她一起的人，對方通常都是因為「有人對我好，why not？」

多年過後，阿寶知道怪不得人，「都是自己心急，恃着年輕有時間，經濟有能力，別人略有美色便一頭栽進去。」

阿寶最瘋狂的一次追求，維持了接近一年。對方是日語老師，正在修讀碩士課程，經常要購買參考書，阿寶二話不說就上 Amazon 幫忙訂購，然後藉詞邀她出街食飯看電影，當然還會附送精品首飾。那一年，《歌劇魅影》（*Phantom of the Opera*）來港上演，阿寶買了最好的位置邀她同往。幾個月下來，阿寶胸有成竹，決定表白。阿寶安排二人坐直升機環港島賞夕陽，之後去半島酒店晚飯，其中一道菜還可以進廚房參觀，由主廚親自下廚上菜。

精心鋪排，換來一個「不」字。

「別人拒絕後就不見影蹤，似乎有點小氣，所以之後還有繼續幫她訂書，傻更更了一年。」阿寶苦笑，「我是心口掛個勇字的清兵。」

回顧一段又一段舊情，阿寶終於點起了一枝煙。「其實我戒了煙。」她掏出一包 Kent，熟練地點煙，「我是真的戒掉了這個壞習慣——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

2013年底，阿寶因為子宮長了一顆體積可觀的水瘤，需要做手術。切除水瘤化驗後發現內有癌細胞，醫生隨即為阿寶安排了六次化療。打從做手術開始，阿寶就沒有吸過一口煙。「我以為戒煙成功！」憶述時，阿寶還有點自豪。千辛萬苦戒掉陋習，緣何此刻又再與煙嘴熱吻？「因為後來分手，我好傷心，好傷心，又食返煙囉。」就這樣，阿寶又重回一日一包煙的生活。

「她很可能是我最後一任女朋友。」阿寶吐出煙圈。

對方的身高剛好又是1米73，與阿寶是同事。二人年齡差距甚遠，一起逛街，別人經常誤以為她們是母女。「每一次我都想說，佢唔係我個女，係我條女，哈哈。」阿寶說，自己鍾意一個人往往是感覺行先，容易被靚女吸引，但是從來不在乎對方的身高或年紀。

為免其他同事發現，即使阿寶有時會開車載她上班，她們都會前後腳入公司。放工時，二人又會刻意走相反方向，繞一個圈才在的士站匯合。

「我的花名是河馬，因為身形肥胖。」阿寶突然甜絲絲說：「女友暱稱我做 Hippo，我的電話還有那幅相。」她一直將相片設定為手機屏幕背景，「看，這個 Hippo 暖水袋，就放在廚房那邊。」

甜蜜一年之後，阿寶就開始做化療。化療翌日開始全身刺痛，痛足三日，她就在床上躺足三日。那段日子，除了外傭，她不願見任何人。「女友要返工，我辛苦她也幫不上忙，所以我不想她探望。」阿寶說。有時候，女友堅持前來，有她在旁陪伴，阿寶還是會覺得開心。

到第四次化療的時候，阿寶希望終止療程。

「醫生，我不想做了，好辛苦。」

「你捱到四次，已經好叻，別放棄好嗎？你是不是不開心？」

「少少啦。」阿寶仍在逞強。

「不如你同我們的同事傾下偈？」

於是，醫生轉介阿寶與臨床心理學家會面，阿寶形容心理學家是一位「醫生」。「我很喜歡與她傾偈，一傾就是十年。」起初，阿寶只是訴說做化療的辛苦，後來慢慢敞開心扉，遇上

任何不如意都會與心理學家分享。完成六次化療後，阿寶察覺到女友與另一位男同事過從甚密。多年經驗告訴她，這段關係快將結束。阿寶在輔導時主動提起此事，心理學家給她開出一份功課，「搞清楚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學習為自己做每一個決定。」

阿寶不想成為女友的包袱，主動提出分手，其實一講完已經後悔，一回家就哭到天崩地裂。「沒想到，食返煙，一食就是十年。」阿寶幽幽地說。

「你問我，做人開唔開心。」阿寶有點感慨，「我有開心過，但我心底裡不算是一個開心的人。」在心理學家引導之下，阿寶發現自己在親密關係的軌跡。「原來我永遠都是鍾意對方多一點的那一個。」阿寶經常將重心放在對方身上，一味關心對方的需要，為別人開心、為別人生氣、為別人難過，以為別人開心自己就會開心，最後變成為別人而活。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開心。」活了大半輩子，她終於明白，就算在親密關係之中，並非對方的每一件事都與自己有關。太過愛錫對方，是會傷害到自己。「如果你問我是否想再有一段關係，我想我也會鍾意，但是不會刻意追求，不會了。」阿寶感嘆，「我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再去鍾意一個人，好像沒有人能夠取代我曾經深愛過的人。我有點累了，或者，一個人都是開心的。」

阿寶自從三十幾歲開始獨居，至今超過三十年。「認識自己」這份功課，她已經寫了很長時間，雖然略有得着，但是她也不知道何時才會畢業。時至今日，阿寶在 Facebook 的戀愛狀態依然是 “It’s complicated”。

人本來就寂寞的

「我現在依然鍾意去蒲，不過揸住枝拐杖就唔係好蒲到。」阿寶自嘲。她喜歡熱鬧，喜歡嘈雜。在電光幻影之中，騰雲駕霧，勁歌熱舞，由微醺到酒醉，令她覺得自己依然年輕。「那種開心好短暫，但是我享受。這個才是我的世界，即使這個世界可能好寂寞。」一句 hi，一句 bye，揮揮手，不用交待，不帶走一片雲彩。

阿寶的心境仍然年輕如《周末狂熱》的插曲一樣 “Stayin’ Alive”，但是她也知道自己的面相已經透露出歲月的痕跡：白髮冒出，臉上兩道深刻的虎紋，手中還握着一枝拐杖。「十個人當中，起碼有幾個叫我做阿婆。」阿寶有點無奈，「現在我發覺別人會嫌我老，可能因為說話未必投契，年輕人鍾意做的事情我又做不來。」

那些「年輕人鍾意做的事情」，其實只是行山和踩單車，但是阿寶行動不便，這些事情她真的做不來。訪問前一星期，因為胸口痛了兩天，她又找不到原因，於是去急症室就醫，最後還要留院。不少長者諱疾忌醫，阿寶反而一覺不妥就會立即求

醫，希望搞清楚身體哪裡出毛病。「我不怕看醫生，但是我好怕死。」她說，「因為我不知道人死之後要往哪兒去，也捨不得家人。」

爸爸離世之時，阿寶已經四十多歲；那個時刻，依然在她的腦海揮之不去。再熟悉不過的爸爸，變成了一具冷冰冰的遺體，「我不想他走，但是一切已經回不了頭。」媽媽後來也在2017年離世，阿寶覺得自己在死亡之後其實還會有感覺，單是想到這一點，已經感到莫名的恐懼。

生、老、病、死，一個人步向死亡之前，免不了生病。除了恐懼死亡，阿寶也擔心病痛。「我好怕病得辛苦，最好天主在我睡覺時悄悄地收走我。」假如有得揀，阿寶會毫不猶豫選擇安樂死，她希望在睡夢中無聲無息離開，最多大家哭一會兒就好。「總好過身邊人看着我受病痛折磨，我不想令愛錫我的人傷心。」阿寶打算預設醫療指示，以免在患病末期之時，被逼接受無效的維生治療，變相延長死亡過程。

阿寶已經向家人交待，身後事用火葬，在山上找一棵樹撒灰就好——她想回歸大自然。「不過千萬不要海葬，我不喜歡在海中浮浮沉沉。」阿寶甚至叮囑家人不用建墓碑，也不需要拜祭，記得她在哪一棵樹就好。「我都未立遺囑，過多幾年吧，也差不多是時候。雖然我沒有幾多身家，但是我有好多Lego。」



阿寶珍藏十多年的 Lego 多達五百多盒。為甚麼如此鍾意 Lego？「可能因為我也算是在破碎家庭長大，我喜歡將拆散的 Lego 砌好。」最近一年，阿寶開始變賣珍藏，一來為未來搬屋減少負擔，二來也為了兌現 Lego 的現金價值。

「你記住，金錢就是你的子女，你要談戀愛的話，跟金錢戀愛就好。」今日回想媽媽這句話，阿寶知道媽媽早已看穿她對人太好，一定會忘記顧及自己的將來。媽媽曾跟她說，如果阿寶有錢，她會令好多人開心。「現在我比較想找個有錢的人養我，請一個外傭照顧我，最好有司機載我看醫生，不用煩惱一日三餐——哪來這個人呀？別要痴人說夢話。」

展望將來，阿寶表示自己會嘗試與金錢談戀愛。她直言自己不是一個情操高尚的人，金錢的確可以改善生活，某程度上可以買到開心。「我需要安全感，也希望自己搵到錢能夠幫助其他有需要的人。」阿寶已經排期在2025年做第一次膝蓋手術，2026年做另一個膝蓋，每一次手術大約需要半年時間康復，她希望趁雙腳仍能走動之時，Lego 賣得幾多得幾多。「他日離開這個世界，再鍾意的人都要分離，更何況是身外物？與其到時麻煩家人處理，倒不如現在自行處理。」

阿寶已經做好心理準備，將來會孤獨終老。「要有的一切我都擁有過，只怕這輩子冇人愛過我而已，但是我十分感恩，因為我已經遇上兩個無條件愛我的人。」

這兩個人，分別是媽媽和英姐。英姐是家中傭人，阿寶從小由她照顧，家中兩代的小孩也是由她一手帶大。英姐照顧阿寶一家人超過五十年，直至離世。「我們的關係親密如母女，她是我其中一位摯親。」

「如果要我改一個化名，我想叫阿寶，或者叫阿樹。」阿寶說：「叫阿寶，因為我最喜歡的女生的名字有一個『寶』字；叫阿樹，因為我鍾意樹。如果我是一棵樹，我想做一棵會跳舞的樹。」

論文一

渴望與等待：

以亞際取徑探討年長女同志與
雙性戀女性的愛與親密關係

文／鄧芝珊

譯／謝莉娜 審訂／楊靜怡

以前沒有電話聯絡這回事。寫信和收信至少需要兩個星期。我經常寫信給我的情人，約時間在台北車站見面。所以我每個星期天都去車站等啊等。等看誰收到我寫的信後會來。如果有人來了，我們就一起出去玩。有一次，我帶着住我附近的新女朋友去車站，碰巧遇到了我的其他女朋友！結果就吵架了，我就趕緊離開（笑）！這一切很快變得太複雜太煩了，我也離開台灣去日本工作了。

引言

享用過豪華的生魚片、炒米粉、蛤蜊湯和炒高麗菜大餐後，我們穿過馬路，跟隨五十九歲的女同志 Gin 來到 Gin 媽媽的公寓。Gin 媽媽將身上的男裝襯衫整齊地塞進褲子，左手扶着扶手，爬上昏暗陡峭的樓梯。Gin 在右側攙扶着她的手臂，叮囑我們小心慢行，注意腳下。進了公寓，我們脫掉鞋子，把藤製扶手椅和木凳在客廳圍成一圈。Gin 端來了茶，我們坐下，開始訪談。

本研究試圖透過在香港、新加坡和台灣進行的民族誌訪談和參與觀察，擴展關於年長女同志與雙性戀女性之研究。相較於僅關注認同型構、歧視經驗或醫療需求的研究，我透過一系列的問題，書寫、回溯受訪者的敘事描述，分析其中的用詞與意義，旨在複雜化關於愛情、浪漫和親密關係之文化概念——這些概念在相互關聯的歷史、性別角色和邊緣的情慾主體意識的縫隙之間出現。本文首先提出一個看似顯淺的問題：對於出生於1930年代末至1950年代末的華人女性而言，愛情和親密關係的定義為何？陽剛特質的表達如何影響上一個世代構築同性親密關係的方式？性別（gender）和性相（sexuality）在女性之女同志慾望的文化想像和最終實現中相遇、交織、相互影響，其亞際（inter-Asian）參照為何（Iwabuchi, 2013）？

要理解年長女性之間的同性親密關係，我認為首先必須拋下一般對女性同性慾望的定義、聲稱與證明。我們嘗試擺脫當代性身份（sexual identities）的論述限制，藉此拓展對女性之間同性慾望和親密關係的理解範式，並填補年老和年長女同志性相關文獻的遺缺。新興的同性戀老年學，將重點置於與老化和老化身體相關的臨床和社會問題。Karen I. Fredriksen-Goldsen 和 Anna Muraco 在一項橫跨二十五年的大型文獻回顧中指出，早期研究多聚焦於透過「探索面對身份污名的危機處理能力」（2010，402），讓年長女同志和男同志發聲。其後的研究則多涉及演變中的女同志、男同志、雙性戀和跨性別（LGBT）認同的社會運動；以及在 LGBT 老年人的生活經歷中，性身份所扮演的角色。

目前針對 LGBT 的健康需求與服務、社會支持網絡和家庭之研究，多着眼於在 LGBT 逐漸進入主流視野的國家內，產生更大的政策倡議影響力。然而，這方面研究的地理跨度和範疇仍然有限。人口高齡化下，雙性戀男性、雙性戀女性和跨性別人士之相關研究亦不足。在同性關係或同性戀性傾向尚未獲社會或法律認可的社會中，關於年長 LGBT 人士的實證資料依然欠奉。因此，要在年長社群相關的健康與社會服務組織內追蹤和探尋年長 LGBT 人士，是非常困難的。

關於香港、台灣和新加坡年長女同志和男同志生活的研究相當有限。早在 2001 年，趙彥寧針對台灣一個年長“T”（tomboy）和「婆」（陰柔女同志）社群所進行的人類學研究，闡明了性和

親密關係、酷兒親屬關係和照顧的議題（Chao, 2001、2008、2017）。江紹祺圍繞香港十二位六十歲以上的男同志，探討出櫃、家庭、老化身體、情慾和社交空間的概念（Kong, 2012、2019）。Evelyn Blackwood 研究印尼西蘇門答臘省內“Tomboi”的展演性，解說為甚麼“Tomboi”認同是本地、國家和跨國文化力量的「拼貼」（bricolage）（1999, 199）。Megan Sinnott（2004）提醒我們，泰國的“Tom”、“Dee”之間的性別與文化差異，是比性別認同更重要的議題。

以下，我將首先概述本研究的方法論。就本研究所收集到的民族誌資料，詳細闡述其中關於渴望與等待的時刻，藉此重新定義跨越時間和空間維度的現代愛情和親密關係概念。接着，我以亞際參照與華人現代性（Chinese modernities）交織的方法論取徑，說明性別和性相如何在女性同性慾望的文化想像和最終實現中相遇、交織、相互影響（Iwabuchi, 2013）。最後一節我將探討陽剛特質涉及的「保護」與「禮貌表現」的政治性，「陽剛」是貫穿本文全文的主題。我認為，透過對華人現代性及其所涉及的社會制度——例如日常生活中的工作、婚姻和家庭——的多重理解，三個亞洲社會中的華人年長女同志與雙性戀女性得以相互聯繫。

以1930年代末至1950年代末出生於香港、新加坡和台灣的華人女性的民族誌訪談和參與觀察為基礎，我探討在一個滿佈衝突與矛盾的社會秩序下，特定的歷史情境和文化影響下的性別角色認知，如何影響同性慾望及其實踐。由於缺乏明確定

義的性別身份與自我命名的語言，一些人選擇保持私密，另一些則保持隨機應變。就女性同性親密關係的修正式理解，對於個人探索自身同性慾望及其最後進入女同志關係至為重要。

關於方法論

由於年長女同志和雙性戀女性在媒體再現和爭取 LGBT 權益相關的活動中的能見度極低，本研究招募受訪者的過程充滿嚴峻挑戰。最初設定的研究對象為六十歲以上有同性浪漫關係，長居香港、新加坡和台灣的女性。然而，由於同意參與研究的女性有限，我們乃將新加坡受訪者的年齡調整為五十五歲以上，於是最終受訪者的出生年份集中在1930年代末至1950年代末。是次研究的目標是招募社會不同階級、種族／族裔、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移民世代、健康狀況和家庭狀況的受訪者。研究初期有兩位協作研究者參與，其中一位在新加坡女同志的身份、家庭和母親角色議題上著作甚豐；¹ 另一位是台灣年老與年長 T、婆之日常生活研究的專家。²

1 鄧詩薇 (Shawna Tang) 目前為悉尼大學性別研究學系高級講師。她是本次研究的協作夥伴，協助在新加坡招募受訪者。我與鄧博士共同進行了兩次訪談，其中一次對象是本文提及的 Joey。研究期間共進行了五次訪談。

2 本次研究的另一位協作夥伴是趙彥寧，她目前為台灣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她參與本研究的早期階段，就研究資助之申請提供回饋意見並參與研究主題之討論。本計劃並不包括她目前或過往的訪談計劃資料。在台灣，“T”通常指 tomboys 或 butches，而「婆」通常指較陰柔的一方。

2016年至2018年間，我主要以非概率滾雪球抽樣（non-probability snowball sampling）方法，通過社群守門人、LGBT組織、社交媒體平台和私人網絡徵求潛在的受訪者。早年我投身於香港女同志和雙性戀女性社群的研究，過程中與大家建立了互信融洽的關係，因此獲社群守門人相助，推薦適合參與計劃的受訪者。在台灣，由於我不諳當地的台語／閩南語，因此透過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的協助招募和採訪受訪者。有三位受訪者現居台北市，一位目前住在台南市，還有一位住在高雄市。在新加坡，有賴我的研究協作夥伴與當地人會面，由他們聯絡年長女同志和雙性戀女性。

我選擇在香港、台灣和新加坡收集田野資料，意在研究三地相互關聯的歷史、亞洲四小龍經濟體系和共同的儒家價值觀，在更廣大且相互參照的家庭、同儕以及公眾的社會背景之下，如何影響年長女同志和雙性戀女性建構情慾與浪漫關係。資訊、人員、文化和資本的全球流動持續增加，亞洲內部和跨越洲界的歷史遷移模式已經延續數個世紀，其中，對親密關係的嶄新文化理解也隨之被引入、抵制、利用或在地化。在知識生產過程中建立亞際參照有其必要（Iwabuchi，2013；Roy & Ong，2011）。岩淵功一認為，就鄰近的亞洲國家之學術研究、資料收集和分析而言，亞際參照是生成「創新的知識生產」之關鍵（Iwabuchi，2014，47）。

以香港為基地，我首先嘗試融入各種社群活動和私人聚會，找尋機會向女同志和男同志社群介紹我的研究計劃、與有

意者和相關人士建立聯繫。前後我各前往新加坡和台灣三次。我以「在社群中生活，參與日常和非日常活動」的取徑，系統化地收集研究資料（Dewalt & Dewalt, 2002, 4）。我後來與許多符合研究條件的女性有過廣泛的非正式交流，但只有很少數同意參與正式的深入訪談。簽署同意書對她們而言似乎很陌生，而錄音訪談也着實令人卻步。相較之下，書面筆記和閒聊比較容易被接受。為撰寫本文，除了參與觀察外，我也在香港進行了十二次正式訪談，在台灣和新加坡則分別各進行了五次。本研究不企圖進行任何概括性的推論以及代表性的宣稱，而是透過一小群生於1930年代末至1950年代末香港、新加坡和台灣、具同性慾望的年長華人女性的生命經驗，觀察三個獨立但相互關聯的亞洲社會如何塑造出令上述女性得以出現的社會條件。

渴望與等待

受訪者們經常提及「時間」此一要素，以之衡量何時向家人、朋友和同事出櫃——如果他們曾經出櫃的話。受訪者們講述了因害怕同性慾望被發現而經歷漫長等待的故事。時間因此被當成是拒絕或建立親密關係的合理標準。部份受訪者稍稍提及內化的恐懼會因等待而加劇、顯露和平息。通常與等待這概念相關的感受，包括期待、焦慮，以及最壞的情況——恐懼。

是次研究中的受訪者鮮少提及「恐同」一詞，除非他們本身熟識 LGBT 權益之相關論述。大多數提到在生命中的某個時刻

曾害怕自己對其他女性的情慾感受會被人發現。Monika Kehoe 1984年關於六十歲以上美國女同志的研究顯示，大多數女同志人生中大部份時間都是「深櫃」(deeply closeted) (1989, 21)。即使隨年齡增長看到女同志和男同志的能見度增加，她們仍會「因為習慣了，而選擇繼續掩飾」(同上, 23)。

本文開頭 Gin 媽媽的敘述提醒了我，要關注意當代愛與親密關係之概念的歷史脈絡，並加以重新定義和拓展。Gin 媽媽的少年和成年時期都在台北北部度過，她強調她的浪漫關係受自己的生活所在和社交網絡所影響。她稱自己的那群朋友為「十三太保」，她自十七歲與這群人認識，一直保持密切關係直至她五十多歲。及後一些人遷居、結婚或生子。Gin 媽媽在二十四歲時結婚並繼續與這群朋友往來，一直至她四十三歲時前往日本工作。她在十二年後才返回台灣，期間由女兒 Gin 獨自照顧她的弟弟們。

她深情地形容這幫朋友是一群「小混混」，她們白天工作，晚上聚在一起「爭地盤和女友」。這幫人在鄰里中以中性打扮和「惡勢力」而為人所知。我詢問 Gin 媽媽的浪漫關係，她簡短提及自己經常寫信：「我一直都有寫信。好像每個地方都有筆友，高雄、台中都有。我通常見過一面後就給她們寫信。所以我在每個地方都有一個女朋友！」兩地之間遙遠的物理距離促使人們經常寫信。如今年過八旬，Gin 媽媽認為異性戀婚姻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她解釋道：「我的女朋友們結婚是好事。她們很忙，我也很忙。我們有時間就聚。」

我們造訪 Gin 媽媽的公寓，但 Gin 媽媽不是唯一的受訪者。訪談過程有五人在場，包括 Gin 媽媽、Gin、作為研究者的我，台語／閩南語翻譯 Amy，還有訪談謄寫員易君。研究初期 Gin 稱自己為女同志，到研究完成時，他改稱自己是跨性別者。他堅信母親的故事應該為人所知，全賴他搭橋，我們才得以與他的母親接觸、進行訪談。是次訪談多語並行，對特定的歷史脈絡底下特有的語彙進行多層次的語言與文化轉譯。其中最為令人意外、豐富、又時而緊張的互動，往往發生在女兒—母親的對話當中。

Gin：如果我要你在住廟旁邊的阿花姨或住天母的「騙子」、或者呂姨之間選一個，你會選誰？

Gin 媽媽：我當然會選呂姨。

Gin：好吧，至少你還是有眼光的。總算！

Gin 向我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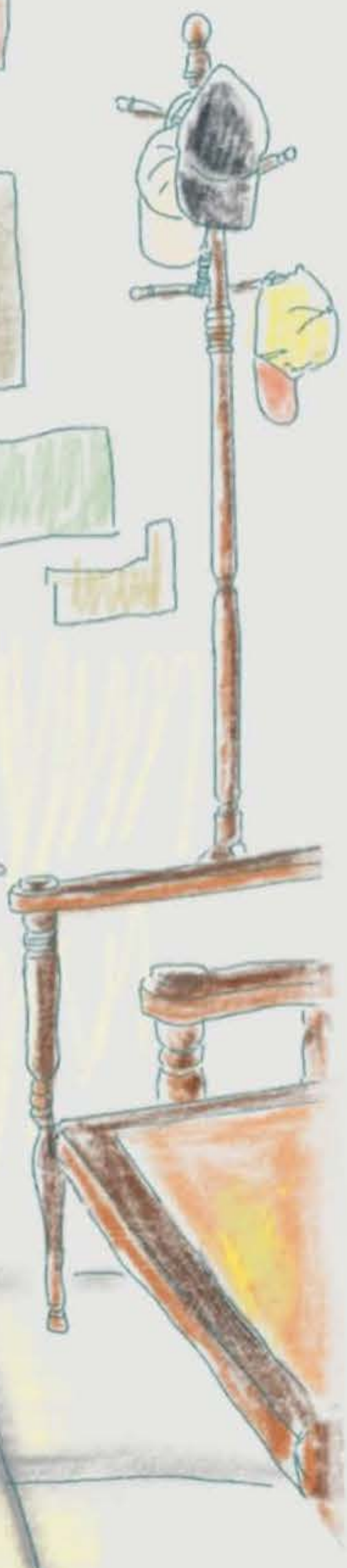
呂姨等了我媽三年。她說如果我媽去找她，她就和我媽一起生活不去結婚。好吧，我媽就三年都沒去找她，呂姨最後結婚了。你知道嗎，十多年前，她給我媽旅費到中國大陸。她們現在偶爾也會一起喝咖啡。呂姨是真正的好女人！

Gin 媽媽的故事充滿了對實現性慾、親密關係和長期伴侶關係的渴望與等待。等待的責任是雙方的，而愛以漫長的分離時間作衡量。在她身處的社會，等待多年是尋常且預期之內的，因為書信是唯一可跨越距離的溝通方式。在極陽剛的外表下，Gin 媽媽扮演了已婚女士、妻子、母親這些傳統的性別角色，同時也發展了同性關係。Gin 媽媽可以被視為是既逾矩又守舊的。

Gin 媽媽成長於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最後階段，並在日本工作十二年。³ 這十二年對她的情慾生活影響甚微。與關於情慾實驗和女性解放的旅行文學不同，Gin 媽媽大部份的情慾生活似乎定格在身處台灣的青年時期。她返台後不再與人約會，只與一些老朋友保持聯繫，部份是她去日本前的女朋友。雖然她與這些老朋友或前女友不常見面，但她似乎滿足於這樣極偶爾的聯繫。她甚至反過來質疑我覺得頻繁聯繫才能維持關係的假設。她令我記起那種令浪漫保持馥郁的「渴望與等待」，以及「等待中」的狀態方能令人「好好地欣賞」親密關係。我好奇 Gin 媽媽對浪漫和親密關係的立場，於是請她解釋。

「好好地欣賞」親密關係的想法，源於 Gin 媽媽對 1960 年

3 日本殖民帝國之建造始於 1895 年割讓台灣。日本在第一次中日戰爭中獲勝後簽署《馬關條約》，其中規定無限期割讓台灣和澎湖列島予日本。日本在二戰落敗後，於 1945 年結束對台灣的統治。



代台北的“T”們應該如何恰當求愛的看法。⁴ 早期就 butch 女同志和陽剛認同女性的民族誌研究清楚展示了 butch 陽剛特質錯綜複雜的體現 (embodiment)，其中，照顧、養育、自信、自戀和痛苦的概念可以在 butch 身份的社會建構中同時並存又相互矛盾。對於 Gin 媽媽而言，只有經歷渴望和等待，才會慾望一段同性親密關係。

早婚也是受訪者的共同主題。大多數受訪者只略略提及自己的婚姻，彷彿提及前夫會貶損她們的同性慾望。有些受訪者則會談到她們的伴侶已婚。Gin 在回憶一段重要關係時，提到「我前任（與一個男人）結婚對她自己而言是好事」。他繼續說：

我從來沒想過兩個女人可以白頭到老。我從來沒聽說過兩個女人可以共度一生！如果她不嫁給男人，別人會怎麼看她？她該如何繼續生活？我希望她能結婚。我希望她真的快樂，過美好的生活，少些壓力。她結婚後我們就沒有聯繫了。但過了一段時間，我和她的兒子有往來。她有一名女兒和一名兒子。

4 “T”、「老T」和“uncle”等口語詞彙發展的進一步討論，可參考趙彥寧（Chao，2017）的著作。

一般人或許認為 Gin 是基於無奈才會有「與男人結婚對女友較好」的想法。然而，在「那年代兩個女人無法長相廝守」的理由下，他更多是基於照顧女友的責任，而希望對方與男人結婚。此外，在關於一群年長 T 和婆的深入研究中，趙彥寧探討了「照顧作為一種倫理（實作）」的概念。在此，我以 Gin 對「照顧」的表述擴展趙彥寧的分析——這不僅是一種基於女性友誼和關係的互惠照顧，更是為了「『放下』在一起的慾望」而進行的一種自我保護。在此，有一種優先於情慾的更高秩序。Gin 對「放下」的特定理解，以及對前女友「過正常生活」的合理化，就是為了令生活「能多正常〔直〕就多正常〔直〕」（Yau, 2010: 3）。下一節將轉入亞際方法論的描述，展示華人現代性和陽剛特質的交叉點。

召喚香港

在新加坡，尋找適合本次研究的受訪者極為艱難。在台灣，有法例保護 LGBT 在職場和學校的權益（Sanders, 2015），同性婚姻亦於 2018 年合法化。在香港，因循英國律法，1990 年以前男同性戀性行為因涉及肛交行為而被視為干犯刑事罪行。至 1990 年代，香港通過了同性戀非刑事化的相關法令（Sanders, 2015）。與香港、台灣不同，新加坡直至 2022 年方廢除同性戀刑事化的法例。就 LGBT 能見度而言，三地皆是興起中的亞洲酷兒社會，尤其是以台北為代表城市的台灣（Yue & Leung, 2015）。台北每年皆舉辦亞洲地區規模最大的同志遊行，參與人數經常超過十萬（Wen, 2014）。2014 年，

新加坡的「粉紅點」(Pink Dot SG)活動吸引了26,000名參與者(Aw, 2014)。而香港的「一點粉紅」(Pink Dot HK)在2015年吸引了約15,000人(Grundy, 2015)。

六十歲的受訪者Joey來自新加坡的勞工階級家庭，她緬懷自己在亞洲各地移動和工作的經歷。她為自己在愛情與工作方面的冒險自豪：

我到處混，算上一夜情的話，女朋友沒有一百個也有五十個。交往超過一年半以上的，大約十個左右。我覺得自己有四個好老婆。她們現在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可以隨時打電話跟她們聊天

Joey在訪談進行的公共場所大聲說話，期間有朋友們來訪、拍拍她的肩膀，被她注意到時會咯咯傻笑。外表陽剛的Joey，對於自己在公眾場合引人注意的能力流露興奮之情。她毫不忌憚地談論自己人生的熱情所在——「性和電單車」，還有需要「一定程度強悍」的危險工作。Joey在香港、日本和新加坡做過司機、商人、酒店小姐、酒保、卡拉OK酒吧和夜總會經理。與同事之間有同性浪漫關係是尋常事。即使在一段與男性的露水情緣中誕下一名女兒，但Joey仍否認自己愛上對方。相反，她堅持自己是「愛上了他的Kawasaki電單車」。

在整場訪談中，Joey一再宣稱「在所有地方中，我最喜歡香港」。這種宣稱總發生在意想不到的時刻，例如當她突然意識到我是香港人。我問她為甚麼，她解釋：「香港是個嶄新的

城市。地方快人又快。混亂但強悍。」然後，訪談繼續，直到下一次她又突然表達對香港的喜歡。回顧過去，Joey於1970年代中在殖民地香港工作。那時，資本主義在香港方興未艾，同時一種擁抱文化混雜性的本土身份認同正在形成。世界主義和嶄新的華人現代性並駕齊驅，使香港文化異於鄰近的台灣和新加坡。

陳奕麟在研究這三個地區的大眾文化之興起時，提到不同的種族和民族起源的組成，會帶來不同的「民族主義、殖民主義和市場資本主義的交互作用」關係（Chun，2013，48）。由於殖民政府致力淡化中國民族主義的力量，對「大眾文化去政治化」和文化空間去國族化，使得香港文化出現「某種跨國、跨文化的邏輯」（同上，48）。

陳奕麟參考李歐梵（Lee，1999）對二戰前上海與戰後香港都市化崛起的比較分析，恰如其份地總結香港的地緣政治位置：

這個自由市場港口（開創了一個主要由功利主義強制驅動的現代世界體系）建立了一種去政治化的真空狀態（正面迎擊中國民族主義），（就算不是極力推動也）促進了對外來（而非本土）現代性的吸收，而這成為其世界主義文化的基礎（Chun，2013，63）。

描述昔日香港為一個本質上矛盾的地方——「嶄新的」、「混亂但強悍的」，以此指陳香港的現代性，及其所受到的各種影

響。人們可以將混亂理解為對外來文化元素的吸收，呼應陳奕麟所說的「一種去政治化的真空狀態」；或將之理解為是對一個正在發展本土性的城市的描述，一種不同於新加坡的英國殖民主義形式。

在講述香港是短期工作和居住的最佳地方的生活經驗時，在這座城市過往賦予她的文化想像裡，以及當眼前香港來的研究者的出現不斷喚起她對這城市的情感時，Joey皆有意識地轉而對「（多樣）華人現代性」（Chinese modernities）（Martin & Heinrich，2006，117）進行檢視。Fran Martin和Larissa Heinrich呼籲我們注意「『（多樣）華人現代性』中的多樣性」，其中「各種版本的、華文為底的文化，不只是相異的現代歷史下的產物；它們亦記錄了不同的殖民主義經歷；並與地域上和政治上的『華人性』，以及其他現代性形式（蘇聯、歐洲、日本、美國）產生不同的關係」（Martin & Heinrich，2006，117）。

一位居於新加坡的受訪者對於香港的緬懷，乍看之下似乎是為了在熟食中心的餐桌上拉近距離，但更深層的意義是其所召喚出的英國殖民主義之下的比較現代性（comparative modernities）。藉由宣稱對一個與自己生活經驗既近又遠的地方情有獨鍾，Joey立即回憶起早年的跨國移動經歷，那時她在酒吧和夜總會工作，女同事和男客人來自相異但相互聯繫的亞洲各地。當多樣的華人現代性在Joey的描述中相互映照，亦提醒了我們她的情慾冒險既短暫又多樣，而這亦表示她生活在不穩定和流動之中。

Joey 藉由講述她大膽妄為的冒險、在公眾場合向我們描述那些故事，表現其陽剛特質。在整場訪談中，她強調自己可以「行動自由」和「隨時起行」。與 Gin 媽媽相似，他們的高度移動性常常遭被撇下的家人視為不負責任。這也可以被理解為「Tom 陽剛特質」之特徵（Sinnott, 2004, 146）。因此，我們必須思考 butch 生成的複雜過程，以及促成 butch 身份型構的文化環境。

Butchness、保護與禮貌

對女同志或有同性慾望女性的民族誌研究，經常會略為提及日常生活的 butch-femme 性別角色的政治與展演（Chao, 2008；Davis & Kennedy, 1994）。稍稍不同於早期就 tom-dee 身份和關係的討論，Megan Sinnott（2012）以亞際視角研究韓國流行文化在泰國帶來的新興性／別類別——泰國年輕酷兒女性的柔性陽剛特質表達，以及此些新興類別對浪漫關係的影響。Butch-femme 性別角色作為一種分析類別和美學類別，用以理解女同志社群和情慾主體意識之型構。雖然 butch-femme 關係早被視為女同志歷史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但重新探討特定體現和性別表達形式出現的複雜原因，依然有其價值。

對有同性慾望的女性而言，陽剛特質往往關乎提高女同志能見度，同時表明自身對傳統性別角色的抵抗。正如六十一歲的受訪者阿安所述：「這也是為了保護自己和保護他人。」阿安在鑽石山的寮屋區長大，十一歲就開始做童工：

我的家人送我去工廠做蠟燭。我通常早上上學。那其實只是一所臨時學校。你知道的，我現在回想，那不是真的學校。它是我們現在稱為非法僭建的天台屋（笑）。由基督教團體營運……下午兩點到六點半，我在工廠工作。我賺夠錢給家人，又可以買點心給自己和朋友。我感到非常自豪。我照顧其他人！……這種照顧他人的觀念源於我的成長環境。係我自己擺嚟要照顧我的愛人囉。

當我追問她所說的「我自己擺嚟」為何意時，阿安解釋：

我一直提前計劃生活。我認真對待和每位女友之間的關係。每段關係我都會寫遺囑，換一位女友就改一次內容（笑）。你知道，我覺得自己作為一個女人的責任，就是保護女人。

在稍後的對話中，阿安解釋她一直視調和了中華陽剛特質與陰柔特質的粵劇伶星任劍輝為榜樣。作為最受歡迎的粵劇演員，任劍輝主要扮演文武生，符合華人社會女性觀眾對理想華人男性的文化想像。她在粵劇電影銀幕上展露了許多令人傾慕的特質——有道德正義感的男人、風流倜儻但對愛人忠貞不二的美男子、淡泊名利的書生（洛楓，2002）。任劍輝極善於「扮演『直』男，這是一種角色範式，其中包括孝子、溫潤夫婿、慈父或仁帝」（Tan，2000，206）。她從事常見的戲劇演出——「反串」，「在性別、年齡和／或階級的連續體中，進行種種可能的『僭越』」（Tan，2000，206）。她的長期合作伙伴——白雪仙，與她在銀幕內外皆是一對浪漫的神仙眷侶。

1950年代，任劍輝和白雪仙在唐滌生的創作加持下，成為粵劇電影界無人可比的領銜「生」（男角）「旦」（女角）。二人的夥伴關係幾近神話，她們的戲內合作也在日常實踐中成真——二人一同生活，並且經常攜手現身於公眾場合。

作為一名觀眾，阿安對任劍輝的欽佩之情促使她從公務員一職退休後便開始學習粵劇。為了和其他女性粵劇同好見面，她每周至少參與練習兩至三次。她們每周聚頭鑽研粵劇藝術、排練劇本、扮演她們仰慕的銀幕角色。這樣的排練場所變成了「同性交誼環境」（homosocial environment）（Sinnott, 2013, 333），一種「一般空間」（generic space[s]）（Wilson, 2004, 120），女性在其中建立親密友誼和浪漫關係卻不會被揭露為同志或女同性戀，而是一種以粵劇之名創造和擴展的親密理解。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已婚女性、年輕女子和自梳女⁵一直是任劍輝最忠實的粉絲群。阿安作為一名陽剛女性，自視為任劍輝的化身，如紳士般為愛人承擔重責，如父親般愛護愛人的孩子。我們可以將她對愛人的保護和照顧進一步聯結到更廣泛的社會性別角色——家庭支柱。

5 「自梳女」指起誓終身不婚的華人女性，字面意思指自行梳理頭髮的女人。這種不婚實踐始於十九世紀末，起源於華南珠江三角洲地區。自梳女通常從事絲織工業，後來也包括服務富裕家庭的幫傭，賺錢扶養家人。更深入的研究可參考Ye（2008）和Bailey（2012）。

在另一場訪談中，六十五歲的洋洋對自己的「女性陽剛特質」（Halberstam, 1998, 1）則另有看法。不同於自視為保護者的阿安，洋洋自述「斯文和有風度」是別人接納其女性陽剛特質的主因。洋洋在一家中型公司任職軟件工程師，五十多歲時因嚴重疾病而提前退休。她的第一段女女戀情持續了十年。對於自己的陽剛性別表現，她說：

我第一任女朋友的父母很喜歡我，當我們是兒子和女兒。我不是自己讚自己，但我想我一直都是個好女孩。我斯文有風度，尊重長輩，即使穿男裝剪男仔頭，幸運地，她的父母還是對我很好。我的前任一直自認是直女。當時我覺得一定是因為我很聰明又有才華，才會有一個直女女朋友。但我知道她總有一天會結婚。我媽媽警告過我。她不想我受到傷害。回想起來，她是對的。但當你墮入愛河的時候，媽媽說甚麼都是白費。

洋洋的陽剛特質被解釋為斯文禮貌的延伸。在尊崇敬老文化的社會中保持有禮，使她不需因其與眾不同的性別化身體而遭受審視。尊敬長者的禮儀，涉及到儒家美德提倡的孝悌——侍奉父母、長輩和祖先（Sigley, 2002）。即使第一任女友為了結婚而離開她，洋洋仍然持續與自認為異性戀的女性們開展一對一情侶關係。她在從事資訊科技行業時穿男裝，偶爾在主管到訪她的工作場所時穿著較女性化的西裝外套。早期女同志歷史裡的 butchness 身體政治長期受到檢視，以女性身體展演陽剛特質，有助創造出能開拓特定生活方式的身份認同（Wieringa & Blackwood, 1999, 15）。

總結

總結而言，本文探究女性陽剛特質的體現意義，述說關於渴望、亞際移動、粵劇、家庭義務和個人尊嚴的故事。我旨在檢視女性在社會世界的經歷以及其文化生活的豐富層理，如何影響女性之間的同性慾望。在受訪者身處的時代，女同志情慾行為飽受被污名化的威脅，甚過來自刑事化所帶來的威脅，儘管如此，她們仍然根據社會上普遍對女性和有同性慾望女性的態度，在浪漫關係或職業選擇上作出決定。本研究選擇這三個研究場域，以辨識亞際的文化流動和相互聯繫的歷史。

本文的首要目的是以結合社會學民族誌敘事與文化分析的跨學科取徑，理解年長女同志和雙性戀女性之間的同性慾望和實踐。我在這個被高度污名的話題上如履薄冰，遭逢的擁有女同志慾望的華人女性，大多寧願以閒聊的方式而非正式的訪談，分享她們異中求存的生活經驗和文化想像。

我首先探索關於渴望和等待的文化概念，以展示在異性戀婚姻面前，愛和親密關係如何被重新定義以符合「短暫但值得」的標準。同性關係的社會意義並未與制度性定義綑綁，因為這些女性所處的時代根本沒有同性關係的制度性定義；相反地，受訪者在較寬容對待性偏差（sexual deviancy）和性別越界（gender transgressions）的環境底下，得以形塑自身在關係中的慾望。這些越界實踐對於她們成為擁有同性慾望的女性至關重要。陽剛特質的性別表達和 butch 的身份認同，也深刻影

響了受訪者如何解讀自己的求愛行為、如何理解同性浪漫關係的結局。

其次，我就方法論分析：一位來自勞工階級的陽剛新加坡受訪者召喚出符合世界主義想像和華人現代性形式的香港，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亞際流動（flows）和移動性（mobilities）。為了開拓能無憾生活的空間，Joey 遠走他鄉投身於那些經常被視為既不正當又貶低女性尊嚴的職業。當實踐性慾必然得逾越邊界時，她以堅強、獨立的女性之姿，跨越了性別角色的疆界。

最後，我討論了 butchness / 陽剛氣質的兩種展演面向：一為受保護和保護他人的雙重角色，二為專業有禮的展現。女同志研究裡的民族誌和文化再現廣泛地記錄了女性的陽剛特質（Halberstam, 1998；Wieringa, 1999；Wilson, 2004）。陽剛特質在以性別為基礎或同性交誼的親密關係中現身，打開了遇見同性慾望和建立浪漫關係的空間。專攻反串角色的粵劇名伶典範任劍輝，成為一種文化介入（cultural intervention），部份受訪者因此得以定位其女同志凝視與觀影位置。女同志慾望與關係往往缺乏社會和公眾認可，權利論述也鮮少存在，如此，本研究的受訪者以不同的情慾實踐和生存策略，繞過或干擾了嚴格的性別階層。最後，我冀望這項研究能增進我們對亞洲地區的年長女同性戀和雙性戀女性之理解，並推動區域歷史之修正，將被邊緣化的聲音和被遺忘的故事納入其中。

原文出自：Tang, D. T. S. (2022). Of longing and waiting: An inter-Asia approach to love and intimacy among older lesbians and bisexual women. *Sexualities* 25(4): 365–380.

鳴謝

作者首先要感謝所有研究參與者的分享。亦感謝鄧詩薇 (Shawna Ser-Wei Tang)、黃寶珠、同平安和陳易君為研究項目提供的協作與幫助。

參考資料

- Aw, C. W. (2014). 26,000 turn up for annual LGBT rally at Hong Lim Park: Pink Dot spokesman. *The Straits Times*, 28 June. Available at: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26000-turn-up-for-annual-lgbt-rally-at-hong-lim-park-pink-dot-spokesman> (accessed 1 September 2019).
- Bailey, P. J. (2012). *Women and Gender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London: Red Globe Press.
- Blackwood, E. (1999). Tombois in West Sumatra: Constructing masculinity and erotic desire. In E. Blackwood & S. E. Wieringa (Eds.), *Female Desires: Same-Sex Relations and Transgender Practices Across Cultures* (pp.181–20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lackwood, E. & Wieringa, S. E. (Eds.) (1999). *Female Desires: Same-Sex Relations and Transgender Practices Across Cultur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hao, A. Y. N. (2001). Drink, stories, penis, and breast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40(3/4): 185–209.
- . (2008). Death rituals, kinship ethics and queer friendship: Elderly lesbian tomboys in Taiwan.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6: 153–194.

- . (2017). Queer ethics of aging together: "Moving house" fourth visit. *Journal of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40: 5–51.
- Chun, A. (2013). Critical cosmopolitanism in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modernity: Reflections on discursive imagination in Hong Kong and Shanghai. *Postcolonial Studies* 16(1): 46–65.
- Davis, M. D. & Kennedy, E. L. (1994). *Boots of Leather, Slippers of Gold: The History of a Lesbian Communit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DeWalt, K. M. & DeWalt, B. R. (2002).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 Guide for Fieldworkers*. Walnut Creek, CA: Alta Mira Press.
- Fredriksen-Goldsen, K. I. & Muraco, A. (2010). Aging and sexual orientation: A 25-year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on Aging* 32(3): 372–413.
- Grundy, T. (2015). Sea of Pink: Over 15,000 attend gay equality rally as Hong Kong lags years behind on LGBTQ rights. *Hong Kong Free Press*, 20 September. Available at: <https://hongkongfp.com/2015/09/20/over-15000-attend-gay-equality-rally-ashong-kong-lags-years-behind-on-lgbtq-rights/> (accessed 15 April 2018).
- Halberstam, J. (1998). *Female Masculin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Iwabuchi, K. (2013). De-westernisation, inter-Asian referencing and beyond.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7(1): 44–57.
- Kehoe, M. (1989). *Lesbians Over 60 Speak for Themselves*. New York: Harrington Park Press.
- Kong, T. S. K. (2012). A fading Tongzhi heterotopia: Hong Kong older gay men's use of spaces. *Sexualities* 15(8): 896–916.
- . (2019) *Oral Histories of Older Gay Men in Hong Kong: Unspoken but Unforgotte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Lee, L. O. F. (1999).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4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artin, F. & Heinrich, L. (2006). *Embodied Modernities: Corporeality, Representation, and Chinese Cultur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Roy, A. & Ong, A. (2011). *Worlding Cities: Asian Experiments and the Art of Being Global*.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 Sanders, D. (2015). What's law got to do with it? Sex and gender diversity in East Asia. In M. McLelland & V. Mackie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exuality Studies in East Asia* (pp.127–149).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 Sigley, G. (2002) Keeping it in the family: Government, marriage, and sex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M. Jolly & K. Ram (Eds.), *Borders of Being: Citizenship, Fertility, and Sexua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pp.118–153).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Sinnott, M. (2004). *Toms and Dees: Transgender Identity and Female Same-Sex Relationships in Thailan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 (2012). Korean-pop, tom gay kings, les queens and the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 of sex/gender categories in Thailand. *Asian Studies Review* 36(4): 453–474.
- . (2013). Dormitories and other queer spaces: An anthropology of space, gender, and the visibility of female homoeroticism in Thailand. *Feminist Studies* 39(2): 333–356.
- Tan, S. K. (2000). The cross-gender performances of Yam Kim-fai, or the queer factor in postwar Hong Kong Cantonese opera/opera film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39(3/4): 201–211.
- Wen, L. (2014). Taipei gay pride parade draws tens of thousands. *Taipei Times*, 26 October. Available at: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front/archives/2014/10/26/2003602927> (accessed 22 July 2019).
- Wieringa, S. E. (1999). Desiring bodies or defiant cultures: Butch–femme lesbians in Jakarta and Lima. In E. Blackwood & S. E. Wieringa (Eds.), *Female Desires: Same-Sex Relations and Transgender Practices Across Cultures* (pp.206–22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A. (2004). *The Intimate Economies of Bangkok Tomboys, Tycoons, and Avon Ladies in the Global City*.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Yau, C. (Ed.) (2010). *As Normal as Possible: Negotiating Sexuality and Gender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Ye, Z. (2008). Zishu nü (自梳女): Dutiful daughters of the Guangdong Delta. *Intersections: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17. Available at: <http://intersections.anu.edu.au/issue17/ye.htm> (accessed 12 November 2019).
- Yue, A. & Leung, H. H. S. (2015). Notes towards the queer Asian city: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Urban Studies* 54(3): 747–764.
- 洛楓 (陳少紅)。(2002)。*《盛世邊緣：香港電影的性別、特技與九七政治》*。香港：牛津出版社。

故事三 The GAYLINK： 下一世，我要做 Gay Man

Theo 今年七十五歲，1948年於香港出生。TA 曾經有一個稱號叫“Gaylink”，因為幾乎每位去過三藩市的香港男同志都會認識她。1970年代，Theo 前往美國讀書，後來在三藩市工作及定居，住所地址不知怎的變成接待港台同志的「客棧」。她「睡過」的男同志，可能比很多男同志都要多。年輕時，Theo 曾享受夜夜笙歌的 Disco 生活；如今，Theo 仍然希望有一個為性／別小眾而設的共居生活空間。

1978年，美國三藩市，4506 California Street。

凌晨兩點，的士停在屋前，一名亞裔男生下車。大閘沒有上鎖，他沿樓梯拾級而上。尚未轉角，一股大麻氣味撲面而來，看來一樓的兩個洋妞今晚過得挺寫意。他快步走上二樓，打開大門，直入壁爐旁邊的睡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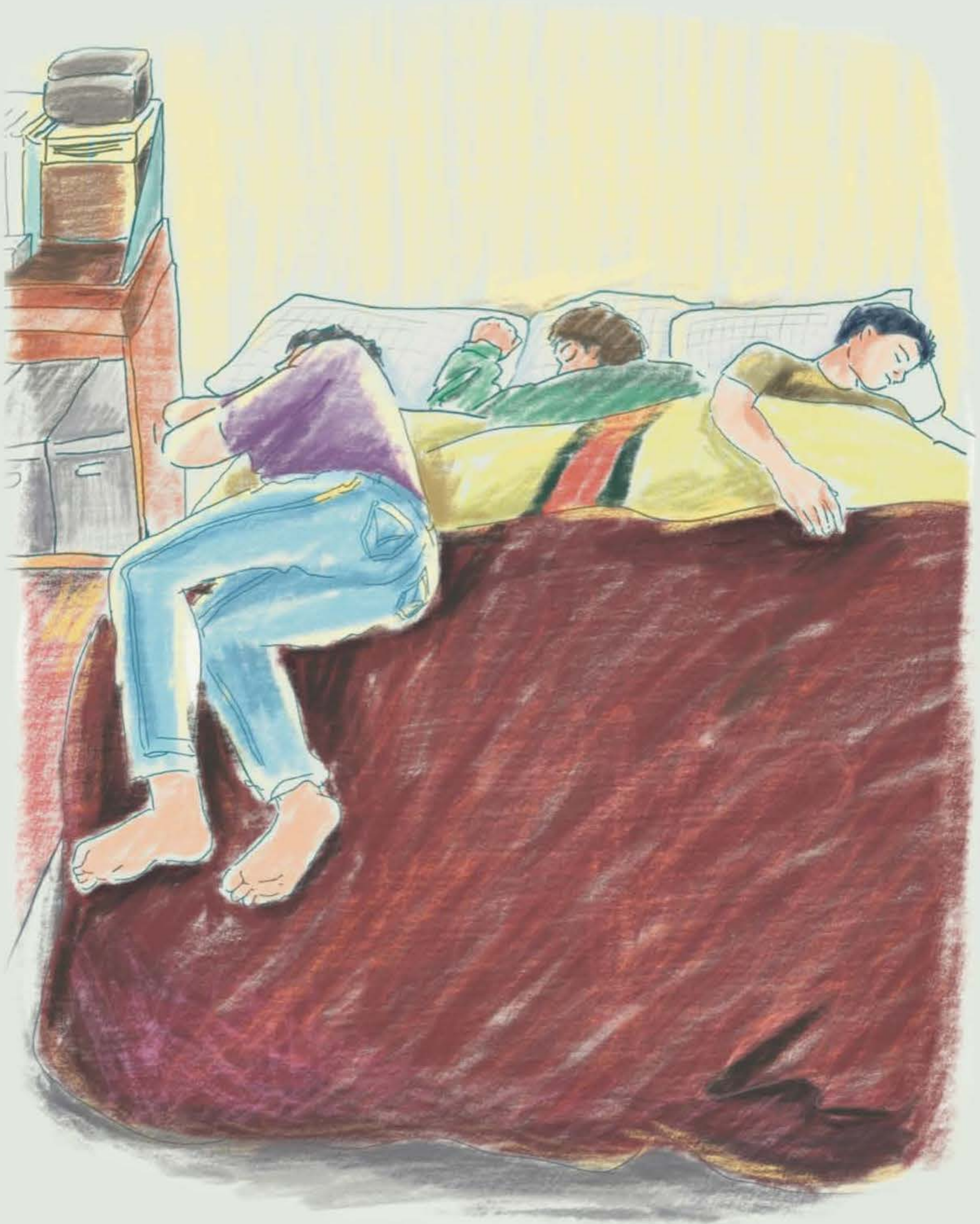
King Size 床的左邊已經躺着一名男生，素未謀面，睡得正香。他見怪不怪，躡手躡腳爬上另一床邊，也懶得換衣服。他從桑拿回來，已有倦意，碰上枕頭就旋即入睡。

早上六時，鈴聲大作，兩名男生鼻鼾雷動，完全不受打擾。突然，床上正中央有一個人霍地坐起，在半夢半醒之間，拍熄了鬧鐘。

TA¹是 Theo。

今天剛好要輪早班，Theo 匆匆梳洗之後，換上酒店的牛仔布制服，抓過車匙，下意識奪門而出。開門一刻，瞥見視線水平位置的便利貼，上面寫着一個中文姓名、航班編號，以及抵達時間。「差點忘記了放工要去接機。」Theo 心想，一手撕下便利貼，塞入衫袋。

1 「他」曾泛作男或女的第三人稱代詞，後因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及西方女性解放思潮，「她」字逐漸成為女性的第三人稱代詞。近年，網絡興起使用拼音「TA」作為性別中性的人稱代詞，Theo 同意以 TA 作為自己的人稱代詞。



三藩市的「龍門客棧」

「一年五十二個星期，我們家應該只得幾星期是沒有客人借住。」Theo 笑說。香港人、台灣人，還有各種族裔的美國人，有男有女，前來三藩市可能是旅遊、探親、工作——唯一共通點是同志。「他們不一定認識我，多數只是通知我一聲就過來。」

1975 年從溫哥華回到三藩市之後，Theo 與兩名香港女同志在著名同志區 Castro 合租。三藩市的性／別小眾人口比例是全美各個城市之中最高，性／別小眾的人口數量也在全國排行第四。Theo 當年曾豪言：「住在三藩市，哪天出街遇不到一個基，你就應該要自我檢討，考慮搬屋。」

從銀行業轉至酒店業之後，Theo 做過幾個部門，待得最久是前枱。由於家教甚嚴，TA 本來比較拘謹和內斂，但是做前枱需要接觸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TA 慢慢習慣與人社交，也因此與男同志結下不解之緣。「酒店業較少女同志，就算有都是去推行李，但是前枱通常有男同志，而且非常顯眼。」工作時間分三更，Theo 很快就弄清誰彎誰直，但是同事之間並無芥蒂，彎彎直直，有講有笑。

Theo 與男同志同事混熟後，也認識了他們的朋友，大都從事文化藝術工作，平日的節目就是一起看電影。後來 Theo 要搬屋，與一對華人情侶和另一位酒店的男同志同事合租，落戶 4506 California Street。

「4506是最好玩的一間屋。」地下是共用的車房，一樓住的是一對外籍姐妹，Theo與三位朋友合租二樓及閣樓，頂層還有一個小花園。二樓是客廳和兩間睡房，閣樓另有一間睡房和洗手間。業主是中國人，屋內裝修古舊，客廳有一個沒有實際用途的壁爐。同事養了一隻白色長毛貓，長期掉毛，客廳梳化永遠都是一片白濛濛，但是無礙單位成為龍門客棧。

「我至今仍然不知道，到底是誰將4506廣傳開去。」Theo說。地上本來是沒有路的，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久而久之，只要有香港同志去三藩市，基本上都會到訪4506。好客東主如Theo，還會開着Volkswagen Beetle，運送諸位男同志去桑拿，他們盡興回來後，就直接睡倒在TA的床上。「當時倒也沒有吵醒我，現在一個人反而睡不穩——可能是因為沒有了他們的鼻鼾聲。」明星、演員、設計師、髮型師、經理人……曾與Theo同床共枕的男人多不勝數，有名有姓，無名無姓，說出來或許羨煞一眾男同志。

慢慢地，大家開始尊稱Theo做“Gaylink”。

其實借宿4506的不止是男同志，也有女同志。Theo在三藩市也有去Les吧，其中一間是Peg's Place，外牆漆上粉藍色，在當地可說是首批Les吧，歷史悠久。可惜，TA從沒在當地的酒吧搭上任何人。「你以為自己好butch地走入去，但是總有身型比你更大的butch在場。」她們通常穿大格仔恤衫和牛仔

褲，看見 Theo 反而視 TA 為獵物，有時還會主動搭訕，Theo 唯有敷衍幾句，應酬作罷。

在女同志眼中，Theo 是女人；在男同志眼中，Theo 又變成男人。在三藩市居住的日子，有時 TA 只是在街上走過，路旁的男同志性工作者也會對着 TA 搔首弄姿。又有一次，Theo 坐在書店一旁看書，有人走近，留下字條，問 TA 會否 “suck my cock”，然後站在門口守候。「我都唔知走定唔走。」TA 哭笑不得。陌生人單憑外表，的確有可能錯認 Theo 的性別；但是離奇地，連男同志朋友也曾對她有意思，要求另一半詢問 TA 是否可能來一場「三人行」。“Never the right kind!” 憶述至此，Theo 也忍不住怪叫。

「當時不少人對男同志仍然相當避忌，但是我從來都沒有，他們可能因此覺得可以與我做朋友。」Theo 說，「當然，首要條件是我不會跟他們爭仔，哈哈。」TA 直言自己享受朋友三五成群，一大班人日見夜見，見識過彼此最邈遠的一面，感情非常要好。「我的朋友是 from all walks of life。他們帶給我很多見識，我從他們身上學習了很多。」

黃金八十年代 夜夜笙歌

1981 年 12 月 31 日，Theo 回到香港，但是 TA 沒有回家借宿。「返屋企瞓就有得成日去街啦嘛！」TA 說得理所當然。作為 Gaylink，Theo 絕非浪得虛名，只消一個電話，男同志的家

門就為 TA 而開。一個月後，又有另一位男同志為 Theo 提供住宿，這次不只是一間房，而是整個單位，租金全免。「我記得層樓好細，肥少少都入不了廁所，雪櫃要放客廳。」單位雖小，但是已經夠 TA 一個人住，最重要是位於上環普慶坊，方便 TA 晚晚落 Disco Disco (DD)。

「當年每日只做一件事，一到晚上，大家就會 dress up 落 DD，是 part of life。」Theo 笑言，香港的同志會打扮得花枝招展落 DD，不似他們在三藩市般隨便，只穿同一套衛衣棉褲落吧。「八十年代，大家都捨得使錢買衫，也不擔心賺不回來。」著名時裝品牌，Theo 如數家珍：「Yohji Yamamoto、Kansai Yamamoto、Issey Miyake……Jean Paul Gautier 已經是後期。」TA 每天上班必定會去商場行一圈，止一止心癢。時至今日，Theo 仍然喜歡儲眼鏡，粗框膠眼鏡是 TA 的標誌。上一次出席宴會場合，Theo 穿上西裝，配了一條顏色鮮艷的領呔，在人群之中甚為凸出。一到跳舞環節，TA 第一時間加入「火車頭」，跟着「舞龍」滿場飛。

DISCO DISCO



DD 在港島最出名，九龍的 Waltzing Matilda 則是外籍人士聚腳點，還有一間 Cage 位於尖沙咀加拿分道金巴利街附近。DD 冒出頭來之前，有一間基吧叫 Dateline，日間是餐廳，晚上才搖身一變做基吧。Theo 表示，香港當時沒有多少女同志酒吧，直到 Propaganda 的年代，才有更多不同場所。

夜夜笙歌，醉生夢死；日日上班，烏眉瞌睡，可說是 1980 年代的寫照。Theo 直言，她與所有男同志已經見到熟口熟面，因為來來去去都是同一班人。落 DD 不外乎飲酒、跳舞、傾偈，到底是甚麼吸引 TA 每夜報到？「落 DD 最舒服，不似在其他場所，擔心遭人白眼，或者打量你到底是男是女。」Theo 說，DD 就像他們的 common room。

然而，愛滋病毒於同期廣泛傳播，在燈紅酒綠的舞池上籠罩了一層巨大的陰影。1981 年 6 月 6 日，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通報全球首宗愛滋病毒感染案例，愛滋病開始於世界各國蔓延，香港也於 1984 年發現第一宗感染個案。Theo 回港時接待 TA 一個月的男同志，後來也因為愛滋病離世。「我不記得是哪年了，但是日子記得清楚，11 月 16 日。」對方患病後，Theo 不時探望，又為他尋找外傭照顧日常起居。「我們是好 close 好 close 的朋友。」

想做 Gay Man 只是貪好玩

「總之我他日升天的時候，麻煩大家用念力幫助我，make sure 我下世做 gay man。」Theo 誓神劈願。TA 現在開始學西班牙文，希望下一世贏在起跑線。「不然我今世對他們這麼好幹嗎？就是為了培養下一世的關係。」TA 打趣說。Theo 鍾情古銅膚色，最好生下來是拉丁裔，性格熱情豁達，「不似法國人般小氣——對了，我還要留鬚，body 不用三角形，但是一定要 keep 得 fit。」

Theo 不是沒有幻想過做 trans man。回港時，TA 大約三十歲，身邊已經有朋友完成上半身的乳房切除手術，成為跨仔。「他最開心就是可以打大赤肋周街行。」TA 看在眼內，覺得變性好像也不錯，「我計過，我做了三十年女人，跟住做三十年男人，好似幾好啱。」六十歲之後呢？「人在三十歲，只會覺得六十歲好老。」TA 大笑。

當年未有付諸實行，主要是因為 Theo 擔心手術後有後遺症，而且要永遠服食荷爾蒙藥物。TA 想像不到，作為跨性別，是要如何追求異性戀女性。然而，隨着年紀漸長，TA 也開始明白到，鍾意一個人其實不用理會任何事情。

「況且，gay man 好玩好多，我只是恨好玩。」

做 straight man 不也可以好玩嗎？

「他們有幾好玩呀？框框又多，又有 in laws，生了幾件之後，你就乜都有得玩——gay man 不就是悶得滯才開始養細路嗎？」人各有志，現實中的確有不少男同志渴望生兒育女，性／別小眾圈內也有相當多彩虹家庭。

Theo 表明最恨去沖涼房，「責任沒有那麼大，不用顧前顧後，玩完就算，之後又可以照常工作，生活保持兩條線，我覺得這樣很好。」TA 認為，男人能夠分開性與愛，女性卻始終需要情感依附，「甚少有人只是去沖涼房，回家不用有一個 partner。」Theo 說：「有得揀的話，我梗係揀 gay man 啦。」

五個女人育成一個 Super Butch

“I grew up with two mothers, one grandmother, and a father, in the same household.” 簡單一句，未能完全道出箇中複雜的關係。Theo 出生的時候，爸爸已經四十九歲，但是年紀比祖母還要大，因為祖母是爸爸的繼母。弟弟出生之後，也不是與 Theo 同住，而是在另一個家庭成長。

家中還有兩名傭人，一屋五個女人，生活盡是八卦是非。

「假如 Theo 是男仔，先生對她可能會更好。」

「先生想有個仔，TA 才会有細佬。」

她們以為 Theo 年紀還小，聽得到也聽不明白，肆無忌憚地竊竊私語。「如果不是她們日日講，灌輸這些重男輕女的思想，說不定我也有可能是直的。」

Theo 出生於 1948 年，和平後的社會依然動盪，國共內戰導致大量中國大陸難民逃難到香港。Theo 小時候住在駱克道的唐樓，其樓梯底成為無家者的棲身之所，TA 仍然記得那陣揮之不去的氣味。家人擔心治安，為免 Theo 誤入歧途，對 TA 管教甚嚴；TA 的生活因此只有兩點一線，每天只能來回住所和學校，就連課外活動也不容參加，以免 TA 哮喘病發作。

乖乖待在家中，也阻止不了青春期降臨。升中後，Theo 每個學期都會暗戀一名女同學，即使不能出街，TA 也會採取電話攻勢。一個學期下來，天天講電話都講不出苗頭的話，下個學期就會改撥另一個電話。雖然就讀女校，但 Theo 一直結識不到性／別小眾的朋友。直到中五，TA 才獲准出街。那一年，學校舉辦賣物會，兩名 butch 主動搭訕，Theo 的人生從此翻天覆地。「原來 I am not alone！」其中一名 butch 的暱稱是馬騮，帶領 Theo 盪進派對森林，結識了另一群 butch。

普普藝術於 1950 年代興起，加上第二波女權主義運動於 1960 年代抬頭，年輕人渴望在二戰後開拓新生活，女性形象出現極大轉變。叛逆的瑪麗官（Mary Quant）推出迷你裙、緊身褲，即使受到保守人士批評，設計還是廣受年輕女孩歡迎。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的豐滿曲線成為歷史，取而代之

是崔姬（Twiggy）的短髮 Bob 頭、空靈大眼、嬌小個子、骨感身型，奠定此後數十年的時尚模特兒風格。當 Twiggy 穿上 Mary Quant 的 A 字裙，她是俏皮的小女孩；當她換上俐落的西裝，又能散發出不羈優雅的中性氣質。

Theo 喜歡時裝，會追看 fashion show；TA 有兩個衣櫃，一個放男裝，一個放女裝。「我不討厭女裝，最緊要着得靚。要麼不着，要着就着得肆肆正正。」早上出門上班，TA 是 1960 年代的 MOD Girl，穿緊身 A 字裙，套上 Go-go boots，襯妥手袋；入夜後，派對前，TA 則化身成 super butch，換上筆挺西裝，踩着皮鞋去派對。家人當然知道 Theo 有兩個衣櫃，一眾朋友西裝筆挺，在派對前於 Theo 家中集合，家人卻從不過問。「日日如是，就像 Dr. Jekyll and Mr. Hyde，樓下車房的麻甩佬應該會以為我是精神分裂。」Theo 笑說。

被困在家多年之後，Theo 第一次遇上志趣相投的朋友，人生終於由黑白色變成彩虹色。中學畢業後，摯友之一表示會去美國讀書，Theo 問准父親就跟着一起去。「爸爸平日與我沒有半句話，唯獨臨走前叮囑我一句——不要嫁鬼佬。」

年長性／別小眾的理想國度

1969 年去到美國，Theo 第一個定居的地方是中部的堪薩斯州（Kansas）。畢業後去洛杉磯，因為失去讀書簽證，只能找工作維持居留身份，九個月後又轉到溫哥華。TA 直到 1975 年才落

戶三藩市，一住就是六年。Theo 形容在香港成長的日子是「非常 deprived」，去到美國才一步一步蛻變成今日的 Gaylink。

「我離港只是十三年，但是大家都以為我是在三藩市出世。」Theo 近年也曾到訪三藩市，但是並不打算回去定居。「未至於要首選返去，當地的生活節奏太慢了，我行路都快過架巴士。」

當年回港後，Theo 從事染料行業長達十年，後來老闆因為香港的政治前景問題而結束生意，TA 也趁機放了一個悠長假期。因為關注食物健康，TA 開始了解有機耕種，還花了四個月時間環遊歐美的有機農莊，並於 1995 年與另一位農夫創辦有機農莊。Theo 的初衷只是想吃到健康的蔬菜，後來遇上另一位關注農業和永續生活的農夫，才開始推廣有機種植和生活。「社區支持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 一詞尚未流行之前，Theo 已經參考美國的做法，引入 Box Scheme 賣菜，希望更多人以合理價錢買到健康又新鮮的蔬菜。

當年無心插柳成為香港農業的 CSA 牽頭人，也令 Theo 在今日反思年長性／別小眾的處境。「朋友之間聊天也有講到，目前似乎仍然未有針對 aged LGBT community 的倡議工作。」TA 認為就算不區分性／別小眾，確保人們老有所依本身就是基本需要。Theo 的朋友遍及世界各地，其中一位在澳洲墨爾本市中心開設了一間規模不大的護老院，名為 Elderly Chinese Home (安老之家)，更為失智症長者特設香港的巴士站和佈

景。另一位身處加拿大的中學同學，在多倫多設立了當地最大的非牟利長者服務機構「頤康」，主要服務華人社群。

Theo 在香港也認識一位朋友，在新界小規模地安排獨居長者共住，而且恰巧全是女性。TA 認為，假如能夠配合專業的醫療團隊，醫護人員都是性／別小眾就最理想。「直人太多 norms，在日常對話之中也會不知不覺流露。試想想，假如我是基佬，說起自己以前如何媾仔，護士卻同我講老公老婆或子女，實在難以暢所欲言。」

Theo 希望有一個為性／別小眾而設的共居生活空間，每個人都擁有獨立房間，不用因為生活習慣或爭廁所而爭執。煮食由中央負責，供應早餐至宵夜。大家可以選擇喜歡的活動：打橋牌、打麻將、按摩、看電影、唱 K，甚至跳舞也好，累了就自行休息——說着說着，根本就是當年三藩市的 4506。

「有些人可能想分開男女同志，我就沒有甚麼所謂——或者可以分樓層。」

「你住的那一層，不如就叫 Gaylink？」

「咁益我呀？」TA 大笑，「我覺得最理想是做到跨代共居，只要年青人願意花一定時間與長者相處，就可以獲得相宜的住宿。」Theo 從小由祖母照顧，與她相當親厚，「隔代相處始終

沒有原生父母那麼直接，而且別人的父母與自己沒有過節，比較容易尊重彼此。」

香港寸金尺土，Theo 也深明難以憑空變出一幢理想建築，TA 認為改變工廠大廈用途是目前最可行的出路。根據立法會的討論文件，全港目前有近 1,400 幢工廈。即使政府於 2018 年重啟活化工廈計劃，但是相關措施未有包括護老服務。重建工廈，需要繳付十足土地補價，費用高昂。整幢改裝的話，工廈需要位於商業、工業或其他指定用途（商貿）地帶，符合商貿用途，或者提供過渡房屋。假如要改變成非工業用途，目前只放寬用作文化藝術、創意產業及創新科技、電訊機樓及電腦／數據處理，以及放寬倉庫用途涵蓋貨物裝卸及貨運設施及可循環再造物料回收中心。² 近年少數獲批的申請，是位於西貢康定路住宅用地的五座工廈，城規會於 2021 年 11 月批准重建成安老院舍村。

不過，Theo 也相信在遙遠一點的未來，社會更加開放，或許未必需要為性／別小眾特設安老空間。有時，遇上初次見面的朋友，即使對方一開口就叫 Theo 做師姐，只要 TA 回一句「師乜姐」，對方也懂得立即改口叫「師兄」。「我現時的身份是阿爺，朋友都是這樣稱呼我。」Theo 仍有參與有機耕種的

2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活化工業大廈的進展〉。立法會 CB(1)1347/20-21(04) 號文件，2021 年 9 月 28 日。

事務，農友們並非性／別小眾，部份也有子女，但是彼此的溝通毫無障礙，大家從不在乎 TA 是直是彎是男是女。「當社會不再認為同志是另類，每個人的接受能力都有所提高，溝通上可能沒有這麼多界限。」

活在當下 最緊要今日開心

雖然最理想的共居生活，目前只存在於 Theo 的幻想國度，但是 TA 仍然能夠在自己家中宴請好友相聚。Theo 的客廳有一個高至天花的兩米闊邊櫃，一半的空間放滿 TA 歷年旅遊各地所搜購的杯杯碟碟。採訪當日，TA 正好相約了一班朋友在晚上聚餐，外傭 Fatima 正在廚房預備，好友來電詢問來否需要加餸。

「我們有海南雞、滷水牛腩、春卷、豬扒、沙律……你知道你最大食，看你覺得夠不夠……已經飽了？蛋糕是甜品嘛，如何當飯食？……你自己看着辦，總之你依時出現啦，拜拜！」

Theo 目前仍然留在香港養老，除了因為朋友眾多，另一原因就是外傭 Fatima——Theo 現時最重要的女人。「我只會愈來愈懶，怎會忽然勤力起上來？假如將來離開香港，去泰國生活應該是最可行。」

作為 Gaylink，家中待客無數，但是 Theo 從來沒同居的戀愛對象。「吸引我的通常都是直女，已經有男朋友或老公。」

對方往往因為身份危機、家庭壓力等問題，最後未有選擇同性關係，TA 語帶無奈，表示自己也沒有辦法。

「其實我鍾意同男性做朋友，男人最多 harass 你，但是女性有時會 intimidate 你。」Theo 坦言遇過不少表面溫柔的女士，內裡都有個 tiger lady，TA 情願對方在相識的第一日就以真面目示人。「我未遇過真溫柔，put me on the list，到時再畀考驗我。」TA 笑說。

況且，Theo 交遊廣闊，向來不愁寂寞。一年前，朋友送她一隻貴婦狗作伴，取名 Pinot。「老來得女，不知多好。」TA 樂意嘗試新事物，最近正在學習西班牙語，疫情完結後，各國一通關，TA 已經急不及待去旅行。問到 TA 會否想再經歷舊日時光，TA 沒有多想就說：「我覺得現時生活很好，為何還要回顧歷史？可能因為我根本沒有怎樣光輝過，所以也無從回顧，哈哈。」

論文二

都市密度中的日常情慾：

香港年長女同志與雙性戀女性民族誌

文／鄧芝珊

譯／謝莉娜 審訂／楊靜怡

我在公眾地方看到很正的人，當然會多看幾眼。我喜歡女性的身材曲線。我覺得好性感。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我會對自己說：「哇！那個身材太美了，太性感了！」我會感受到一股衝動，然後想到自己的年齡，知道自己應該沒有任何荷爾蒙了，但我依然被電到了。我依然有慾望。我想這是好事，對吧？我三十多歲時經常想，到我六十歲時應該會對性慾完全失去興趣了，現在我知道不是那樣的。還能感受到慾望不是件壞事。

—— 洋洋，六十五歲

我們總是，無可避免地，在創造空間與地方。

—— Massey, 2005, 175

引言

女同志與雙性戀女性的性慾與情慾空間，在酷兒空間、性相和地理學的學術研究中往往乏人問津（Lauria & Knopp，1985；Podmore，2001）。可以說，當代女同志地理學中關於女同志空間——無論是女同志的社交、文化或政治空間的研究，持續在縮減（Fobear，2012；Browne & Ferreira，2015）。而在相關研究中，女同志社群的批判性研究從都市社區的面向探究女同志的公眾能見度，有別於過往認為女性透過社交網絡而非商業空間建立關係的觀點（Podmore，2006；2013）。此外，都市女同志之相關研究以關係地理學及可移動性（mobilities）為切入點，分析女同志「在移動中創造地方」（mobile place-making）的經驗（Nash & Gorman-Murray，2015，187）。另一項空間研究書寫了加拿大女同志行動者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如何政治化都市空間，為女性主義者和女同志爭取權益，揭示修正加拿大 LGBTQ 歷史之必要（Podmore & Chamberland，2015）。

歷史上，社會階級一直是影響都市女同志的重要因素，勞工階級的女同志在酒吧聚會，而中產階級的女同志則傾向於舉辦家居派對（Ross，1995；Chenier，2004）。陽剛或自我認同是 T（butch）的女同志常常被排斥於女同志空間之外，因此有些

人會採取較中性的性別表達方式以適應當代女同志文化，或者轉換性別成為跨性別男性（Rubin，2003）。

從根本上將女同志情慾去性化、忽視女性的情慾慾望，導致在特定空間脈絡下的女同志情慾研究非常匱乏。正如六十五歲的洋洋在文章開首所言，她意識到自己的性慾能夠跨越年齡和身體界限後大為驚訝。我們在一棟繁忙商場內，一間擁擠的咖啡店內進行訪談，與鄰桌大概只有一英尺之隔。狹迫的空間無阻我們討論老年與女同志性慾的種種——或者說，都市的嘈雜喧囂隱去了我們的身份。即使我們暢談的主題背負污名，周遭坐客亦無動於衷。

我自2003年開始研究香港女同志和雙性戀女性居住、協商和顛覆的社會、文化與政治空間。在這座城市中，除了兩處為年輕女同志而開的卡拉OK酒吧外，幾乎沒有專屬女同志的空間。在本文中，我將透過圍繞十二位六十歲以上的香港年長女同志和雙性戀女性的質性民族誌研究，開展對香港社會空間的歷史分析。對具同性慾望的香港年長女性之研究，促使我重新整理社會空間的構成要素，並在城市發展的歷史軌跡上重繪女同志性空間的地圖。

我因此思索如何以一種新的方式，來解釋稠密城市中女同志情慾的空間實作（spatial practices）有何獨特不同之處，特別是從同性戀刑事化時代，到社會發展走向反歧視論述和「都市新自由主義」的生活經驗（Yue & Leung，2017，751）。我們如何

在日常生活中發現情慾空間實作？這項研究以香港為主要背景——城市密度是其鮮明特徵，也是其日常生活的一個面相。

以下將簡略介紹本研究採用的民族誌方法。我以余燕珊與梁學思就亞洲同志性慾特質所提出的「斷裂的現代性與都市新自由主義」理論矩陣為基礎，進一步發展我的論點，即在都市環境的生活經驗會令個體的女同志身份和情慾主體意識主張，隨時間和空間流轉而擴散和去中心化（Yue & Leung, 2017, 750-751）。根據實證資料，我檢視生於二戰後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女性如何因為日常生活中對社會關係和性別互動的想像、組織和管理方式，決意脫離性別角色規範。

英國殖民時期，獨立與現代的華人女性特質，與急速的工業化和社會轉型互動交織，使女同志慾望的空間實作別具文化特性。我將這種空間實作模式稱為「密度中的日常情慾」，以描述在都市發展和殖民現代性中探索性慾的方法。其中，成為具女同志慾望的女性不僅意味着為自身開拓另類的情慾空間，亦表示在個人生命歷程中從傳統性別角色抽身，並且重新定義年長一代女性的性別與情慾。物理空間密度並非理解香港都市發展和女同志慾望的唯一準則。相反，以交織性（intersectional）思考社會文化因素，如階級、性別、性相、年齡和世代，以及它們在稠密環境中的相互作用，提供一個理解香港年長女同志和雙性戀女性日常生活的框架。

這項研究填補了都市理論和亞洲酷兒學術研究的缺口，同時以華人社會裡年長女性的生活經驗拓展歐美關於都市研究和酷兒性相的辯論，並主張長者之情慾研究應納入女同志和雙性戀者的經驗。由於缺乏資本和資源，女同志的都市生活經驗往往不同於男同志（Valentine，1995；Tan，2015）。聚焦年長女同志和雙性戀女性的口述敘事，本研究旨在了解文化、工業化和密度等不同元素如何影響對同性慾望的理解、認同、促生和展演方式。

城市往往勾起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想像。即使近年的學術研究開始批評酷兒研究「對鄉村和非都會地區視而不見」，並敦促認識鄉村地區 LGBTQ 的生活經驗（Johnson, Gilley & Gray，2016，8），然而，關於亞洲地區國際大都市的性相和性別差異之民族誌研究仍佔支配地位（Wilson，2004；Tang，2011；Sinnott，2013；McLelland，2018）。余燕珊（Yu，2011）指出，批判性區域概念源於亞洲酷兒離散研究和亞際文化研究，旨在質疑以西方作為普遍參照的作法，並強調亞洲地區的歷史多樣性（Chen & Chua，2007）。

高密度城市成為情慾及其伴隨的社會實作蓬勃發展的場所，可以理解為是一種「資本、媒體、商品和人流」交會混雜其中的「新亞洲酷兒區域主義」形式（Kang，2011，175）。市場開放和工作職位激增亦促成了北京、上海等中國主要城市的男同志和女同志社群之建立。而城市經驗的匿名性，以及可以以男同志或女同志身份生活等共同因素，亦吸引中國

男同志和女同志從農村遷往城市（Kong，2011；Engebretsen，2013；Kam，2013）。在香港，游靜（Yau，2010，3）以「能多正常〔直〕，就多正常〔直〕」（as normal as possible）的理論框架，反對美國酷兒研究中，關於被邊緣、不論及身份的性（non-identificatory sexualities）的討論，並指出必需要從華人社會的特殊脈絡去理解「試圖變正常」的意義。

接下來的部份，我將討論密度如何定義香港這座城市及其生活方式。此外，我會概要陳述目前香港在女同志、男同志、雙性戀和跨性別權益方面的法律發展。隨後，我將說明本文採用之研究方法，並緊接着透過民族誌訪談所得的研究結果，討論在英國殖民統治下以都市密度為特徵的急速社會變革中，年長女同志和雙性戀認同的出現。

密度與香港城市

作為與新加坡、南韓和台灣並列的後殖民工業化範例之一，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主導了政府在土地出售、仕紳化與市區重建措施、經濟前景、教育和社會發展等方面的政策。急速工業化讓一些人累積了財富，同時亦帶來了社會不平等。中國及其市場的開放增加了資本和人力的跨境流動。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增長的社會流動性促使中產階級的興起。置業成為許多中產家庭的願望，同時亦引發爭議——因為香港的房屋土地供應已不敷居民的需求。

稠密是描述這座城市的常見用詞。一般認為香港是一個「密度超高」(hyperdensity)的地方(Abbas, 1997, 81)。Ackbar Abbas 有力地點出殖民現代性和建築上的超高密度之間的間隙，以此闡釋香港文化中的「消失的空間」。一座被超高密度定義的城市必然會經歷「不斷重建」，空間主體意識亦會同時遵循經濟得失而建立和重建。雖然政府表示缺乏土地是香港居民得要生活於擁擠環境的主因，但亦有研究表明，房屋難以負擔和生活環境惡劣是政府與地產發展商同謀的結果(Lee & Tang, 2017)。換言之，生活於高密度環境的日常生活是由政府精心規劃和執行的，藉此盡可能地為有錢人積累財富和收入，而香港政府的主要收入亦來自於向房地產發展商出售土地。

生活於高密度環境，使得個人在探索日常生活時身體和情感皆受到影響。我們可以從兩個方向思考有限的身體空間對個人流動性的影響。一方面，相對於稠密人口聚集地中的人流、信息、商品和服務的流動，個體希望的是生活於人群較少、空間較大的物理環境。另一方面，就都市密度的研究並非總是以高密度環境對生活的負面影響作結。相反，學者們批評將密度僅僅視為「有問題」的假設，並詢問「文化」在個人生活於高密度環境的經驗中所扮演的角色(Tang et al., 2019)。他們把注意力投向在都市研究的密度分析中消失的個人主體。正如 Ray Forrest、Adrienne La Grange 和 Ngai-Ming Yip 指出，使這座城市的社會地理學獨特於其他國際都市的是「異質性的社會體驗」(2004, 223)，其中，富人和窮人之間的空間區隔並不如其

他主要城市那麼顯著。為被邊緣化的社會身份和被污名化的性慾主體而設的消費空間，因此得以出現在住商混合區內。高聳豪宅矗立於繁忙街區的戰後舊唐樓之間，建築、人群、商店和行人道構成一個後現代群集。

在香港都市化、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之前，英國殖民政府牢牢控制住社會福利的發放。異性戀家庭是改善生計、規訓並約束性慾的單位與場所。歷史上，男同性戀和肛交一直是違法行為。肛交自1842年起就是刑事罪。1901年，男性之間的性行為被《刑事法修訂法案》（Criminal Law Amendment Act）定為違法。該法律對女同志的性行為並無描述，因此女同志在法律上基本是安全的，但同時卻不見於公開討論。經歷蘇格蘭籍督察麥樂倫死亡和一系列公眾辯論之後，同性戀終於在1991年於香港合法化。不獲法律和社會認可是1950年代或之前出生的香港女同志生活中的重要部份，其中一些人已進入異性戀婚姻並在異性戀家庭中撫育子女。

江紹祺、劉凱亮和李卓賢（Kong, Lau & Li, 2014）在爬梳香港同志運動時，指出三個阻礙性公民人權進步的主要領域，分別是政府、家庭和福音派宗教行動。香港目前保護性少數群體免受任何形式歧視的法例非常有限。《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和《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承認未婚同居關係，不論其性取向和親屬關係為何。具香港居民身份且持外國護照者，若其同性伴侶未具香港居民身份，二人在海外完成婚姻註冊後，其同性伴侶將有權獲得合法居港的受養人簽證。最近的法

庭勝訴案例也確保了在海外註冊同性婚姻的本地公務員同樣享有異性戀夫妻的福利，例如醫療及牙科福利、夫婦合併報稅。

研究方法

在華人社會中尋找年長情慾主體的受訪者異常艱難（Ling, Wong & Ho, 2007；Yan et al., 2011）。本研究的受訪者為六十歲以上、長期居住香港的女性。不少受訪者生於中國大陸城市，如廣州或上海，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與家人離開中國大陸。我選定研究對象的準則為有同性浪漫或情慾經驗的女性，毋須自我認同為女同志或雙性戀。十二位受訪者中，有五位出身貧苦，憑自身實現了社會流動，其他則來自中產階級。我主要倚賴兩位社群守門人介紹受訪者。其中一位是六十四歲的雙性戀女性，她在女同志、男同志、雙性戀、跨性別和雙性人社群中享負盛名，人脈廣闊。另一位五十多歲的女同志，是我在手機應用程式上發佈招募告示後主動與我聯絡的，她認識其他六十歲以上、現在或過去曾經與女性建立關係的人。我採用非概率滾雪球抽樣的方法招募受訪者，同時也透過社團推薦，例如已解散的香港女同盟和新興團體「大愛同盟」。我亦利用之前進行香港女同志民族誌研究時建立的人脈來尋找符合條件的受訪者。

深度訪談是更深入了解受訪者生活經驗的重要方式。我在2016年至2018年期間共進行十二次正式訪談，訪談以開放式問題涵蓋不同主題，包括家庭、同儕關係、性和浪漫關係、婚姻、性相認同、工作經歷、宗教、住房、教育、健康、財務資

源和歧視等。我向受訪者詳細解釋保密協議的內容，並在獲許可的情況下進行錄音。每次主要訪談時長 60 至 120 分鐘，其後隔一段時間會作跟進訪談。本研究亦透過參與式觀察來收集資料，包括「在社群中生活，參與日常和非日常活動」（Dewalt & Dewalt, 2002, 4）。我參與了受訪者的日常活動，包括社群和家庭出遊、購物和看醫生。訪談內容首先以廣東話轉錄，隨後轉譯為英文，嚴謹地翻譯本地的特定術語。資料依據紮根理論進行編碼，主題於每輪編碼中浮現，並持續來回比較資料與提煉主題，組織下一輪訪談（Strauss & Corbin, 1997）。

接下來，我將呈現質性訪談年長女同志和雙性戀女性得出的研究結果，以及鑲嵌在她們生命故事裡，關於工作和責任、殖民空間經驗、體現的空間實作（embodied spatial practices）的主題。她們生活在急速變遷的都市環境中，面對人口增長和殖民統治下的房屋問題，上述共通主題在她們描述生活經驗時浮現。對密集城市空間的描述，意外地成為本次研究的背景。我明白受訪者對過往經驗的憶述未必反映事實，但與追求全貌相比，我更着重於分析那些她們在敘述時特別提及的時刻或浮現的主題。這些時刻與主題反映的是她們在口述自身的年長女同志或雙性戀女性故事時，特別重視的片段。除了就共通主題的討論，我將進一步探討城市中男同志和女同志空間的差異。

性別、工作與責任

如前文所述，戰後發展使這座城市自1950年代起急速工業化，然而1960年代的全球通貨膨脹，亦使香港居民的生活受到影響。物價上漲，水費與公共交通等費用都面臨加價。1966年和1967年的暴動事件（簡稱六六和六七暴動）便是在重要的公共交通工具天星小輪票價加價與工廠勞資糾紛的背景下發生。其後，殖民政府逐步頒佈社會政策，確保高速經濟增長，並就香港的社會和政治議題諮詢本地領袖，藉此重建自身合法性。政府亦提供免費中小學教育、設立區議會和街頭節慶活動等社會政策，以幫助因1950年代中國內亂而流亡香港的中國難民和移民融入社會。

六十歲的受訪者Helen將1966年和1967年的暴動描述為一段「令人大開眼界的經歷」。大多數受訪者當時都是十多歲的年青人。正如六十一歲的受訪者退休公務員阿安提到，「我當時完全不知道原來那麼危險。完全搞不清狀況！但是我的父母和哥哥家姐都非常驚慌。我來自大家庭，家中有六名兄弟姐妹，我最小。我那時還和朋友們在街上玩。我們完全不怕！那時我們很窮，住在九龍土瓜灣某棟建築物的非法僭建屋。我沒有上正式學校。我記得我上的『學校』是在頂樓，按今天標準，應該是另一個非法僭建屋，另一條街上的舊樓」。

她記得自己曾做童工幫補家計，從工廠取件穿膠花，依件計酬。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香港的貿易發展主導就業市

場，主要為紡織品和服裝出口工作，其後轉向中國大陸與國際市場之間的跨國貿易與投資的中間代理。與阿安同代的年輕女性普遍期望藉婚姻獲得社會流動的機會，但阿安拒絕走常規的道路。「只要我有份能養得起兄弟姐妹和父母的工作，我們就可以生存下去。我不需要男人。我也不想做要我打扮成我不喜歡的樣子的工作，我想穿褲子。我想要有權威。我想看起來很型。」

阿安作為「勞動女兒」(working daughter) (Salaff, 1995) 的義務，某程度上反映了儒家對華人家庭意識形態的影響，其中女性在私人和公共領域通常都從屬於男性。根據儒家「三從四德」的訓示，女人必須知道自己在社會和家庭中的地位是未嫁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 (Chan, 2003)。儘管那個時代的女兒們通常都遵從儒家的性別階層制度，但阿安透過表達自己在工作上的獨立和外表上的不妥協，展示自己對此的反抗。

阿安比其他人稍晚進入正規教育制度，而和其他受訪者的經驗相似，正規教育在那個時代並非獲得穩定工作的必要條件。倒是出現在年長女同志和雙性戀女性的訪談中，主要由女性組成的半私人空間更具啟發意義。受訪者提到，秘書培訓學校和夜校提供了只有女性的環境，女性因此能夠建立情感深厚的友誼，並激發對同性關係可能性的想像。夜校亦為女性提供了在瞬息萬變的工業社會中實現社會流動的機會 (Choi, 1998)。



在這些空間中，性別隔離提供了初探同性慾望的機會。Megan Sinnott 在一項關於曼谷全女性宿舍的研究中，指出宿舍作為一個一般空間（generic spaces），可以轉變為女性在其中互動、建立“tom-dee”關係的酷兒空間，以及遠離家庭注視的空間（2013，351）。儘管女性專用空間並不意味着不受異性戀規範的約束，但仍可以視之為促發女性之間深情關係的場域。與單性別的小學或中學不同，年輕成年人在這些環境中有更大探索和表達同性慾望的自由。

對於大多數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步入成年、來自勞工階級家庭的受訪者而言，要找到一份祕書工作，就要學習得體的商用英文禮儀，因此去皮特曼（Pitman Method）學校進修英語和打字至關重要。美玲（六十六歲）提到：「在組裝線上工作一整天後很累，但我每次都期待去夜校。下班後和一群女人在一起真是太棒了。當然，工廠四周圍都是女人，但夜校的氣氛完全不同。我們開心地笑，重新注入活力。」美玲的話說明了她對事業發展的願景，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她在想像不同於工廠女工的生活時，經常懷抱的「希望」。急速工業化、人口增長、城市密度和個人慾望，或許為像美玲和阿安這樣的女性帶來了短暫安慰。在密度和社會變遷相互碰撞、社會階級和空間相互聯繫的交錯空間裡，日常社交網絡於焉建立。

殖民空間相遇

六十四歲的 Pearl 形容 1970 年代末和 1980 年代是「香港的黃金時代」。用她的話，「我知道我吃到了經濟紅利。那些日子，我白天工作，通宵打麻將，晨早吃晚餐，然後又回去工作！去 clubs 是周末的活動」。Pearl 在 1980 年代進入廣播行業之前，在紡織和製衣業任跟單員。啟發自女性主義地理學者 Doreen Massey 就自己在吉本（Kilburn）散步的描述，我試圖就 Pearl 的敘述整理出她與空間相遇的步行記錄。

Pearl 的漫漫長夜經常始於在蘭桂坊集合。蘭桂坊的歷史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紀初，當時是酒吧林立和性工作者聚集之地（Fitzpatrick, 1993）。Disco Disco 成立後，該地區開始與的士高舞廳和外籍人士聯繫起來（Cheng, 2001）。Disco Disco（DD）由顯達英國商人之子 Gordon Huthart（夏德）創立。這家夜店是英國帝國主義、性慾和殖民地現代性的交匯點。文化帝國主義在埃及風格的室內設計中顯露自身，並被 Pearl 以一杯 Gin & Tonic 將之一飲而下。Pearl 開玩笑地說：「我從來沒想過 Gin & Tonic 會再度流行，但你看看現在那些新款手工 Gin 酒？我甚至要找像樣點的 Tonic 配搭才喝得下。」Gordon Huthart 將這個唐樓區仕紳化為酒吧和俱樂部中心，在那個男同性戀仍屬刑事罪行的時代，大膽地將男同志慾望注入蘭桂坊的夜生活中。DD 後來停業，被該區其他夜店（如 97 吧）取而代之。

蘭桂坊亦與加拿大商人盛智文（Allan Zeeman）關係密切，盛智文將這些街區轉變為酒吧和餐廳的聚集地，並將這模式複製到另一個中國城市——上海。Disco Disco 代表的是一個逝去的年代和過渡的場所。這個男同志文化地標將英國帝國歷史的一隅帶入本地，在此，一種特定的國際品味，與內嵌階級特性和性別變異（gender-inflected）的本地相遇。Gordon Huthart 的故事也反映了這個特殊的時代與地方，儘管他後來因涉及肛交行為遭到指控（Collett，2018）。

Massey 對空間的理解引人共鳴：「一個地方的獨特性不是源自於其內化已久的歷史，而是基於它由一組特定的社會關係所建構，這些關係在特定的地點相遇，並交織在一起。」（1991，29） Pearl 回憶她的漫長派對夜：「那些日子，我們搏盡玩盡。周末永遠都有派對（笑）。每個人都想在 DD 露臉。你跟任何八十年代同志圈子的人交談，他們都一定去過或者想去 DD，無論是西人還是華人，異性戀或同性戀，單身或已婚。我和朋友一起去感受那種氣氛，那種空氣和興奮，盡情享樂。但那是八十年代，你知道，生活是美好的。你看不到快樂是何時會結束。」 Pearl 的空間體驗，反映的是歷史和情慾的交織。藉由恆常光顧一所主要客群為男同志和女同志的酒吧，身為雙性戀女性的她踏入了一個代表着殖民地現代性的空間，連敘述「那些日子」都能令她如沐春風。

然而，她對「黃金時代」的回憶可能會引起人們質疑其中對殖民時期的浪漫化和對過往時光的懷舊。這種憶昔行為對我

們當下有何提示？ Pearl 對更好時日的追憶，不僅可以理解為是緬懷過去，也告訴我們當下物理社交空間之不足。都市新自由主義讓情慾主體得以被看見，但也限制了酷兒生活的多樣性。

體現的空間實作

日常情慾的概念可以擴展至超越肉體性關係，將調情和甜言蜜語的前戲這些社交互動包納其中。體現的空間實作可以是一個人進入一個能更安全、更允許女同志慾望表達的環境。女同志或雙性戀身體對空間的感知，影響着表達同性慾望的方式。情慾關係是在特定的慾望場域內通過身體的行為生產和再生產而成。空間是動態的，允許各種詮釋和情感。從 Massey 的角度看來，空間也是未完成的過程，讓故事和經驗的多重性在其中展開。

將情慾的概念置於日常生活，允許我們將非特定的慾望場域納入、看到常規的情慾空間之外圍、繞過常見的情慾腳本。或許常見腳本裡，都會男同志和女同志的夜生活構成了同志社區，於是女同志的慾望空間通常指向具情色氛圍的場所，例如酒吧和夜店。在香港，只有一位受訪者提到一家連鎖時鐘酒店維多利亞，以描述早期遭遇歧視、遭酒店工作人員拒絕提供服務的經歷。另一些受訪者則提及了另一家位於離島的銀礦灣度假酒店，該處是約會和親密互動的場所。受訪者們亦提及書店、咖啡廳、購物中心、戲院和卡拉 OK 包廂等消費空間，她們可以在這些地方與其他有同性慾望的女性相見。

這次研究的另一項發現是開放的公共場所在促進同性慾望方面的角色。受訪者經常提到公園、泳棚和海灘，她們去這些地方郊遊和從事休閒活動。1953年出生的阿寶是八人家庭中最年幼的一個。她在小學三、四年級時意識到自己的同性慾望。阿寶告訴我她在中學時期的初戀，「她是ABC（美國出生的華裔），你知道的，她英文很好，口音很好聽……大家都覺得她很怪，對她說一些刻薄的話，叫她做“banana”之類。我愛上她。我們讀男女校，我邀請她一起看《愛情故事》（Love Story）。一切就這樣的開始」。

經歷第一段戀情後，阿寶有過連續幾段長期關係，然後又單身了好幾年。她以前熱衷派對，如今亦然。我問她平時有甚麼去處，「我中學畢業後去了浸會學院（現稱浸會大學）繼續進修。我和朋友們喜歡去維多利亞公園。那裡可以做很多事情。你可以躲進草叢，未成年喝啤酒、抽煙，做這些壞事。你可以在那裡搞搞震。我第一次是在十八歲時，和我的初戀。我對性一無所知。實際上，如果你問我有甚麼技巧，我會跟你說非常有限（笑）。我更珍惜的是那個時刻以及我們兩個的感情，而不是有沒有高潮。就算我沒有性快感，我也不認為這是個問題……更重要的是那一刻我們屬於彼此的那種感覺。」

女同志在公共空間中的體現促使我們反思「都市環境中空間實作、社會差異和符號聯想的交互作用」（Tonkiss，2005，94）。我問阿寶如何識別可能有同性慾望的女性，以及她如何在公共場合展示自己的愛慕。阿寶繼續說道：

我覺得當時自己好激進。我不在乎別人怎麼想我們手牽手。在那個時代，兩個女人手牽手行街再普通不過。對男性來說比較難！所以這是為甚麼對女孩來說比較容易。那時我沒有這麼男仔頭，所以沒有人留意我們。直到第三段戀情，我才變得更男仔頭。

其他受訪者經常形容女同志體現的標記（signifier）為「一種感覺」、「含蓄的微笑」、「中性外表」或“tomboy”。我問阿寶是否隨着年齡增長，其他人更容易察覺她的這些標記的變化，她回答說：「Well，我在三十歲開始變得更 butch。資訊系統經理的工作沒有要求我穿裙子，所以我大多數時間都穿褲子。我是短髮，但不是剃頭那樣短，只是稍微短一些的曲髮，齊肩。我覺得自己身型變壯了，可能只是因為年紀大而變胖了（笑），像個中年 butch！」

確實，對某些人來說同性環境可以激發女性之間的性吸引力，然而同性關係的經營卻可能發生在意想不到之處。

我另一位受訪者 Margaret，說了一段在動盪中相愛的動人經歷。Margaret 生於 1951 年，遲至十七歲才開始讀中學。她因聖經學和英語考試不合格而多次重讀。最終，她在 1977 年二十六歲時才從高中畢業。來自有六名女兒的家庭，Margaret 最長。她的父母是初級公務員，因此不太需為物質生活操心。第三名女兒落地時，她的父母已經為這個女兒取了男孩的名字。母親堅持讓 Margaret 接受教育，甚至建議她到菲律賓進

修成為牙醫。此時，Margaret 已經遇到了她人生的唯一伴侶，阿 Ben。

我在十九歲那年認識她。Ben 是高年級領袖生，好活躍，喜歡玩但不擅長讀書。她跟我說，紙上的所有數字和文字好像都在跳……我只知道，我和她在一起時很快樂。我寫了一封信給她，被她沖進馬桶，因為她被嚇到了（笑）。Anyway，她有段時間避開我，但她一直考試不合格，一直重讀，直到我們在同一級相遇（笑）。我們很快變得親密。Ben 的家庭好複雜。她是長女，要肩負長子的責任，處理家族事務。她看管着家族的眾多賭場，保管許多裝有現金的保險箱鑰匙，日日出糧給荷官……他們知道我們的關係，我肯定他們看得出。我們看起來像一對直的夫婦。我們從不隱藏我們的關係……我們也沒有刻意公開。我不是那種會在枱面上牽手或親吻對方的人。我們只是覺得人們可以從我們的外表看得出！我長這樣，她看起來又像個大爺。Ben 就像男人那樣！當我們在大陸做生意時，其他大陸商人稱他為黃先生，搭他膊頭說：「我們一起去桑拿按摩！」（笑）

Margaret 和阿 Ben 這對同性伴侶在聲名狼藉的九龍城寨暗巷中流連，不禁讓人想像那畫面，畫面中是移動中的禁忌慾望與看似異性戀的身體。九龍城寨在歷史上被視為犯罪、毒品和非法活動聚集的場所。1993 年的清拆只是進一步延長了它的「第二生命」，成為藝術和流行文化參考的典範（Fraser & Li，2017）。當我詢問 Margaret 的性取向時，她拒絕了“lesbian”

或者「同性戀」的標籤。與其他受訪者類似，「女同志」身份認同並不是同性行為的先決條件或必要補充。

城市中的男同志和女同志空間

歷史上的男同志地標和社區早就向我們傳達了建立社群的重要意義，它能將都市空間轉化為政治事件，例如三藩市、悉尼和溫哥華等城市的同志遊行和女同志遊行（dyke marches）。亞洲國際大都市裡同志遊行的起點，通常是舉辦過大型政治性集會而聞名的公園，例如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台北的二二八紀念公園和新加坡的芳林公園。然而要找出香港同志的群居模式卻相對困難，因為都市密度及其交通便利性使得區區都有同志身影。此外，由於 LGBT 身份在日常生活中仍被污名化，所以在香港欲標記出特定同志社區亦不容易。而社交方面，性別差異使得女同志相較於男同志，擁有的資本相對有限，這也導致女同志消費場所明顯較男同志消費場所稀少。

正如 Julie Podmore（2006）對蒙特利爾（Montreal）女同志空間的研究中所說，女同志的能見度常常受「當地社區動態、內部意識形態、與男同志的政治關係和空間關係」影響。在新加坡的男同志唐人街中，鄧國基（Tan，2015）發現階級和性別影響了勞工階級男性和自我認同為女同志的女性如何造訪男同志空間。在香港，不同世代的女同志與雙性戀女性對男同志空間多少有所見聞。由於男同志酒吧這個場域一直可見於男同志

歷史或俱樂部文化的討論之中，因此恆常進出男同志酒吧也是一種表達自己的女同志主體意識的方式。

受訪者們提到她們去一些代表男同志的社會文化地標如 Canton Disco 和 Propaganda 的過程。她們去這些酒吧的時候年齡介乎四十幾歲到六十幾歲間。這些經歷呼應了「身份朝聖」(identity pilgrimage) 的概念 (Howe, 2001)。七十歲的退休教師 Polly 回憶起她在 1970 年代末第一次去男同志聚腳地的緊張經歷。Polly 獨自前往，意圖知道「像我們這樣的人是怎樣的」。她再三說道：

懂怎樣找的話，其實不難找到可以去哪些地方聚會。你會聽到一些餐廳、酒吧和的士高舞廳的傳言，這些地方有不同的人，有點藝術氣息的人（笑），或是從外國回流的人。但對我來說，仍然很害怕去那些地方。我沒有同伴陪我去，所以我一個人去了。那個地方叫做 *Dateline*，在中環。多數是男人，女人並不多。我只是走過那裡，想要看看裡面。

香港女同志酒吧的流行可以追溯至 1990 年代。較年輕的受訪者提及 Virus、Oasis、Elements、OA2 和 Velvet。這些酒吧通常亦為顧客提供卡拉 OK、劈酒、猜枚、搖骰盅的玩樂服務。我早期的田野調查包括在散落於銅鑼灣建築物中的女同志酒吧和咖啡館進行大量的參與觀察。有次去 OA2 時，店主問我想不想喝一碗傳統中藥熬煮的豬肉湯，我記得即使介紹了自己只是一名研究員，依然獲得很好的照顧。在邊緣社群中建立情誼，

使我感到自身亦在參與女同志和雙性戀女性社群。然而，我也注意到階級之間的分歧，上層或中上層階級的女性並不偏好女同志限定的場所，而來自較低階級背景的女性則認為女同志經營的場所才夠道地。除了階級差異，亦可以看到在金融區中環，或是在熱門購物區九龍尖沙咀或旺角等舉行的活動，前者以外籍女性參與為主，後者則是香港本地勞工階級女性居多，壁壘分明。

透過多元交織的視角解讀男同志和女同志空間之間的移動，我們得以指認 Kimberle Crenshaw 所說的「多元交織的經驗」，藉此關注在香港擁有女同志慾望的女性之間，所存在的社會不平等（1991，1299）。要理解一位年長的香港女同志，不能僅僅憑藉同性性取向的單一身份，更應考慮到種族／族裔、年齡、階級、性別、性相和健康狀態等複數和多元交織的社會因素。即使 Polly 成為一名教師，得以在社會階層中向上流動，她的敘述仍顯示出英國殖民統治的遺跡——特定的社會空間被視為專屬外籍人士和非本地人，因此「禁止入內」且「令人生畏」。

總結

密度中的日常情慾展示了生活經驗中的性、性別、性相、親密關係、密度和空間覺知之混合。與我之前就香港女同志及其日常生活方面的研究相比，是次研究的受訪者們來自較大的家庭，家庭歷史更為複雜。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香港社

會，有六至九名兄弟姐妹的家庭非常普遍。家庭中的女兒和家姐需要承擔起養家的責任，尤其是在優先考慮讓兒子和弟弟追求高等教育的家庭中。儒家思想在華人社會根深蒂固。

因此，這項研究中的年長女同志與雙性戀女性，首先必須成為獨立女性，像到夜校勤學英語以獲得更好的發展機會，並盡早進入勞動市場，以突破她們的性別角色。她們強烈地想要抵抗加諸於華人女性的束縛，拒絕順服於父權家庭結構。儒家思想深入香港日常生活，正如 Janet W. Salaff (1995) 在討論香港女工時所創造的「勞動女兒」一詞，這項研究中的一些受訪者可能最初亦遵從了合乎華人女性身份的某些傳統標準，然而，她們在年輕時就意識到自己的同性慾望。傳統上，女孩的教育並非本地華人家庭的優先考量。我的所有受訪者至少都有中學畢業，其中一些人持續進修，這也反映出了我的招募方法之局限。對那年代某些人而言，中學學歷就相當於今日的大學學位，他們的職業生涯通常在中學畢業後立即展開。

夜校和工廠提供了探索潛在女同志慾望的場域，而夜總會和賭場則提供了公然挑戰異性戀規範和展示性別特質的另類空間。性和親密關係的空間，從在公園、泳棚和戲院中「搞搞震」，到城市各處的時鐘酒店和偏遠的度假酒店皆是。至於「住家空間」，那是在一個人有能力在外租屋、不與家人同住的情況下，才是安全的。關於「女同志」或「雙性戀」這些標籤，只有三位受訪者，且直至成年後，才認同這些標籤，有些人則抗拒「同性戀」這個標籤。相較之下，「獨立的重要

性」這個主題，主導了所有的訪談。有許多不同的方法和形式可以證明她們想要與眾不同的渴望，其中「經濟獨立」和「成為家裡第一個進入勞動市場的人」被大多數受訪者視為優先事項。

歷史學者冼玉儀點出了華人父權社會的兩個關鍵特徵。其一是它強調在「訂婚、結親、納妾、收養、奴役」一系列社會安排中的金錢交易（Sinn，1994，7）。另一個關鍵特徵是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的概念與華人家庭格格不入。冼玉儀進一步闡釋，作為個人，通常會被要求融入到家庭，因為家庭「在法律上是中國唯一認可的『人』」（Sinn，1994，7）。

研究中的許多受訪者在自己經濟狀況較佳時，會支持兄弟姐妹或親戚以履行家庭義務，但亦透過成為殖民時期香港社會中的現代女性，展示其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權利。在 Pearl 的個案中，她甚至將自己描述為「鬼婆」（外國女人）。洋洋當年是一名既能幹又時尚的 tomboy，她自稱「花花公子」（playboy），以展示她「與女性相處」的方式。她們在大家庭中地位未必因此提升，但家人的不干涉對某些人來說已是好事。這並非說殖民地現代性為華人女性提供了更好的自主職業選擇。殖民政府藉由與本地華人商業精英組成緊密的「勾結共謀的殖民形式」，在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進程中獲利（Law，2009，28）。香港猛進成為「亞洲四小龍」經濟體之一，令整體社會的生活水平提升，工作機會增加。但與此同時，文化常規和道德美德繼續規範着女性的性別角色（Ho & Hu，2016）。

密度中的日常情慾之空間實作，以亞洲特定的「斷裂的現代性和都市新自由主義」的理論視角，挑戰了「西方的截然劃分方式與對普遍性的假設」（Kanai, 2014, 3）。城市空間在其新興的結構形式以及其間的社會關係下，都是可生成和可利用的、不斷被爭奪和改造的，這揭示出城市空間是「體現的與活生生的，而不僅僅是想像的和再現的」（Hubbard, 2006, 121）。

體現的空間實作之社會意義由城市景觀構成、記住和重構。本研究中的受訪者們經常打破沉默，並且在一個「獨立個體」的概念隱含對殖民地現代性與「亞洲四小龍經濟」的想像的時代裡，繼續擺脫性別角色。藉由記錄有同性情史女性的歷史，追溯她們的情慾與親密關係，並非旨在尋回失落的故事，而是要銘記歷史學者 Anjali Arondekar (2014) 給我們的告誡——不要假設當下身處的歷史時刻較過去更為解放，且以為我們正在以「搜救模式」挽回和復原失落的歷史。因為，誰可以斷言現在總是比過去更解放、更自由呢？

原文出自：Tang, D. T. S. (2021). Everyday erotics in urban density: an ethnography of older lesbian and bisexual women in Hong Kong. *Gender, Place & Culture* 28(11): 1649–1668.

故事四 50+ 求愛記：
趕上千禧同運列車
由ICQ搭到Les Peches

洋洋今年七十一歲，1953年於香港出生。洋洋在三十歲結束一段戀情後，維持單身二十年。年過五十，重出江湖，經歷過聊天室、ICQ，她趕上了千禧同運的列車，在一次女同志派對認識了現時的伴侶。經歷過長距離戀愛，二人在十一年前開始同居。母親離世，處理後事令洋洋體會到「合法」二字有多重要。如何確保另一伴取得財產？是否要預設醫療指示？將來的骨灰要如何處理？有一個問題，她仍然不知道要如何回答：我們，要結婚嗎？

2003年某夜，洋洋首次登入網上的聊天室。

那一年，第三代 Wi-Fi 正式面世，寬頻上網正在普及，逐漸取代 56K 撥號連線，上網毋須佔用電話線，也不再輕易斷線，但是當時上網可以做到的事情仍然有限。除了讀新聞、瀏覽討論區、玩一下無聊的 Flash 遊戲，大部份人都是為了玩 ICQ。ICQ 是網絡早期的即時通訊軟件，除了與好友一對一通訊，也設有聊天室讓陌生人交流。

洋洋在搜尋欄輸入“Lesbian”，結果列出多個群組。雙眼掃視螢幕：二十至三十歲、三十至四十歲、四十至五十歲、五十歲以上——洋洋終於找到自己的年齡層。

一按進去，跳出視窗，接着就是一連串文字對話，字體繽紛閃爍，媲美 Disco 幻彩燈，彷彿線上文字派對。

就像踏進一間酒吧，你看見有些人互相認識，三五成群圍在高桌談天說地；有些人獨個兒入場，只想坐在一旁的吧枱靜觀人生百態。初來報到，洋洋不敢透露個人資料，只是靜靜閱讀幾十個陌生人的一言一語。有人單刀直入，表示自己想識朋友；有些人應該是朋友，正在交換日常。

假如你單人匹馬前往現實中的酒吧，招呼你的通常只有酒保。聊天室的美好，在於每個人都是單人匹馬，因為免去了面對面的尷尬，反倒有人跟你熱情打招呼。

「喔噢。」伴隨着系統的通知聲，一個新視窗跳出來，有人私訊洋洋。

“Where are you from?” 對方問。

“I am from Hong Kong.”

“I have been to Hong Kong too! I am living in the Philippines.”

今時今日在社交媒體收到這種訊息，一般都會當對方是騙子。然而，千禧年初是互聯網相對美好的時代，人們仍然會拿出真心在網上交朋友。交談之中，洋洋知道對方來自西班牙，隨家人搬到菲律賓居住，正職是醫生。

三星期之後，對方提出見面，她願意專程飛來香港。

「我感受到她很渴望識朋友，其實我也一樣，但是我沒有那麼大膽。」洋洋笑說，如果要自己飛過去，二人肯定永遠都不會見面，她始終會擔心對方是陌生人。對方主動報上自己的身高體重，還先後傳送兩張相片。「黑頭髮、黑眼睛、蜜色皮膚，女人味十足，但是看上去平平無奇，我的興趣不大。」洋洋自嘲：「後生時始終講究外貌。」

洋洋沒有拒絕見面，但是也沒有回傳自己的相片，只是簡單形容了自己的外表：TB、戴眼鏡、穿恤衫牛仔褲。「以免她想像我是 pure，覺得浪費時間。」

雖說對見面的期望不大，洋洋還是親自接機，又盡地主之誼，帶對方到處遊覽，飲飲食食。相處時，彼此都感覺開心，但是對方總是隱約透出憂慮。今日回看，洋洋才想通，對方是真的希望結識到一個伴侶，而她只是很高興認識了一位朋友。「她比較成熟，應該猜到我當時沒有打算作出甚麼承諾。」未有行動，皆因未有心動。數天相處下來，洋洋感受到對方相當本事，為人進取，做朋友當然可以，但是做人世的話，「不知道是她辛苦還是我辛苦，或者到時大家都辛苦。」

單身二十年 退休後驚覺世界不一樣

當時，洋洋已經維持單身二十年，上一段感情早於1983年結束。那一年，她才三十歲。對方是異性戀，二人相識之時，洋洋已經知道「找個男人結婚」才是對方的最終目標，只是尚未遇到適合的人。洋洋輕描淡寫，在年長女同志的圈子，這種故事多不勝數。

二人的關係維持了十年，那位女生後來遇上一個對她很好很好的男生，結婚後要移民去澳洲。對方曾邀請洋洋同往，她斬釘截鐵拒絕。

“What passed is past, you need to move on.” 她對女友說，也是對自己說。

當日為了與女朋友一起，洋洋不顧一切搬出去住，母親曾勸說：「你跟一個女生在一起，日後她結婚，你浪費了時間，浪費了精神，到頭來又會受傷，你為甚麼這樣笨？」多年之後，洋洋也認同媽媽在某程度上是對的，「她疼惜我，不想我受傷害。不過，對一個熱戀中的人而言，說甚麼也是不對的。」

分手之後，洋洋寄情工作，最大目標是賺錢和買樓。1971年中七畢業後，洋洋獲一間公司的電腦部聘用。洋洋沒有大學學位，但是公司願意栽培她，讓她嘗試部門內的不同工種，還給她發揮機會，退休之前已位處管理層。工作辛苦如打仗，同事之間甚少閒聊，從未有人探問她的感情狀況——即使她每日都穿整套西裝上班。

「我也不是一開始就穿西裝，那是一個演變的過程。」洋洋笑說。她記得自己獲聘那一天，媽媽還來不及高興，已經開始擔心。「死啦，你平日連裙也不穿一條，一上班不就等炒魷魚了嗎？」

第一日上班，在媽媽「威逼」之下，洋洋穿上了裙子。

「我明白媽媽，在她生活的年代，女人真的無法穿得像個男人般上班。」適應新工已經不容易，穿裙子更令洋洋倍感壓

力。當時仍然是五日半上班制，公司將星期六定為便服日，洋洋趁機換上牛仔褲。結果，沒有人出聲，沒有人奇怪。洋洋大膽起來，平日也換上褲子，起初只是一星期穿一日，慢慢增加至一星期兩日、三日；到後來，她索性天天穿褲子，最後才演變到穿西裝。洋洋直言自己非常幸運，歷年來跟過的每一任上司，從沒有人對她表示不滿。

有一天，洋洋的臉上出現一塊塊紅疹，驗血後發現白血球及血小板過低，醫生起初診斷是血癌。埋頭苦幹二十年，患病反倒令洋洋覺得安慰。「當時工作辛苦，患癌就不用憂慮前途。」洋洋苦笑：「我只擔心痛不痛，要割要切好像太淒涼。」折騰半年，身體可以檢查的地方都檢查過，醫生最終確診洋洋是患上了系統性紅斑狼瘡。此病症狀多樣，在當時的斷症難度甚高。患者由於自身免疫系統失調，產生過多抗體，攻擊自身細胞，導致皮膚及身體其他器官組織慢性發炎。那段日子，洋洋容易感到疲倦，不時發燒或感冒，嚴重起來還會骨痛。勉強支撐兩年，洋洋於1998年末提早退休，專注養病。

沒料到，媽媽竟在同年患上癌症。一下子，洋洋多出兩個身份，自己是病人，又是媽媽的照顧者。兩母女朝夕相對，有一天，媽媽忽然吐露心聲。

「不如你找個人照顧你吧？年紀大一點也沒所謂，阿伯都好。」

一句話，瞬即燃起洋洋的怒火。「我現在照顧不了自己嗎？」

「我只是不想你這麼辛苦。」

「你聽好，我就像張國榮，我是基，我是 lesbian。」

媽媽沒有作聲，這一次，她好像聽明白了。

自己患病，母親患癌，洋洋形容是人生第一個大關。熬過最初兩三年，覺得自己「過咗喇」，她又作出人生另一個重大決定——對全世界出櫃。「我已經退休，不用靠別人出糧生活，有甚麼所謂？」

忙碌工作的二十年，洋洋本來覺得香港很平靜，好像沒有甚麼火花，直到千禧年才驚覺「整個圈子不知怎的活躍起來」。大病和退休，或多或少為洋洋「鬆綁」，踏出自限多年的框框，繼而發現世界變得不一樣。

男男性行為非刑事化 催化平權運動

性／別小眾平權運動在香港社會醞釀多年，1980年代可能仍然隱於 Disco 文化，但是1990年代已經浮出社會。1980年發生麥樂倫事件之後（編按：詳情請參閱故事一），時任總督麥理浩會同行政局頒令成立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研究一個對性／別小眾極其重要的問題：「本港現行有關同性戀行為的法例應否予以修改？若然，應如何修改？」

研究三年之後，委員會提出多項建議，其中一項可謂里程碑：「本委員會建議對於年逾二十一歲之男性雙方同意私下進行之同性戀活動，法律不予追究。」除了建議非刑事化男性之間的性行為，委員會亦提出減輕對肛交及嚴重猥褻的刑罰。1990年，政府按建議提交刑事條例（修訂）草案，立法局內的辯論成為焦點，各大傳媒亦花了不少篇幅報導。1991年，草案在立法局正式通過，成為法律。

壓抑多年的平權運動一下子爆發，多個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冒出。除了早於1986年成立的十分一會，隨之而來還有啓同服務社、佛教同志組織自在社、同志健康促進會、姊妹同志、基恩之家、逍遙派、I. Paradise、F' Union、女同苑、藝文志、性權會、中大同志文化小組、華人同志交流大會、香港彩虹、彩虹行動、站出彩虹、智行基金會、香港同志影展、香港女同盟會等。

九七主權移交之前，立法局議員胡紅玉女士及劉千石先生分別以私人草案形式，提出包含性傾向歧視的平等機會條例草案，可惜兩度嘗試依然未能通過。其後成立的立法會，因應《基本法》第七十四條所限，議員提出私人草案的門檻接近高不

可攀：一來，私人草案不得涉及公共開支、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二來，假如草案涉及政府政策，需要在提出前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即使經過首讀二讀，草案仍需要同時於地方直選及功能組別取得過半數支持，方可獲得通過。

為了促使立法會關注性／別小眾議題，十多個團體於1999年組成同志社區聯席，並於2000年發起運動，要求候選人承諾在當選後將平權議題帶到議事廳。最後，性／別小眾社群推薦的五位候選人全數當選，何秀蘭女士更推動議會成立研究性傾向歧視的小組委員會，性／別小眾議題得以走入立法會。

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傳媒對性／別小眾的報導不再流於獵奇，加上陸續有人願意公開出櫃，公眾對於同志的印象也有所改變。2002年，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與同志社區聯席會議發表「性傾向民意調查」，透過電話訪問公眾對同志平權的意見。調查發現，超過九成的受訪者認為同性戀者應與異性戀者於工作就業、選擇配偶、接受教育、宗教信仰享有平等權利，接近八成的受訪者認為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應在組織家庭、繼承對方產業享有平等權利，超過七成的受訪者認為同性伴侶的配偶應與異性伴侶一樣，享用社會福利和公司福利。

沒有圈內朋友 不就等於死了嗎？

洋洋當年因病提早退休，反而趕上了平權運動的列車。起初因為要食類固醇藥物控制病情，臉龐總是腫成大塊小塊，長得像一個球，她不敢外出見人，全副心神放在抗病。沙士之後，病情穩定下來，洋洋才開始探索網絡世界，結識到那位居住於菲律賓的女士。對方在兩年內曾數度來港探訪，洋洋出於禮貌也曾應邀前往馬尼拉與她的家人見面。可惜二人欠缺火花，無疾而終。

那時，洋洋除了在 ICQ 聊天室尋找同志朋友，也有在紅極一時的網站 Fridae 流連。Fridae 除了提供必不可少的交友功能，還會整理世界各地的性／別小眾新聞，列出不同地方舉辦的活動，洋洋因此認識了「香港女同盟」。

見到女同盟宣傳每月聚會，即使知道要在現實世界與一群陌生人見面，洋洋還是鼓起勇氣，單刀赴會。「除了網絡，當時哪有其他途徑識朋友？」洋洋不是沒有朋友，只是舊同學和舊同事都是「非我族類」。「他們不屬於這個圈子，如果我不去露面，即係冇朋友架喇，我不就等於死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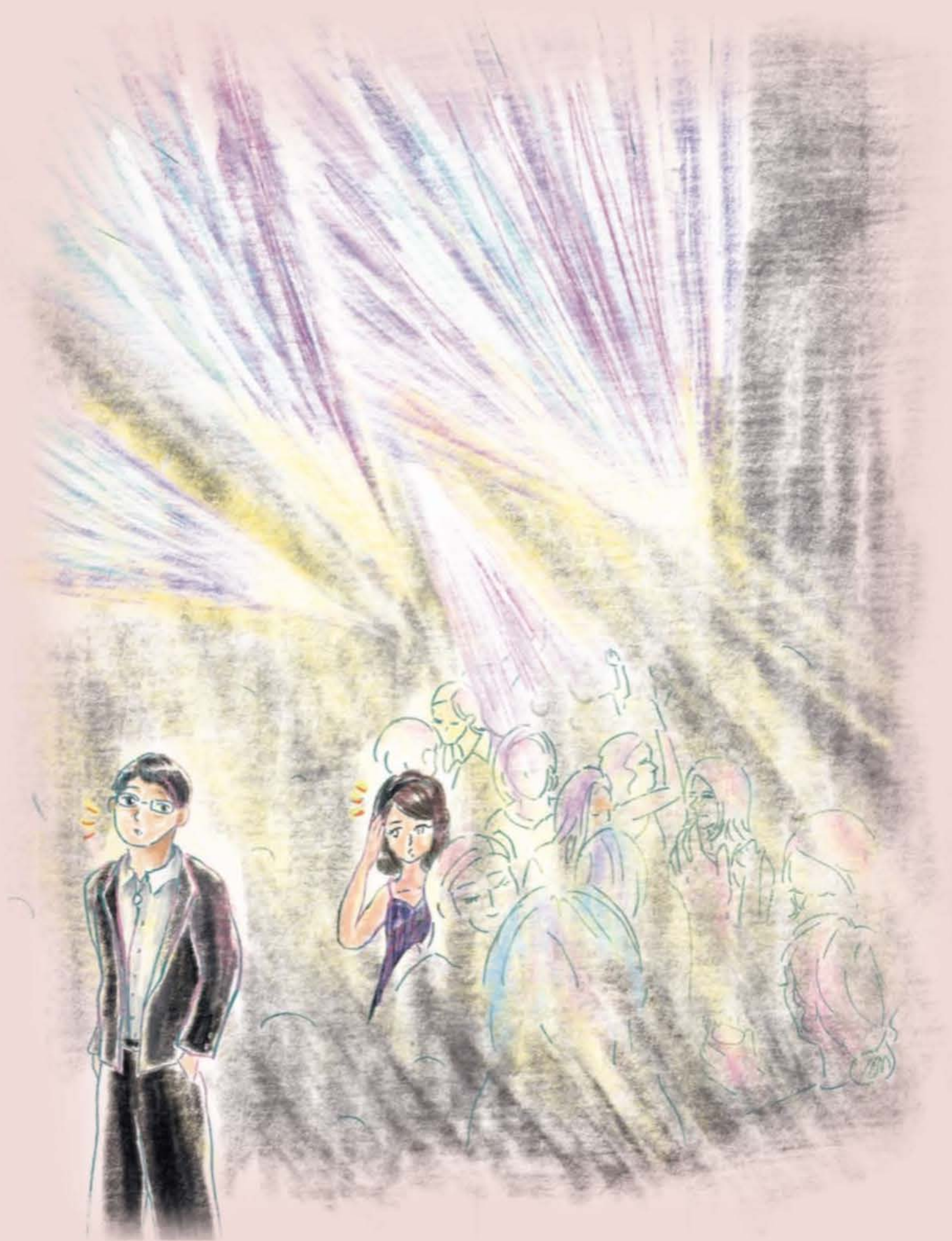
性別教育講座、卡拉 OK、燒烤、極速約會……洋洋通通都去過，每一次都是一個人去，一個人走，由活動開始到結束，她都是一個人坐着。「年紀吧？一定是一個問題。」女同盟的參加者大多比較年輕，都是廿歲出頭，一圈一圈，各自埋堆，

五十歲的洋洋格格不入。即使遇上聊天對象，對話總是不着邊際，洋洋覺得難以溝通。也說不上是甚麼問題，只能歸究自己太直接問及對方的背景及喜好，一般人似乎認為這是私隱，言談之間甚少分享自己。

“We need some honest conversation.” 就算只是識朋友，洋洋也認為「傾到計」是相當重要。兩年下來，每月報到，風雨不改，洋洋始終未能遇到一個傾到計的朋友，更遑論是女朋友。「我沒有刻意要找伴侶，我只是想入到（女同志的）圈子。連朋友都未識到一個，哪能講得太遠？」洋洋看得很開，將月聚當成一個節目，「正如你去看電影，看完不合心意，不要緊，下一次又有另一齣。」

下次又下次，洋洋終於等到好戲上演。2005年，一對女同志伴侶 Abby 和 Betty 成立“Les Peches”，¹ 定期租場搞聚會，每月「開設」一次酒吧，每三個月舉辦一次派對。創辦初期，參加者都是 Abby 和 Betty 的朋友，不少是外國人，交流以英語為主。由於入場需要支付數百元，Les Peches 的參加者都有一定

1 組織名稱使用女同志常用的簡稱“Les”，在法文又有“The”之意。加上前一年有另一個為性／別小眾的專業人士而設的組織“Fruits in Suits”成立，她們也喜歡“Fruits”的概念，聯想到 Peches，在法文意指蜜桃之餘，也有「釣魚」（Fishing）及「罪」（Sin）之意，便將組織取及為“Les Peches”。後來組織愈做愈大，會員增加至七千多人，七成是香港人，三成是外國人，每月酒吧大約有250至400人參加。資料來源：“Les Peches: Hong Kong's premier lesbian social organisation”, 2010, *Fridae Asia*, <https://www.fridae.asia/gay-news/printable.php?articleid=9632>; 〈【夜蒲國度】女同志每月一聚 彼此心照的狂歡時光〉，2016，《香港01》，<https://www.hk01.com/article/46332>。



的消費能力，通常都是在職人士，年齡層相對廣闊，橫跨廿多歲至四、五十歲。

有別於一般夜店，場地除了設有舞池，也必定會劃分一個相對安靜的區域，好讓參加者能夠把酒談天，有時間慢慢混熟。「我覺得 Les Peches 真的有花心機為社群提供娛樂。」洋洋記得，當時不定期會有沙龍，有時是讀書會，有時是講座，主題包羅萬有，還會探討女女情慾。其中一次讀書會在上環的咖啡店舉行，講者是一名外籍女士，主題是女性的高潮，一張張大特寫投影在大螢幕，講者還邀請參加者一起討論。洋洋目睹幾個香港女生嚇得花容失色，立即離場。「我當然留低聽完，有些事情就是要見識一下。」洋洋亦記得另一次展覽，主題是性玩具，店主分享了自己穿着珠鏈內褲的經驗，主持人還親自上陣示範乳頭夾。雖然洋洋並不認為這是甚麼一回事，但是性向自由、情慾自主、女性性權等一直是主流社會忌諱的議題，當年能夠公開討論，已經相當難得。「這些活動很難搞，但是她們做得到。」洋洋說。

眾裡尋她 談一千通電話的戀愛

身處合適的場合，洋洋很快就認識到新朋友，朋友又介紹了另一位朋友，「她就是我現在的朋友——女朋友。」然而，洋洋對她的第一印象，卻是「由頭憎到落腳」。那位女生一直戴着耳機，打招呼時只是點一點頭，甚至沒有報上姓名。三人

在蘭桂坊吃了一頓烤卷，女生全程不發一言，洋洋第一次遇到比自己更寡言的人。

翌月，洋洋照例出席 Les Peches 的月聚，照例獨自站在一旁，卻在人群之中發現另一個單獨的影子——就是上次那位女生。洋洋一個人，她也是一個人，兩個人終於聊起來。

「其實也不算傾偈，主要是她聽我講。」這一次，女生沒有戴着耳機，但是依然沒有出聲，只是靜靜聆聽洋洋自說自話。女生沒有裝模作樣，也沒有刻意客氣，她甚至沒有提問，但是洋洋覺得「即使她沒有說話，我也覺得她有在說話」。洋洋主動邀約再見，她又答應赴會，二人終於像一般人拍拖，由睇戲食飯開始。

第二次約會，她依舊沒有主動說話，但是有問必答：父母是客家人，有一兄一姐；在英國長大；做設計；在英國難找工作，回港尋找機會。

「我不想開始一段關係，因為我會返英國。大家在一起只是一、兩年，沒有意思。」她說。

「不要緊，就當大家來往一下。」洋洋答。

洋洋當時已經退休，女友比她年輕十二年，仍在為事業拼搏，平日要晚上八點才放工，但是二人依然會相約在九點多喝

一杯。洋洋住梅窩，女友周末會專程探訪，每次落船就直衝碼頭旁邊的麥當勞吃一份薯條，止住暈船。

二人一星期見面三、四次，周末周日也一起過。嘴裡說是來往，實踐起來卻像交往。

「Day one 她已經講明不想開始一段關係，我反倒非常相信這個人。」第一年約會，女友的說話始終不多。洋洋起初覺得「無聲勝有聲」，相處下來才發現單憑「覺得她有在說話」不等於「聽到她的想法」。女友從來不用提問，看在眼內記在心內；洋洋坦言不懂觀言察色，所以每事都要問，但是很多時都問不出一個所以然。

「我們應該分手嗎？」這個問題，在二人「來往」的頭幾年，不時在洋洋的腦海內盤旋。然而，二人從未為關係正名，又何來除名？

有一天，女友突然提出想回去英國，一來因為做設計太辛苦，想進修轉行；二來因為她始終不太喜歡香港。洋洋沒有挽留，因為女友一早已經講清楚，「我了解她為人，她要走就要走，我說甚麼她都會走。」

相距九千多公里，航行十三小時，時差七至八小時，二人的距離卻前所未有地接近。女友留英三年，洋洋每一天都會致電給她，每一次都會聊上一小時，時間通常都是英國的早晨。

昨日做了甚麼？晚飯吃了甚麼？我見了朋友A。最近下雪呢，一推門就跌落一屋頂的雪。我明天早上要開會，不如約在下午通電話？

她們會約定時間，每一次都是洋洋致電，每一次女友都會接聽。三年下來，每日報到，風雨不改。

「我想，都是我的需要吧？我想聽見她的聲音，我想關心她，也想她關心我，自然就會打電話給她，剛好她又騰得出時間。」

「交往」說成「來往」，「刻意」說成「剛好」，或者都是洋洋的期望管理。

終於有一天，女友提出回港，原因是英國的就業環境不太理想，加上前老闆邀請她回巢，她決定試一試。「當然，你在香港也令我更想回來。」難得一句甜言蜜語，洋洋還沒來得及高興，女友已淋下一盆冷水：「假如我過不了試用期，還是有可能離開的。」

女友為人比較保守，凡事留一線，頭盔永遠戴好戴滿。相識七年，洋洋也習慣了。女友後來坦言，當日離開曾以為二人不會有下文。「童年和家庭對她有一定影響，她擔心受傷害，比較保護自己。」洋洋也經歷過父母離異，她知道自己同樣渴求情感，只不過與女友採取的表達方式不同。

我們結婚吧？

2013年，女友回港。女友由香港去英國，又由英國返香港，洋洋每一次都落手落腳幫忙執屋搬屋。這一次，二人終於同居。洋洋由梅窩搬出大埔，一來方便女友上班，二來方便自己出市區探望住在老人院的媽媽。

兩間屋變做一間屋，兩個人組成一個家。女友的工作時間長，回家已經「腦死」，家務都是由洋洋打點。清潔洗衫不在話下，洋洋還由零開始學烹飪，跟着 YouTube 學會蒸炒煎炸，煲湯煮飯。女友也從不挑食，洋洋煮甚麼她就吃甚麼。

有一次，二人逛宜家家居。

「你有沒有試過 Ikea 的急凍食物？」女友突然問。

「急凍食物有甚麼好食？」洋洋下意識回答。

二人沒有繼續這個話題。直到下次洋洋經過宜家家居，想起與女友的對話，那天又因為事忙未有預備新鮮餸菜，破例買了一包薯餅、肉丸和椰菜仔。那夜，洋洋將所有食物一次過焗熟，擺滿一碟之後又嫌不夠體面，多添一塊煎雞扒，但是比起平日三餸一湯，還是相形失色。

女友放工回家，洋洋有點不好意思，遞上那碟急凍餐。



「這個，好食得不得了。」女友大讚，「明晚可以再煮嗎？」

如是者，洋洋連續煮了三晚急凍餐，女友全吃清光。

「你不會覺得悶嗎？」洋洋問。

「不會啊，我對食物的要求真的很簡單。」女友想了想，續說：「下次煎魚柳也好，食蒸魚要吐骨。」

洋洋不知道該好氣還是好笑，平日預備小菜湯水更花心機，看來自己一直對牛彈琴。

“Thank you for providing me a home.” 女友輕輕說。

這句話，對洋洋而言，是最好的回饋。

「經過這麼多年，我相信她很清楚我是一個怎樣的人，她知道我對她好好，也承認我對她好好。」洋洋說：“I am so proud.”

照料女友的起居飲食，洋洋得心應手；但是一來到交際做人，洋洋反倒要向女友學習。「她常說我是一個頭腦簡單的人，思慮不夠周詳。睇人眉頭眼額，好多時都是女友教我。」例如飯局到夜深，眾人開始打呵欠，洋洋仍在長篇大論的話，女友就會示意她收口。

「我覺得自己選對了人，她能給予我所欠缺的東西。」正如洋洋喜歡自由，女友也從不過問她的日程，互相尊重。同居一年之後，洋洋覺得是時候考慮結婚。

「結婚的話，我們穿甚麼好？」洋洋問。

「不要婚紗。」女友想了想，笑說：「穿牛仔帽和牛仔褲好了。」

「應該在哪裡慶祝？香港？英國？」

「那要看我們邀請甚麼人。請朋友的話，我要去英國。」

「我的朋友呢？」

「請他們一起飛到英國吧。」女友不假思索。

「那麼，要請家人嗎？」

女友沒有作聲。靜默片刻，她緩緩說起一件事。

女友早向哥哥和姐姐透露與洋洋的關係，但是一直未有向媽媽出櫃。

有一天，女友跟姐姐說：“I want to come out to mother.”（按：我想向媽媽出櫃。）

“What for?”（按：為了甚麼呢？）姐姐反問。“She is very old, and very traditional. You’ll just hurt her feelings.”（按：她老了，也很傳統，你只會令她傷心。）

女友對洋洋說：“She did bring her boyfriend home, and we were happy for her. I want to bring my partner to my family, and they can be happy for me. What’s the difference? I don’t understand.”（按：姐姐帶男友回家，大家都為她高興。我想帶我的伴侶回家，讓他們也為我高興。到底有甚麼分別呢？我不明白。）

法律面前 平安紙不一定保平安

女友說完這個故事，二人就沒有繼續結婚的話題。其實洋洋與女友的媽媽也熟稔，三人會一起飲茶食飯，但是老人家來自傳統的客家家庭，只當她們是好朋友。洋洋理解，對於女友而言，一切都是壓力。洋洋覺得結婚是一件開心事，能夠與親朋慶祝當然最好，不過也不一定要做。於海外結婚的同性伴侶，目前在香港只能享受有限的權益及福利，² 但是「彩虹行

2 海外結婚或民事結合的同性伴侶，目前在香港的權利包括：配偶獲受養人簽證並在港工作或創業、合併報稅權利、公務員配偶福利、申請成為無血緣子女的共同監護人、申請監護令讓配偶成為代決人、預設指示讓伴侶參與醫療決定、根據《家庭及同居

動」成員岑子杰就此提出司法覆核，終審法院於2023年9月5日裁定他部份勝訴，³ 香港政府需要於兩年內確立同性婚姻的替代框架，讓同性伴侶關係於本港獲得法律承認及適當權利。

身患紅斑狼瘡，加上比女友年長十二歲，洋洋總覺得自己會比她早逝。2017年5月，媽媽離世，促使洋洋立下遺囑。「我只是普通打工仔，名下的所謂財產也不是甚麼大數目，但是有一天要走的話，也希望身邊最親密的人用得到。」然而，為媽媽辦理身後事的過程，洋洋發現一份遺囑的保障是遠遠不夠。

由於媽媽沒有立下遺囑，洋洋需要先往遺產承辦處申請授予書。

職員劈頭就問：「誰是配偶？」

「他們早就離婚了。」

「證明呢？」

關係暴力條例》申請強制令，以及根據《死因裁判官條例》安排亡偶的後事（如殮房認屍、法醫服務、辦理死亡證等殮葬事宜）。至於遺產繼承權及申請公屋和居屋的權利，律政司及房委會於被上訴庭判敗訴後，仍然選擇上訴至終審法院。資料來源：社區法網、G點電視。

3 終審法院認為香港政府在拒絕承認同性婚姻權的前提下，未有為同性伴侶提供替代方案，未能在法律上承認同性關係，做法屬於違憲，亦有違《香港人權法案》所保障的權利。法庭於2023年10月27日頒令，要求政府訂立替代框架，有關命令暫緩兩年生效。

「他們在1956年離婚——我是她的女兒。」

根據香港法例第10A章《無爭議遺囑認證規則》第21條，申請人士的優先次序是配偶、死者的子女、死者的父親及／或／母親以及死者的兄弟姐妹。

職員解釋自己只能公事公辦，洋洋先要提供父母的離婚證明正本。她內心忐忑，回家翻箱倒籠，沒想到還真的找到一份副本。洋洋風塵僕僕趕到家事法庭查詢，得知父母早於婚姻條例在1971年生效之前已經離婚，副本算是合法文件。

處理遺產的折騰過程，令她深深體會到「合法」二字的重要性。一個人去世之後，制度是先講配偶，再講子女，而且全部都要證明。「香港尚未通過同性婚姻，如果我們沒有合法的配偶身份，到底要如何順利安排身後事？我和伴侶如何保障彼此？」洋洋憶述甚麼都是淡淡然，唯獨說起此事，終於表露不忿。

事實上，身後之事遠不及當下生活切身。當時因為此事，洋洋曾再次提出結婚，但是女友未有正面回應。「其實我不想死後才將財產留給她。」洋洋認為，假如二人的關係受到法律保障，她希望提早轉贈部份名下財產給女友。「但是我現在不會這樣做，因為女友一旦遇上不測，我未必能夠繼承她的財產。」洋洋擔心女友的家庭成員可能會對她有所質疑，最壞情況要對簿公堂。「無論異性戀還是同性戀，說到財產還是比較

敏感。如果一張平安紙可以處理所有事情，哪來這麼多爭產官司？聽起來是很現實，但是我們缺乏法律保障，不得不考慮這些問題。」

說到底，洋洋認為社群一定要成功爭取同性婚姻合法，「我知道很難，但是這一定是其中一個目標。」岑子杰提出的司法覆核案能夠取得終極勝訴，絕對是性／別小眾社群的歷史時刻。然而，政府在兩年後會推出怎樣的替代方案？能否真正令同性伴侶獲得同等的法律權利？勝訴之後，社群仍然需要關注立法進度，未來尚有另一段征途。

死不去 麻煩更多

洋洋與女友無所不談，生老病死都是日常話題。踏入六十歲之後，洋洋也開始正視醫療和殯葬的細節。即使身體未有大毛病，她已開始考慮將來行動不便的話，到底要如何處理。

「不如到時一齊返英國？」女友試探。

洋洋認為自己未曾在英國生活，年紀和身體都難以適應。女友只說了一句英國都有 National Health System，但是未有堅持。

「或者請個外傭？」女友又提出另一個可能。

「假如我行得走得，請外傭是可行的；假如我連飲杯水都要人服侍，可能就有點麻煩。」洋洋很快就跳去結論：「我去老人院都可以的。」

女友沉默片刻，又道：「就算到時要坐輪椅，也可以裝修家居，擴建浴室，別人就能夠幫你洗澡。」

洋洋明白，女友不想她去老人院。

「我只是覺得去老人院生活，可能會自由一點。」洋洋已經想得很遠，患病很可能導致自己的能力下滑，但是請外傭幫忙也要本人有能力給出明確指示。洋洋了解女友脾性，她不喜歡被管，也不喜歡管人。就算外傭能夠幫輕家務事，女友也未必應付到照顧者的責任。女友平日情願食麥當勞或麵包解決一日三餐，洋洋想像到，要她照料自己的話，對方可能會好辛苦。「到時自己身體狀況欠佳，見到身邊人要為自己奔波，哪會安樂？」洋洋認為，需要找出一個彼此都能夠舒服過活的方法。

洋洋記得，母親當年也是自己提出去老人院。因為她腰骨不好，不能自行起床，但是當時洋洋與弟弟都要上班，也有自己的家庭，她不想麻煩兒女，認為自己去老人院對大家都好。「媽媽是一個非常獨立的女性，這方面好值得我學習。」

母親在老人院生活了六年，與同房長者非常熟絡。洋洋也因為經常探望，對老人院的運作略知一二。洋洋始終希望自

己不用太早去老人院，最理想是可以等到八字頭。對於同房生活、衛生氣味等問題，她已經有心理準備，「我覺得我會 OK。」洋洋再說一次：「我覺得我會 OK——也不輪到你不 OK，你還可以怎樣？」

老人院始終是群居生活，問題更多是源自於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洋洋認識一位女同志，二人早年在女同盟會相識，對方因為經濟困難，晚年需要申請政府的長者住屋。由於廚房和浴室需要共用，但是同住的長者是異性戀，朋友感受到住客害怕，相處上時常需要避忌，生活得頗為辛苦。

洋洋認為，群居生活最重要是遇到容易相處的人。次之就是生活環境，院舍最好不是位於鬧市，空氣少一點污染；然後自己可以享有獨立房間，獨立廁所，閒時可以去戶外花園走動。「當然，假如可以有一個同志村，大家 speak the same language，就一定是最完美。」即使上了年紀，洋洋依然期望認識新朋友，她不認為年長就等於保守，或者社交興趣就會比較低，生活安樂也可以保持忙碌。

人生走到七十歲，距離死亡一端愈來愈近，洋洋並無忌諱，更認為要及早準備，畢竟意外說來就來。「死就很簡單，只怕死不去會有很多麻煩。」最近，她正在了解如何「預設醫療指示」，好讓自己在喪失自決能力時，醫護人員能按照她的

意願，在特定情況拒絕維持生命治療。⁴ 該指示適用於三類情況，包括病情到了末期、持續植物人狀況或不可逆轉的昏迷狀況，以及其他晚期不可逆轉的生存受限疾病。⁵

在法律上，家屬並無醫療代決權，但是《香港註冊醫生專業守則》指出，在病人未能自決時，醫生應考慮家人的意見。假如直系親屬與同性伴侶關係欠佳，無可避免會發生爭拗。假如病人未有預設醫療指示，但是在精神上已經無行為能力替自己的個人事宜、財務、醫療或牙科治療作決定，同性伴侶亦可向「監護委員會」申請成為監護人，但是需要經過監護委員會批核，委員會成員如何看待同性關係，可能會影響結果。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136章），親屬定義甚廣，配偶或公認配偶排首位，但是「任何與或曾經與該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

4 「維持生命治療」指任何有可能延遲病人死亡的治療，例子包括使用心肺復甦法、人工輔助呼吸、血液製品、心臟起搏器及血管增壓素、為特定疾病而設的專門治療（例如化學治療或透析治療）、在感染可能致命的疾病時給予抗生素，以及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指透過導管餵飼食物和水份）。

5 第一類情況：病情到了末期。指患有嚴重、持續惡化及不可逆轉的疾病，而且對針對病源的治療毫無反應，預期壽命短暫，僅得數日、數星期或數月的生命，施行維持生命治療的作用，只在於延遲死亡一刻的來臨；第二類情況：持續植物人狀況或不可逆轉的昏迷狀況；第三類情況：其他晚期不可逆轉的生存受限疾病，指不劃入第一或第二類的嚴重、持續惡化及不可逆轉疾病，而病情已到了晚期，及生存受限，例子包括：晚期腎衰竭病人、晚期運動神經元疾病或晚期慢性阻塞性肺病病人，因他們可能用透析治療或輔助呼吸治療維持生命，而不劃入第一類，以及不劃入第二類的不可逆轉主要腦功能喪失及機能狀況極差的病人。

病人和家屬小心保管填妥的「預設醫療指示」，並在送院時把正本呈給醫護人員。假如指示適用和有效，醫護人員有責任執行；任何人，包括家屬，均不可以推翻其指示。香港現時並沒有法例規定「預設醫療指示」要以何種形式表達，但是醫院管理局有提供特定表格，表格必須由病人和兩名見證人簽署，其中一名見證人必須是香港註冊醫生，兩名見證人均不得在指示作出者的遺產中有任何權益。資料來源：醫院管理局

同住的人」亦屬於親屬。假如同性伴侶未有在外國結婚，可以考慮在政府推出的醫健通內，於「我的家庭成員」中添加「我照顧的家庭成員」以及「照顧我的家庭成員」，成員能查閱彼此的醫療記錄，算是另一種「證明」。

醫療往往牽涉開支，同性伴侶亦可考慮提早簽立「持久授權書」，授權伴侶或其他人在自己日後失去精神上的行為能力時，動用相關財產，維持個人及家人的生活所需。否則，病人的財務事宜就有可能要交由法庭裁斷。

對於年長同志而言，伴侶不是他們掛在口邊的常用語。洋洋與女友交往已經十六年，言談之間還是不時會將女友說成朋友，有時提到朋友，反而要澄清是普通朋友。「我知道我朋友的根在英國，我已經跟她說過，我死了她可以放心回去。」洋洋說。

「那麼，你想葬禮如何安排？」女友突然認真問。

「塵歸塵，土歸土，撒灰就好，綠色殯葬，別花錢。」

「到時我拿走一些跟我回英國可以嗎？」

「當然可以。」洋洋說：「我只希望你晚年過得安安樂樂。」

「總之你一日唔死，我一日都嚟度。」明明是一句情話，但是由女友說出來，往往直白得有一份莫名的喜感。

十六年滋養而成的感情，或許就是如此獨一無二，無以名狀。

門鈴響起，是網購速遞送貨。包裹內有數十包肉泥條，還有最重要的碎藥器，Pearl 急不及待拆開做實驗。

Pearl 手心放着磨碎的藥粉，抹上半條肉泥，輕輕走到 Daisy Maize 旁邊，十九歲的老貓立即來了精神。一轉眼，零食清光，餵藥毫不費功夫。她照版煮碗，給另一隻老貓 Little Man 餵藥，零食在前，牠甚至願意乖乖打針。

Pearl 放下心頭大石。兩個月之後，Pearl 將要回港三星期。她想確保上門顧貓的外傭能夠順利餵藥，特意提早準備，好讓貓咪適應。至於八歲的小狗 Butta，則會送去好友家中寄宿。

如臨大敵，因為定居溫哥華以來，Pearl 從未試過離家這麼久。

當日離開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爆發，她以為自己很快回來。六十九歲的她怎也料不到，再次回港竟然是三年半之後。

全家人的照顧者

2019年初，Pearl 接了九十歲的媽媽回家同住。當時媽媽剛做完手術，不能獨居生活。一直以來，Pearl 都是與伴侶 J 同居，二人的媽媽則住在同一屋苑的不同單位，方便照應。多年來，每星期去會所一起吃一頓飯，相安無事。

相見好，同住難，Pearl 與母親同住半年之後，精神幾近崩潰。她致電遠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三妹訴苦，三妹卻表示愛莫能助，「我可能會比媽媽先走一步，最近一直在咳嗽，我有不詳預感。」

驗身報告一出，結果是肺癌。

三妹一生浪跡天涯，以旅行車屋為家，與貓狗為伴。Pearl 知道她需要人照顧，二話不說放下手頭事務。

「媽媽，我要飛去照顧妹妹，沒有人照顧到你，你要暫時住老人院。」

「如果要我入老人院，我情願去死。」

「三妹痊癒的話，我會回來接你出院。」

臨出發之前的日子，媽媽掛在口邊的只有一句話：「我唔入去得唔得？」

Pearl 知道媽媽善於撥弄人心，為免事態演變成一場大龍鳳，她拜託朋友和外傭送媽媽入院舍，自己則提早離港。

三妹由診斷出肺癌到離世，前後不足一年。幸或不幸，Pearl 陪伴三妹走到最後，留下一段珍貴回憶。Pearl 賣掉了三

妹的住所，帶着她遺下的兩貓一狗，由佛羅里達州出發，穿州過省，坐了八日長途車，最終到達溫哥華。

Pearl 早於 1990 年代曾經移民當地，回到熟悉的街道，聯絡認識多年的朋友，就算遇上問題也比較容易解決。即使疫情肆虐，Pearl 困於溫哥華，也未至於手忙腳亂。除了適應新生活，她還要安撫獨留在港的母親。她付了車馬費給兼職傭人，拜託對方每星期探望母親一次。起初因為內疚，在佛羅里達州時每星期至少致電院舍三次，後來發現媽媽其實並沒有那麼想跟她說話，才減少至一星期一次。

然而，就算媽媽不願多談，但是有一個問題每次必提：「你幾時回來？」

Pearl 這次回港，頭等大事就是探望母親。她曾經打算接媽媽到溫哥華養老，然而，在當地生活三年半之後，她決定讓媽媽留在香港的安老院。「這個年紀的老人家，要適應一個全新環境是相當困難。媽媽在香港的院舍可以獲得 24/7 的照顧，溫哥華的私人院舍也未必做得到。」 Pearl 也知道媽媽已經習慣了全天候照顧，她只是問女兒何時探訪，但是沒有再要求回家居住。 Pearl 調整了心態，在接下來的日子盡可能多回港探望，探到幾多次就幾多次。

回港第二件大事，自然是與伴侶相聚。二人在元朗一間小菜館，宴請兩桌朋友，一起慶祝她們的三十六周年紀念。這段日子，二人一直維持一星期一次視像通話。孤身留在溫哥華，自己一個買餸，自己一個打理家居，自己一個照顧兩貓一狗，Pearl 坦承有點招架不住。她曾開口邀請伴侶前來陪伴分擔，就算是短住也好，但是對方一來忙於工作，二來不喜歡坐長途飛機。Pearl 又因為兩隻老貓患有長期病，照顧困身，不便遠行。「伴侶明白家人對我而言有多重要，也支持我陪伴三妹度過最後的日子，但是她認為是我選擇攬起兩貓一狗的責任，我也難以要求她甚麼。」 Pearl 說。

拖着拖着，由封關拖到通關，伴侶始終未有到訪，直到 Pearl 安排回港。

回港短短三星期，朋友排着隊見面，行程本已緊密，伴侶還是特意安排二人去澳門短遊，訂了當初拍拖去過的酒店。在歐陸式露台，躺在沙灘椅曬太陽，望着風景如畫的黑沙海灘，海風吹來一絲絲浪漫。「在一起快要四十年，竟然仲有嘢係我估佢唔到。」 Pearl 笑說。即使這是二人分別最長的一次，但是相比起以往的難關，或許算不上是甚麼一回事。

這些年來，二人的關係像在浪裡行船。Pearl 坦言自己曾經出軌，最後東窗事發。事過境遷，自己如今已沒有困惑，也不



想再經歷那些混亂、情緒和壓力，伴侶亦表明下不為例。「我覺得我們都不會再發生這種事，我們已經跨越那個階段。」她說：「不過，假如她將來有外遇，我也不知道自己會如何反應。」

她們相識於1987年，拍拖不到一年便決定搞一場婚禮。“I don't care, I just want the concept.” Pearl 笑說。八年之後，二人迎來第一個難關。當時 Pearl 執意移民加拿大，伴侶不情不願陪同。因為伴侶是美國公民，除非獲得工作簽證，否則不能在當地工作。「同性婚姻在當時的加拿大尚未合法，¹否則我們一定會結婚，她就可以立即用配偶身份取得國籍。」 Pearl 感嘆。

之後幾年，二人爭吵不斷。

「分手算了。」伴侶說。

「你真的要分手？你給我想清楚。」 Pearl 逞強。

有時，伴侶氣在頭上，奪門而出，Pearl 還是會放下虛張的聲勢，一把將對方從門口拉回來。

1 加拿大一直設有普通法伴侶關係（Common Law Relationship），伴侶毋須結婚，只要連續同居至少十二個月，即可申請成為「普通法伴侶」，在法律上獲得與婚姻無異的權益，但是要到1999年，加拿大最高法院才裁定普通法伴侶不限性別，接受同居的同性伴侶登記。2005年，加拿大國會才通過性別中立的《世俗婚姻法令》（Civil Marriage Act），同性民事婚姻從此合法。

機緣巧合，舊同學拋出橄欖枝，邀請 Pearl 去商業電台公關部工作。回港後，她在起初兩年還不太習慣，但是見伴侶生活得如魚得水，她的合約還是續了又續，一留低，便是二十年。

2005 年，因為爸爸患癌，Pearl 在朋友介紹下接觸到一間靈恩派教會。她本身是基督徒，只是一直都沒有返教會的習慣。那時，她剛好需要情感支持，也希望「親近上主」能夠有助爸爸病情。伴侶即使沒有信仰也會陪伴 Pearl 出席崇拜，二人在公開場合相處得非常低調，從不表現親密。

某一次查經班，牧師在小組突然跟她說：「Pearl，同性戀是罪。」

活到五十歲，Pearl 第一次因為一句說話，質疑同性戀是一個問題。

「可能因為與團契成員建立了友誼，我竟然相信了。」教會成員要她懺悔，要她離開伴侶，當時 Pearl 與伴侶已經在一起二十二年。

Pearl 不知道如何開口，她決定去溫哥華探望妹妹，離開一切紛亂，沉澱一下。

出發前幾晚，Pearl 曾經跟伴侶提起，「《聖經》說同性戀是罪，你知道嗎？」

「假如你相信的宗教真的這樣認為，我也無話可說，最緊要你自己舒服。」

伴侶冷靜回覆，Pearl 拿起剩餘的勇氣，在機場臨出發前又寫了一封電郵給她，「我的確相信宗教，但是突然得知同性戀是罪，我不知道如何是好。」

「無論你認為是甚麼也好，做你想做的事，只要你覺得舒服。」

那一刻，Pearl 的內心升起一份無以名狀的感動。「那一份感動，我這輩子都會記得。」

因為宗教 在五十歲首次走入衣櫃

或許神是一個好人，憐憫「罪人」。Pearl 在溫哥華遇上一間性／別小眾友善教會，第一次遇見一位女同志牧師，第一次發現《聖經》可以有許多種解讀方法。例如是一個人愛上主的同時，亦可以愛任何一位世人。回港後，Pearl 向原本的教會提出異議，結果被暫停侍奉。這一次，她不再質疑自己，而是報讀神學，近距離了解自己的信仰。2008年9月，她正式踏上「走出埃及」的旅途，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開始上課。

第一年，第一個考驗，就是如何走出內化恐同的衣櫃。

幸或不幸，Pearl 從小到大都毋須面對出櫃的掙扎。青春期讀女校，女女關係在同學之間是平常事，加上校風自由，學校並無明文禁止。她的形象一直較為陰柔，貼近主流社會的框架，但是拍拖對象一直有男有女，家人全都知道，不過從不干涉。踏出社會工作，她先從事製衣業，後來加入商業電台。「兩個行業都是『孿人當道』，我從來不需要 out。」

雙性戀的概念在當時並不普及，奇在 Pearl 從不感到困擾，而且這反倒成為她的「保護色」。「異性戀者會認為我曾經同男人一齊，同性戀者也會認為我曾經同女人一齊。」直到二十多歲，她才第一次接觸到雙性戀的概念，在酷兒世界找到自己的身份。

多年來自由自在做自己，直到五十歲上教會，Pearl 才第一次感受到何謂性傾向歧視。幾年下來，已經足以讓她內化恐同的情緒。報讀神學的時候，她知道學生來自五湖四海，各有不同宗派背景，各個宗派對性／別小眾又各有看法——當然，都是反對為主。由入學面試到正式上課，她從沒表明雙性戀者的身份。「因為之前在教會的經歷，我不想再面對衝擊或排斥，也不想與人爭拗。」即使課堂上有學生反對酷兒神學，她也未有公開反駁。

退一步不一定開闊天空，忍一時反而激親自己。隱忍一年，因為一次溝通誤會，Pearl 發現自己已成驚弓之鳥。那一

年，一位出身於保守神學院的牧師，從美國來港擔任客席講師，Pearl 因為與他的太太是舊同學，很快變得非常熟絡。

有一次，Pearl 前往師母家中作客，師母拿出兩本書，她瞥見主題是「同性戀是罪」，立即害怕得全身抖震，雞皮疙瘩瞬間爬滿全身。

「你為甚麼給我這兩本書？」 Pearl 大驚，她以為師母得悉她是雙性戀。

「我知道你與某人是好朋友，我想你拿給她看看而已。」

Pearl 努力收起過敏反應，以免惹起師母懷疑。

約會結束後，Pearl 的心情極度低落，她致電幾位相熟的同學去吃下午茶。沒想到，她一坐下就忍不住哭。那一刻，她覺得自己不能再隱瞞下去，決定跟同學出櫃。同學們都是異性戀，但是共學一年有多，Pearl 知道他們都是志同道合之人。同學們沒有令她失望，對於她的性傾向非常包容。

出櫃之後，Pearl 接觸到其他酷兒同學，當中有彎有直。「有人認為要隱藏自己太辛苦，我也不想再欺騙大家；異性戀同學則想表達支持，鼓勵其他仍在衣櫃的人。」最後，一共十人，決定向整個神學院出櫃，後來還在校內成立「酷兒團契」。畢業



後，Pearl 連同一群教牧同工及神學生，於 2013 年創立「性神學社」，貫徹酷兒神學的宗旨，拆下所有邊界，將人們從隔閡之中拉回來。

沒料到，第一個立下邊界的人，是 Pearl 的伴侶。伴侶知道 Pearl 成立性神學社之後，一定需要公開分享自己的經歷，「她叮囑我不能提到她的名字，也不能展示她的樣貌。」伴侶認為性傾向是非常個人的事情，毋須公開討論，但是她也不會干涉 Pearl 的行動。

十年來，伴侶從未出席性神學社的任何活動，但是久而久之都會參與 Pearl 與神學同學的聚會。直到 2022 年，兩位女同志學生情侶，疑因受感情問題困擾而自殺，伴侶得知後久久未能釋懷，因為兩位學生就讀她的母校，算得上是師妹。伴侶與 Pearl 在視像通話時多次提起此事，過了一段日子，伴侶突然跟她說：「我打算出席一個工作坊，與年輕人分享自己的經歷。」

Pearl 的第一反應是驚訝，同時又為伴侶感到高興，但是一出口又忍不住調侃，「過去十年我不就是在做同樣的事情嗎？就是公開肯定自己的身份，鼓勵其他人，你現在終於明白了嗎？」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時間。」伴侶有點不悅。

Pearl 知道此事對伴侶而言有多重要，旋即收起胡鬧的笑臉，認真聆聽她的分享大綱。

三十六年的感情，依然經得起考驗，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二人有默契地為彼此保留足夠的自由及空間。

二人在財政上完全獨立，從不過問彼此的收入或儲蓄。她們不會討論甚麼計劃，但是會因應不同情況自行調節。例如 Pearl 當初回港工作有房屋津貼，也負責聘請外傭，其他使費就各付一半；現在 Pearl 轉為兼職工作，仍有全職的伴侶就自動波支付大部份賬單。

1990 年代移民加拿大之後，Pearl 還立了一份遺囑，「不過我不知道她有沒有自行立一份。」 Pearl 笑說。當時 Pearl 有養狗，她在遺囑寫明，自己不幸先離世的話，狗隻就交由三妹照顧。她覺得伴侶不太喜歡寵物，無謂徒添對方負擔。「我應該有跟她提過遺囑一事，但是從未詳細討論。因為我了解她的想法，她也清楚我的想法。」

三妹患癌去世之後，Pearl 第一次修改這份遺囑。律師是她的朋友，也是貓奴，建議她為兩貓一狗成立信託基金，指明一個照顧者。這一次，Pearl 選了二妹的女兒，負責照顧現時八歲的狗狗。「假如我真的患上絕症，我會安排兩隻十九歲的老貓安樂死。始終醫藥費並不便宜，信託基金都未必足夠。」

除了幾隻小生命之外，她亦有分配個人財產，受益人始終只有媽媽和二妹。「我覺得伴侶不需要。」 Pearl 說得理所當然，「一來我知道我們擁有的不多，二來我是按需要決定。」她表示家族長輩擁有長壽血統，現年九十三歲的媽媽依然身體強壯，她擔心自己先走一步的話，無人照顧到母親。 Pearl 深明伴侶不似自己重視血緣關係，伴侶與母親也不是相處得很好。「況且伴侶沒有這個義務，我不認為她要為我的家人負上任何責任。 It's an end when I ended. 」

生前事終了，代表身後事才正要開始。二人至今仍未結婚，伴侶沒有相關的法定權利，但是她深信彼此的親人都不會介入。二人早就說好， Pearl 要火葬。不過，她們從未討論要安排任何儀式。 Pearl 心知伴侶為人簡單，肯定毋須舉行儀式。然而，假如她先伴侶一步離世呢？「伴侶想做些事情，做完又會舒服一點，那就做她想做的事。」她說得雲淡風輕。

今日的淡定，是她沉澱三年的領悟。三妹在 2020 年離世， Pearl 才首次思考身後事。

臨走之前，三妹叮囑兩位姐姐和摯友毋須舉辦任何儀式， Pearl 自當遵命。三妹生前喜歡滑浪， Pearl 經常不自覺漫步到海邊，在長椅坐上半晌，試圖在其他滑浪者的身上尋找她的影子。然而，喪親的後座力是如此猛烈，心中有一種無以名狀的傷痛，一波又一波襲來，卻遲遲未能拍岸。 Pearl 知道自己真的很想很想做一點事情，以表懷念。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到，儀式是為了在生的人而做，是為了療癒每一顆悲痛的心靈。」 Pearl 想通了，她知道三妹不會責怪她。

那一天，Pearl 召集了三妹的滑浪朋友在海灘集合。眾人帶上滑浪板，口中咬着鮮花，一起划到離岸不遠的海面，手牽手圍成一個圓圈，悼念三妹。儀式本來名為 Paddle Out，為了尊重妹妹的意願，Pearl 改稱儀式做 “Not a Paddle Out”。完成儀式後，Pearl 與二妹及三妹的好朋友一起去吃壽司，喝清酒。「吃着三妹生前喜歡的菜式，她好像仍然與我們在一起。」 Pearl 說，她與三妹的滑浪朋友至今仍有聯絡，他們也覺得三妹仍然是每天最早來到海之中的浪人。

三妹離世之後，Pearl 一度無法爬出傷痛的深淵。她是大家姐，兩個妹妹一向與母親保持距離，地理上更遠在外國，只會在財政上提供支持。照顧母親的重任，自然而然落在 Pearl 身上。母女倆並不怎麼親近，常有齟齬。有時太過激氣，她會向兩位妹妹吐苦水，三妹又比二妹更能理解她，經常以幽默化解恨怨。她不時翻閱舊電郵和舊訊息，憑片言隻語感受三妹的存在。



陷入低潮的日子，Pearl 在滿腔悲傷之中，還繼承了三妹的憤怒。三妹曾經質疑，為甚麼媽媽可以活到九十多歲，自己卻要這麼早死。「我很記得這番說話。」 Pearl 感嘆，「單憑為人而言，我也認為妹妹比媽媽高分。有時我會覺得，自己照顧媽媽到今時今日，只因傳統文化要求子女照顧父母。」

與此同時，Pearl 也不禁質疑信仰，「既然神愛世人，為甚麼祂會選擇有人要患病，有人要早死？」她與神的關係時好時壞，時近時遠，有時感恩，有時憤怒。「直到現在我還是不明白，我也不期望神會有回答。」

或者，過程本身就是答案。

遠親老友難復道 不如努力睦近鄰

放售三妹的房屋後，Pearl 因為兩貓一狗未能順利上飛機，意外地開展了一場公路旅行，起點是美國佛羅里達州，終點是加拿大溫哥華。八日七夜，每一日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向下一個目的地進發。Pearl 帶着兩個行李箱前來，卻裝滿一整車膠箱離開，她覺得自己好像帶着妹妹一起回家。「妹妹鍾意 on the road，這趟公路旅行應該是她的主意。」

生活有了明確的目標，逼使 Pearl 走出愁雲慘霧。為了抒發情感，她也開始寫日記。寫着寫着，情緒逐漸平復；寫着寫着，她從過去寫到未來，觸發她思考一系列陌生的問題：

將來我與伴侶要入安老院嗎？

如果我突然患病，是否留在加拿大治療？

伴侶突然患病，是否留在香港治療？

如果我留在加拿大，伴侶是否前來陪伴？

如果伴侶留在香港，我要如何安排？

Pearl 以前甚少憂慮將來，三妹離世才令她驚覺這些事情原來隨時都會發生，「而且不是很遠的事，只是我一直未有面對。」今年踏入七十歲，她表示目前最大的憂慮還是最實際的財政。雖然她有積蓄，但是數目並非大到足以完全退休。不過她又好似接受了這個事實，直言不介意租樓住，住到老死為止。

生老病死，有人認為死亡不足為懼，反而更加擔心有病無法醫。「這就關乎一個人如何看待死亡，假如你接受到死亡是生命中必然發生的事，無論你有多擔心，要來的始終會來，有錢無錢，各有醫法。」

相比起病痛，Pearl 更在乎如何老去。

「熱鬧。」 Pearl 說：「我會用這兩個字形容自己。」從小到大，身邊總有一圈圈朋友，自從十幾歲開始拍拖，她從未試過沒有伴侶。以前與伴侶同住，二人會一齊煲劇，即使是一人開一部平板電腦，各有各的步伐，最重要是有一個相知三十六年的人相伴。「我們不止是愛侶，還是家人和朋友，習慣了生活中有彼此存在。」

過去三年半，她第一次感受到何謂孤單，「原來年長獨居就是這樣子。」

Pearl 以前住在元朗，一群住在附近的朋友都是性／別小眾，友誼之歌高唱十多年。元朗組習慣一有時間就相聚，住同一屋苑的朋友甚至會即興相約在會所食飯，「我喜歡有一個緊密的朋友群組。」

當初回到加拿大，Pearl 特意住在溫哥華，而非遠一點的列治文，原意也是為了住近朋友圈。然而，住得近不代表見得密。朋友之中有不少是情侶，習慣兩個人生活。即使住所車程相距少於十五分鐘，見朋友通常都會預約。初到埗之時，Pearl 要控制自己減少給朋友傳訊息，也要改掉即興叩門的習慣，以免令朋友覺得有壓力。

況且，就算地理距離再近，並不代表彼此頻率相近。即使與移加的朋友相識多年，但當日在香港亦非經常聚頭。「元朗組的成員非常多元，大家講八卦之餘，又可以討論深入的

議題。」例如美國和加拿大最近掀起「反跨性別浪潮」，溫哥華的朋友並不怎樣關心，唯一一次討論亦教 Pearl 覺得匪夷所思。「其中一個朋友是女同志，她卻表示自己不想與跨性別共用廁所。」 Pearl 指出性別中性的廁所都是獨立分格，但是也沒有再解釋太多，「我不知道該如何繼續這個話題。」她語帶無奈。

新冠疫情緩和之後，Pearl 曾於 2021 年擔任溫哥華同志遊行的義工，後來又積極參與溫哥華酷兒電影節，還獲選為 2022 年的其中一位“Troublemaker”，記錄她對性／別小眾社群的貢獻。雖說大家都是同道中人，但是她沒有太大動力開拓新關係。她會定期見面的酷兒朋友，都是十多年前在同志友善教會認識的牧師和基督徒。當地有一個非牟利組織名為 Qmunity，為不同年齡層的性／別小眾舉辦活動，長者也是重點服務對象。「不過我是在疫情時發現這個組織，看看 2024 年有無時間參與實體聚會。」 Pearl 說。

話不投機半句多，既然知己難尋，Pearl 索性努力睦鄰。有貓有狗的鄰居，是她落力親睦的對象。樓下鄰居養了一隻十四歲的大狗，最近因為要參加一個全日的短期課程，拜託 Pearl 幫忙放狗。「我當然說好，一來大家熟稔，二來我也知道自己將來會需要她幫忙。」

這一次回港，她與伴侶總算定下「團聚」的時間表，伴侶應該會在兩至三年後移居溫哥華。「不過都是『初步』，一切都

有『可能』。」 Pearl 又發出招牌大笑。她的性格樂天，即使說起死亡，我們仍然處於歡笑聲之中。

「假如你的伴侶先走一步，你覺得自己會掛念她甚麼？」

「她的冷靜吧？」 Pearl 一本正經回答，「每遇突發狀況，我都會亂作一團，她的冷靜往往能夠令我也冷靜下來。」

「那麼，如果你先離世，你覺得她會掛念你甚麼？」

「我鬧佢囉。」她笑出一連串哈哈：「可能她會掛念我在旁嘮嘮叨叨，我可以錄音，她就會聽到我不斷問她：『你瞓咗未呀？』……」

論文三

唔夠 Man !

田野現場的亞洲酷兒陽剛特質

田野現場的陽剛相遇

在新加坡，一個炎熱下午，我們來到小食店與 Joey 進行訪談。這是我們的亞洲年長女同志研究計劃連續進行的第二場訪談；新加坡是我們的田野現場之一，另外兩地為香港和台灣。

當天較早前，我們與 Aden 碰面。一位五十八歲、外表陽剛的女同志。Aden 帶着侄女前來，使勁地與我們握手，並催促侄女與我們打招呼。「但你們想用甚麼稱呼？」Aden 問，「叔叔還是 *Kor kor* [哥哥]？」

與其他地區一樣，在新加坡「叔叔」是對所有年長男性的口頭稱呼，而 *Kor kor* [哥哥] 則是稱呼兄長的華語方言。兩個稱呼都適配我們這兩位研究者的年齡、種族和性別表達：我們顯然比 Aden 的小侄女年長，倆人都是華人且外表陽剛。這並非荒謬的提問，但我們無言以對，只能以笑代答。這是第一次，我們的陽剛特質在田野現場中受到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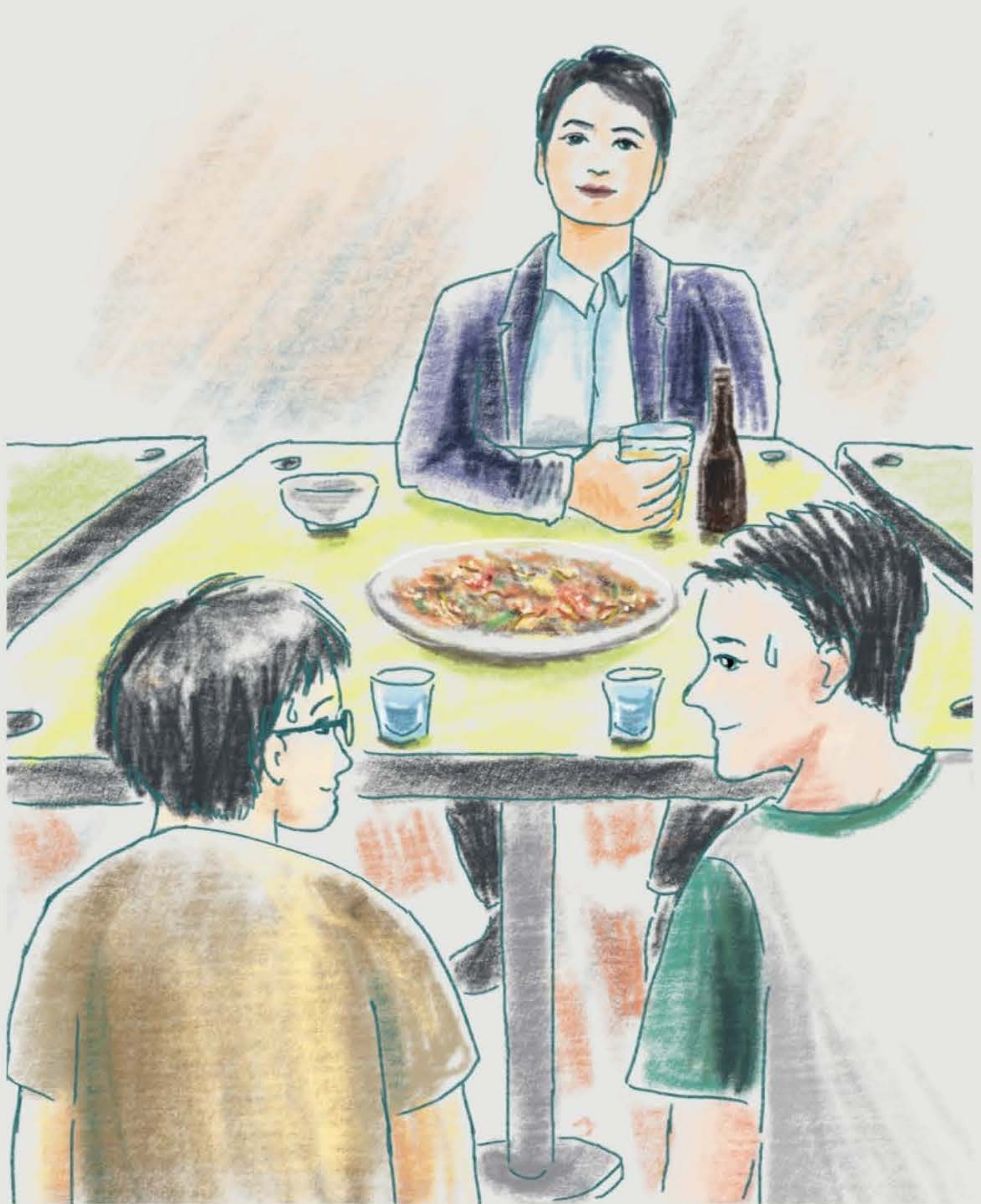
第二次引起關注，是在我們與 Joey 在她工作的小食店會面之時。這是對 Joey 進行的第一場訪談。此前，Joey 與我們兩人素未謀面，但我們的研究守門人已經向 Joey 解釋過我們的研究

內容。在我們從小食店的芸芸陌生人中認出 Joey 之前，一個魁梧、陽剛的身影已走向我們。我們的陽剛特質使彼此能辨認對方。六十歲的 Joey 健碩、英俊、皮膚黝黑，在 Joey 身邊，我們就像是單薄而孱弱的年輕 butch。

「要啤酒嗎？」Joey 邊問邊打量我們。我們稍頓，緊張地盤算着：我們酒量很淺，正午喝酒太早，在訪談期間能保持專注嗎？冰啤酒，炎熱的新加坡天氣，不是很醒神嗎？

「快啦……啤酒還是水？」Joey 重複，這次語帶一絲嘲諷和不耐煩。我們匆忙要了水，既尷尬又後悔——啤酒或許能讓我們形成同一陽剛陣線。Joey 給我們拿了兩瓶蒸餾水，自己則拿了一杯啤酒。

當我們扭開樽裝水的小膠蓋時，Joey 大啖了一口啤酒，飲料如今在桌子上形成了一道分界線。我們開始與 Joey 進行訪談，她警覺而寡言，拒絕被錄音；而我們則默默為錯失良機而懊悔。這是第二次，我們的陽剛特質在田野現場顯得舉足輕重。



本文探討我們自身的陽剛特質體現，如何影響我們認識和講述年長女同志受訪者故事的方式。受到女性主義和酷兒方法論傳統影響，在田野現場的遭逢促使我們思考我們的方法論實踐和知識論立場（epistemological positions）。

女性主義知識論的核心原則包括，堅持「情境探究」（situated inquiries），知識生產強調個人的即政治的；拒絕一種由不容置疑的「客觀研究者」，對可知的現實，不帶情感地揭露的知識生產模式，而是更強調研究者的反身性（reflexivity）（Haraway，1991；Harding，1987；Lal，1996；Trinh，1989）。概念上，女性主義的反身性取徑，會謹慎關注社會位置、權力關係和社會地位（Muhammad et al.，2015；Riley, Schouten & Cahill，2003）；留意田野現場內情感表達的轉變；考慮到研究者的私人和情緒面向；將知識生產視為永遠是未定論和未完成的歷程。關注情感和情緒、重視「差異地思考和認識／未認識」（thinking and un/knowing differently）（Gunaratnam & Hamilton，2017，10）——包括「不認識」（not knowing）（Page，2017，14）女性主義方法論，使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變得既舉足輕重又脆弱不穩，藉此開啟新的知識論可能性（Behar，1996；Etherington，2004；Gore，2018；Page，2017）。此種對既定「認識」方式的擾亂，啟發自非白人女性主義的政治實踐，試圖改變對知識生產的規範式假設，藉此回應社會不平等，並匡正不公義（Anzaldúa，1987，2002；Lorde，1984）。

酷兒方法論的取徑與女性主義方法論吻合。《現身》(Out in the Field) (Lewin & Leap, 1996) 一書是女同志、男同志、雙性戀、跨性別、酷兒和雙性人(簡稱LBTQI)研究者們反身實踐的代表性著作。自該書出版以來,酷兒研究者在田野中有意識或不自覺地將他們的多樣體現(embodiments)、酷兒展演性和情慾納入其研究框架,在各個學科領域中碩果累累,如人類學(Boellstorff, 2012; Khanna, 2009)、人文地理學(Browne, 2003; Bain & Nash, 2006)和社會學(Carter, 2016; Fields, 2013; Rooke, 2009; Ryan-Flood, 2009)等。隨着這些研究激增,一種關於情感和倫理的「酷兒感性」(queer sensibility)正在LGBTQI研究中逐漸成形,鼓勵全球酷兒民族誌學者在知識生產項目中進行實驗性思考和保持開放態度(Boyce, Engebretsen & Posocco, 2017)。

在研究年長女同志的過程中,我們借鑑了這些悠久且堅實的酷兒研究和女性主義傳統。雖然相互滲透的酷兒和女性主義方法論原則形塑了我們的研究者感性能力,但在動態的時間性(dynamic temporality)和對田野現場的地理空間認識中,它們是如何進行的?在本文中,我們暫且不討論廣受認可的酷兒女性主義質性研究對倫理及政治性的關注,而是提出具體和實驗性的問題:這些方法論實踐在田野現場中看起來和感覺上如何?研究者在實踐這些倫理和政治性關注時,涉及到哪些方法論的張力和複雜細節?

在此，我們會詳述和反思自己在實際進行研究時所用的方法論，作為外表陽剛或認同為 butch 的研究者，為有限的反身性寫作文獻略作貢獻（Gore，2018）。在經驗層次與表達層次上，陽剛特質可以同時既具支配力量又代表某種脆弱性，有鑑於此，我們認為，這項研究中的研究者與年長女同志受訪者之間的「陽剛動態」（masculine dynamic），促成了一種高度反身行動，以逐步處理方法論上關於包容與拒斥、局內人／局外人的邊界問題。這種「陽剛動態」，出現於各種 butch 身份相遇之時；隨着性相、種族、階級和年齡的軸線而轉變與積累；同時亦存在於田野現場中陽剛體現和情感流動的熱烈相互作用之中。

在這種陽剛動態的雙重演繹中，我們有意探討一種負責任的行動模式（accountability-in-action model）。這種模式要求開誠佈公地討論研究者和受訪者雙方截然不同的陽剛認同如何爭奪權力；亦需揭露在我們特定的方法論背景下，如何將此種權力爭奪表述為是一種拒斥或抵抗的形式。我們同樣有意探討陽剛特質之情感體現。雖然陽剛的我們未必言明或表達出來，然而這些情感體現已然在田野現場中曖昧地交流與「溝通」。更具體而言，我們想要試着追蹤我們的陽剛情感與體現、環境中的物質元素與身體感知，如何建構及影響我們的陽剛身體。

物質力量如樽裝水和啤酒，透過田野現場的動態，驅使我們的陽剛身體作出特定舉止。簡而言之，我們希望關注生產「年長女同志」知識的研究過程中，涉及的身體、實體物件

和物理環境。因此，我們思考本身對體現的關聯性（embodied relationality）、熱度、天氣、以及樽裝水和啤酒產生的情感傾向和身體反應，並進而改變我們「認識」新加坡年長 butch 女同志的方法。

為了擴展西方酷兒女性主義文獻中就局內人／局外人的辯論之概念邊界，我們就研究者和受訪者之間體現的、經由「陽剛動態」而產生的內在關聯性，從方法論的層面提供一種實驗性的、探索性的、公開自我批判的和自我反思的理解方式。此種理解方式匯集了多樣複雜的時間、空間、身份和感性體現，以生產我們關於新加坡年長陽剛女同志的知識。

接下來，我們將交代田野考察的脈絡鋪陳，然後透過研究過程中豐碩多彩的民族誌片段，反思：首先，沿着種族、階級和代際動態的軸線，我們的陽剛體現之混搭；其次，我們的陽剛展演性和情慾；最後，我們想像這種「陽剛特質」的動態，對於在亞洲生產一個「可知的」（knowable）但大體上「不可見」的年長陽剛女性群體的意義。

Butch / 陽剛特質與田野考察

與 Aden 和 Joey 的相遇，是我們的新加坡年長女同志研究之田野考察的一部份。我們的研究探討面對老化問題的女性之情慾和親密生活。情慾、愛和親密關係都是老年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然而他們的慾望卻常遭厭惡、嘲笑和忽視（Bradway

& Beard, 2015)，而迷戀年輕身體的流行文化則賤斥年老者們「佈滿皺紋又鬆垂的肉體」身體（Montemurro & Gillen, 2013）。此外，年長者之間無性愛的假設不勝枚舉（DeLamater & Moorman, 2007）。面對這些普遍存在的觀念，我們探索老化和情慾之間的關係，着手年長 LGBT 人士的學術研究（Van Wagenen, Driskell & Bradford, 2013）。

亞洲地區，就年長女同志和男同志生活的研究極其有限。江紹祺（Kong, 2012）的先驅研究圍繞香港十二位六十歲及以上的男同志，探討年長男同志使用的社交空間；而在台灣，趙彥寧（Chao, 2001）就「老 T」的人類學研究闡明酷兒親屬關係。Saskia E. Wieringa（2007）則提出十九世紀中國的絲綢女工反抗婚姻的自梳姊妹情誼中，存在女性同性親密關係的可能性。及至1930年代，部份自梳女為了維持經濟獨立而前往新加坡，她們為富裕人家的殖民風格大宅提供家務勞動，一直到1970年代。當地人稱她們為「白衫黑褲的媽姐」（black and white amah）。Wieringa 在與一位年長媽姐的相遇經歷中寫道，這位媽姐鼓勵她「要讓抵抗異性戀婚姻的女性故事繼續流傳」（Wieringa, Blackwood & Bhaiya, 200, 8）。除此之外，其他關於這些華人女性情慾生活的記錄少之又少。即便有關於長者的情慾研究，亦往往不將年長華人女性的經驗納入（Wong, Leung & Woo, 2009；Yan, Wu, Ho & Pearson, 2011）。儘管年輕女同志，包括女性陽剛主體，在亞洲各地的學術研究中日益受關注，例見如香港（Tang, 2011）、新加坡（Tang, 2016）、印尼（Blackwood, 2010）、泰國（Sinnott, 2004）和斯里

蘭卡 (Wieringa et al., 2007)；在已寥寥可數的年長華人女性的情慾生活與主體意識的質性研究中 (Ling, Wong & Ho, 2008)，幾乎不見年長女性同性慾望的研究。

正是在這樣的學術脈絡下，我們將計劃定位為研究亞洲地區年長華人女同志情慾主體。「亞洲地區」具體指新加坡、香港和台灣這三個社會、政治和經濟發展模式既相似又相異、以華人為主的社會。¹ 超越姊妹情誼和無性愛的主流觀念，我們企圖理解年長女性的同性慾望。在這個仍有待更多關注的研究主題下，本文專注於更鮮少受到注意的研究對象，即我們在新加坡作田野考察時遇到的，外表陽剛的年長女同志。

我們是兩位在香港和新加坡進行女同志情慾研究十多年、正處學術生涯中途的研究者。2016年至2019年，我們進行了一項比較民族誌研究的合作計劃，研究對象是居住於香港、台灣和新加坡的四十五位六十歲以上的女同志。三地中只有新加坡是兩人共同進行田野考察的地點，香港和台灣則由其中一位研究者獨立進行田野考察。

1 香港、台灣和新加坡被選為年長女同志和雙性戀女性的比較民族誌研究計劃的研究場域，該研究計劃規模更大，而本文僅討論在新加坡的田野考察。選擇比較這三個研究位址的原因是複合的：其中兩處是前英國殖民地，另一處是前日本殖民地，皆為「亞洲四小龍」經濟體，現在已發展完備，只有台灣的人均GDP稍微落後；三地社會皆以華人為主；文化方面，儒家價值觀和信仰在這些社會中很常見。台灣近年因對LGBT社群的進步態度而聞名，新加坡（2022年）與香港已非刑事化同性戀，但大多數LGBT人士仍背負社會污名。

我們分別從悉尼和香港出發，一同到達新加坡進行訪談。Shawna（鄧詩薇）曾定居新加坡，現於悉尼生活和工作；而Denise（鄧芝珊）則定居香港。尋找這項研究的受訪者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未婚」與「女同志」身份，再加上老年女性情慾，這些多重污名，使得覓得受訪者的難度大增。長期的男同性戀行為刑事化歷史，儘管並未直接影響女同志，仍為其LGBT身份再添污名。我們遂將年齡條件降低到五十五歲，共訪問了在新加坡生活的八位受訪者，其中大部份為華人，²且外表陽剛。

我們在研究文獻和田野工作的語境脈絡中，以「女性」（female）和「婦女」（women）這些詞彙來指稱年長女同志主體。然而在研究過程中，因為與Joey和Aden的相遇而使得這些稱呼變得令人不甚滿意。我們詢問新加坡受訪者希望我們如何稱呼他們，「無所謂」是我們得到的最直接回應，反映了我們的陽剛受訪者普遍不重視這個問題。這讓我們感到困惑，因為她們展演了陽剛特質，並以和Aden、Joey同樣的方式認出了我們的陽剛特質。

我們轉而從文獻中尋找答案，在Evelyn Blackwood的印尼tombois研究中發現了相似的思考過程。Blackwood（2010，42）認為「女性代名詞不適用於tombois，因為他們認為自己

2 其中一位年長女同志受訪者並非華人，但在新加坡生活超過二十年。

是男人」，於是參考美國跨性別運動中的詞彙並加以改編，最終決定使用「s/her」和「h/er」。

雖然這種內部參照在研究印尼的美國人類學者看來恰如其份，但我們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social locations）的模稜兩可使我們對此較為猶豫：我們的受訪者從未公開宣傳自己為男人，而且對代名詞並不在意。那我們為何在意？這是否與我們的學術訓練有關？或者，是因為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參考框架，毫無疑問地受西方性別和性相發展影響，但卻未必能完全適用於我們的受訪者或我們自己？在寫到受訪者們時，我們使用男性化名和女性代名詞，嘗試藉此對他們的身份認同保留開放的討論空間。然而，我們對於解決代名詞問題的那種本能式的不自在，並不僅僅是為了動搖「西方」在我們的社會位置上對性別和性相知識框架的主導地位，更是為了邀請讀者思考受訪者與研究者之陽剛特質的異同，而正是此種異同可能形成各種形式的包容和排斥。

儘管我們比受訪者們年輕了至少十多歲，但我們自認為是經驗豐富、具 butch / 陽剛美學、長期實踐非常規性別的主體，和我們的受訪者一樣。我們二人都是四十多歲的華人，有長期同性伴侶，並且獲香港和悉尼的大學聘任為學者。在我們那個年代的酷兒社交圈內，稱呼人時要用「正確」的性別認同代名詞的規矩未成風氣，不像現在，例如我們在教授性別研究本科課程時那般，提及自己偏好的性別代名詞是學生自我介紹時的必備禮儀。對我們那些不用追趕最新性別知識的年長受訪者而

言，思考性別代名詞更是陌生。對 Aden「叔叔還是 Kor kor」的提問，以及面對受訪者對男性或女性的稱呼的毫不在乎，我們都尷尬一笑回應，借用 Lynn Abrams 的說法，那些都是一種「知識論的反應」（epistemological reactions）（2018，82）。

這不是因為我們否認雙方的陽剛特質，而是因為年齡、專業背景、性相、階級和種族的差異，而產生對性別，特別是陽剛特質的不同理解和實踐。我們的反應源於幾個具體的知識論立場：作為研究者，驚訝於我們的年長受訪者在新加坡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對侄女的進步教育；作為酷兒和性別研究學者，始終懷疑性別化的分類。受訪者們的陽剛特質實踐與展演、不刻意努力要被視為男性，同樣源於他們各自的知識論立場。

本文中，我們選擇就 Aden 和 Joey 兩位受訪者作反思。五十八歲的 Aden 生於中上階層家庭，但因家庭暴力而早早離家。為了生計，Aden 曾任售貨員、服務生、調酒師、空服員、夜總會小姐和社區倡議工作者，後來進入大學進修，最終獲得博士學位，現從事社區工作。Joey 是一名基層小食攤檔檔主，在租來的小攤檔內烹飪並提供炒貴刁等素食餐點。過去，她曾在日本和香港做夜總會小姐，在泰國做夜總會保鏢，還在新加坡／馬來西亞邊境從事服裝、相機或「任何可以賣的東西」的進口業務。Joey 接受的正規教育非常有限。我們的對話混合了華語與其他新加坡方言。

1960年代至1980年代之間，Aden和Joey在新加坡和多個國家，度過了他們人生中情慾探索與發展的黃金時期，成為我們今天相遇的「出櫃」酷兒陽剛主體。正是這些與代際的、性相的、種族的以及階級的動態互相交織的知識論立場，其中各種層次的相似性與差異性，塑造了我們陽剛主體意識的相遇。

我們希望進一步將用以理論化新加坡陽剛特質的「陽剛動態」，放置於較廣大的社會脈絡底下，這個脈絡是華人為主的社會中的性別角色，受儒家思想、及亞洲地區的butch陽剛特質所影響。新加坡的霸權（hegemonic）陽剛模式包括基督教教會學校裡培養的「後殖民精英陽剛特質」（postcolonial elite masculinity）。此種陽剛特質在新加坡社會裡佔支配地位，旨在以英國的殖民統治者形象為範本，培養受過教育、體面、強勢的男性（Goh，2015）。此外，霸權陽剛特質也體現為「儒家的君子陽剛特質」，³旨在塑造負責正直，心繫社會與家庭的男性形象（Lim et al.，2019）。

這些陽剛腳本為新加坡男性提供了追求的典範；「得益於代際經濟和社會資本、種族和異性戀特權的男性，相對較易和較快實現這些期望」，而「受礙於艱困的非主流家庭背景、經濟地位低下、教育成就不佳、少數族裔身份、非異性戀和殘疾

3 「君子」經常被譯為“gentleman”或“cultured gentleman”，通常指尊崇儒家規範的磊落精英男性。

等多重劣勢的男性，則需奮力追趕……並感受到自身陽剛特質的不合格」(Quah, 2020, 58)。此外，深植香港、台灣和新加坡的儒家信仰(Tu, 1989)視父權制和以善意為掩護的沙文主義為其核心，並在公共和私人領域中嚴格監控男性和女性的性別角色(Ho et. al., 2018)。

正如男性會贊同這些引導其陽剛特質的腳本，butch 女同志亦會遵循那些監控其約會規範、社交禮儀和情慾互動的性腳本。在亞洲地區，butch 特質和身份的在地構成受到美國文化影響。

在台灣，“tomboy”一詞於1960年代冷戰時期自美國傳入，當時美國的駐軍和流行文化成為建立戰後反共國家的關鍵(Chao, 2001)。在美式酒吧的社交場合中，年長的陽剛女同志被稱為“uncles”或「老T」，其中「老」意為年長，“T”則是“tomboy”的縮寫。趙彥寧將1960年代的中產階級「老T」描述為有品味的時髦公子，帶着他們的「婆」(陰柔女同志)到高級餐廳和酒店購物、小酌和用餐。及至1990年代初，「小T」們(較年輕的tomboy)面臨新自由主義國家發展下的經濟困境，因此大多數人只能從事收入朝不保夕的不穩定工作。趙彥寧研究中的兩個T群體都個性大膽，不怕懼於生活的飄搖難測(2018)。

在香港年長陽剛女同志中，有些人常被稱為「先生」，並被誤認為男性而自豪，特別是那些在順性別、異性戀男性商業圈子中做生意打交道的人(Tang, 2022)。其他從事男性為主的職業的，有電腦技術人員、工程師和紀律部隊人員。

至於在新加坡，外表陽剛的女同志從事允許他們作男性化打扮的工作。年輕的勞工階級 butch，身穿制服 polo T 恤和褲子，可見於零售、餐飲商店。這些並非高薪工作。在以華人為主的新加坡社會，種族和性別同樣階層分明，上述這群非性別常規的女同志主要是少數族裔。

相比之下，年輕、華人、且陽剛外表的女同志，基於代際財富、社會和文化資本的種族優勢，躋身於安穩且高薪的職位，例如律師事務所、軍隊和學術界。至於年長的陽剛女同志群體，工作機會不太受種族影響，整體來說他們的經濟機會和職業選擇較少。華人、印度人、馬來人和混血陽剛女性可見於當地小食店，任攤檔檔主或其助手。本文提供對新加坡年長華人陽剛女同志的近距離觀察。

陽剛特質混搭：種族、階級與代際動態

如果我們點啤酒，我們的陽剛體現對 Joey 而言可能立即變得更清楚明顯，我們可能立即成為自己人而容易許多。然而，我們遵守了內心對「優秀」研究者規範的要求，拒絕酒精，以在訪談期間保持專注。這個決定事後被證明是誤判。Joey 對錄音感到不適；當她開始說話時，我們注意到她用新加坡方言與我們交談：在一個句子內混合幾種方言，於新加坡英語、福建話、廣東話之間快速轉換，亦用上了華語和一些日語詞彙。要跟上她的節奏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Shawna 是新加坡華人，本可以在這一點上形成族群共通點。然而，她成長於世代接受天主教教會教育、崇尚英語的中產階級家庭，過去十年在澳洲生活，這意味着 Shawna 能夠用以連結 Joey 的當地文化資源有限。這些精細分層的社會階層位置令語言變成了研究者和受訪者之間的另一個差異點。正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91）提到，語言是一個身份、地位和權力的鬥爭場域。諷刺的是，是 Shawna 的無力跟上 Joey 的多語並用，再生產了這些極度展現權力的關係，她與受訪者之間的距離因而拉得更遠。此外，如果陽剛特質是經由種族和階級的霸權所表述，那麼「西化」的研究者和當地研究對象之間的語言權力差異，最終也成為我們對陽剛特質表達的爭奪。

至於 Denise 久居香港而精通的廣東話，倒是成了我們的文化資本。即使 Joey 繼續以多種語言和方言進行交談，然而某種關於廣東話特有的親切感改變了研究過程的情感關係。儘管 Denise 自覺在新加坡語境脈絡下她是局外人，並且不時尋求 Shawna 解釋受訪者敘述中的文化意涵，但 Denise 出乎意料地與 Joey 擁有相同的慣習。

「在香港時，我穿性感的連身裙，像內衣一樣的開衩連身裙，露腳露大腿（笑聲）。你能想像嗎？」Joey 直視着 Denise，用廣東話提供以下資訊：「香港男人較斯文，他們不會亂摸。」突兀又額外的參照點——香港，還有 Joey 出人意表的過去，重新標示出 Shawna 既是局內人又是局外人。研究過程中，互動快速轉變。兩位研究人員忙亂地筆錄和解讀 Joey 變化不斷的語

法，在種族、階級、語言和性別的翻譯中迷失方向——即便我們沒喝啤酒，並全神貫注。

在我們的訪談中始終一致且明顯的，是清楚的代際動態。我們經常被年長受訪者視為年輕的「弟弟」，他們會給予建議，有時還會取笑我們「柔弱」的陽剛特質。但是 Aden 同時也會說，「他們不喜歡像你我這樣的人，你知道嗎？」見到 Denise 表示驚訝，他解釋道，「我們這些 *butch* 的人會被視為低人一等。他們會說『天啊！喂，不要這麼 *butch*』。」某程度你要面對這種複雜情結——你會不會被看出來是個 *butch* 而不是男人。也就是，*butch* 被看成是五十年代的產物、是一種倒退、無法適應社會，他們是窮人、被社會邊緣。」

其後，Denise 在她的田野調查筆記中寫下：

Aden 的話一直在我腦內回盪。我不是第一次聽到 *butch* 已經過時和是「一種倒退」，尤其是在年輕的女同志、酷兒女性和跨性別陽剛場景中。我將自己置放在過時的 *butch/tomboy* 身份的邊界。然而，當我面對年長陽剛女同志時，我常常因為我不合格的陽剛特質而微微刺痛。我回想起 *Juana María Rodríguez* 的「酷兒姿態」(*queer gestures*) 概念，知道自己這次失敗了(2014, 7)。對某人做出酷兒姿態是為了展示友好，希望找到共同點、一種親屬感和社交認可。就這方面來說，我就是不夠 *butch*。

研究過程中，有幾次感到失敗的時刻。例如訪談中，我們詢問我們的年長受訪者多年來有否因非常規性別表達和性傾向，而面對任何形式的污名和歧視，結果卻不如預期，我們收到的回答往往都是正向的，即使我們的受訪者成長於一個受嚴格性別意識形態和文化角色監控的國家和地區。事實上，Aden 和 Joey 從來沒有長期穩定的工作，這是被剝奪權益的證明，本研究中其他年長女同志亦證實了這一點。然而，他們表示自己從未感到被歧視。「你知道我性格，」Aden 說，「誰敢歧視我？你明知大家都知道，所以算了 lah。沒有人取笑我，沒有人說三道四。從來沒有。」

「你問了一個很直接的問題，」Joey 告訴我們，「人必須順其自然、放鬆。無所謂的。沒有人敢跟我打。我不像你們兩個，太軟弱。我很有信心。我運動好。又食得又賭得又飲得又吹得又講得！我只看我想看的。我不會看輕自己。如果我這樣，如果我自尊心低，我會成為一個半途而廢的人。你自己選。做老大還是做跟班。」（粗體為作者強調部份）。

我們的陽剛體現和關聯性是否引發了這段驚人的劇本？我們的受訪者提供了如此豐富的材料，但同時在表達上卻有所抵抗。我們注意到這種感性，便以迂迴的方式詢問 Joey 的退休計劃。「我的餐飲生意每月賺幾千美金，」她說。「足夠過得逍遙自在。當然，會擔心老婆生病要去醫院，但目前的彈性工作時間很好。」Joey 沒有錯過調侃我們的陽剛特質的機會，她說：「我不像你們兩個，被僱用幫人打工。沒自由和沒得選！」

陽剛展演性和情慾

「我覺得我比他帥。我愛的只是那輛電單車，不是他。」Joey 這時比較適應訪談，她的臉因長晝的沉重濕氣和酒精而泛紅。Joey 開始詳細講述她的風花雪月，其中包括至少兩段異性戀關係：一段是在日本做夜總會小姐時與一名日本男孩的關係；他們經常一起穿 Giordano 西裝。「像兄弟般的情侶」，她告訴我們。另一位是她女兒的父親，Joey 在十七歲時與這個男人發生關係，但誘惑她的是男人的 Kawasaki 電單車，而不是男人本人。Joey 的女兒現在四十多歲，但 Joey 從未與女兒的父親有過聯絡。⁴ 倒是，她說與自己的老婆已結婚四十二年。

關於 Kawasaki 電單車，我們作了點研究才知道，它以外表狂野的越野車款而聞名，售價高昂，擁有一輛 Kawasaki 電單車無疑能增加一個人的陽剛資本；至於 Giordano，直至 1980 年代末都是亞洲的高檔服裝品牌，專售男裝。我們記得這個牌子標誌性的「青蛙」商標，就好像是我們少年時崇拜的年長 butch 身上佩戴的陽剛特質徽章。當時城中最時髦的 butch 們的必備服飾，對現在的 Joey 而言，則是他們光鮮的陽剛特質之再現。對我們這些稍後於 Joey 那代成年的人而言，Giordano 在 1990 年代亞洲金融危機後已淪為大眾市場品牌；年齡和階級的轉變，使得 Joey 的陽剛氣質顯得質樸自然，但光芒不減。

4 她回憶中，只有在為女兒辦入學註冊需要她的身份文件時才聯絡她。

我們敬畏地聽着 Joey 細數自己為數眾多的露水情緣和幾段認真的關係。「我到處混，算上一夜情的話，沒有一百也有五十個女朋友。交往超過一年以上的，大約十個左右。我覺得自己有四個好老婆。她們現在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可以隨時打電話跟她們聊天。」Joey 沾沾自喜地說着，微抬下巴，彷彿在詢問我們是否也過着類似多姿多彩的情慾生活。

相比之下，兩位研究者只有幾段長期關係，即使將二人的情慾經驗加起來，相較於 Joey 過去經驗，也只是可悲的九牛一毛。但是，作為公開的酷兒女性主義學者，為甚麼我們會被陽剛展演性所吸引並且思考「數字」呢？我們自責並開始作理論分析。Denise 翻看她的田野考察筆記並發現以下內容：

我經常被「有多少個女朋友」、「可不可以介紹女孩子」這種問題考驗。如果我的回答不盡人意，我的陽剛特質就可能岌岌可危。我已經習慣了在進行田野考察時被受訪者打量。我將之理解為在研究中建立酷兒親密感的一種另類取徑。

Shawna 的反思是：

也許這是因為我對自己的身份認同的依戀——身為一個受過教育、有責任感和尊重他人的陽剛個人。抑或者這是我內化的儒家君子陽剛特質，而我現在才意識到！受訪者的關係點算聽起來就像是情慾征服，我感到不適和自我批判，因為它迫使我重新審視這些對自我的理解。

女性主義的情感理論（擴展了「交織性」的概念）告訴我們，身份分類——無論是種族、階級、性別，還是性相，都「考慮到身體之間的事件、行動和遭遇，而不止於主體的實體和屬性」（Puar, 2012, 58）。從這個角度看，這些不斷轉變的沾沾自喜、敬畏、失敗和不適之感，不僅源於那些定義受訪者和我們自己的交織身份分類，亦源於田野現場的情感表達——產生自研究遭逢的事件空間，其中，我們的研究者主體意識受到我們的陽剛體現、午後的新加坡式炎熱和啤酒的影響。那麼，這對於「認識」年長女同志的生活有何意義？

想像陽剛特質和知識生產

我們嘗試記錄新加坡年長女同志的生活，這些女同志談到了特定歷史時刻、過去的特定事件和當下的情感關係，他們的故事代表了上述事件，也受上述事件所模塑。我們的研究旨在通過收集亞洲地區一個極度「不被看見」的年長女同志群體的口述歷史，對建立一個亞洲酷兒歷史有所貢獻（Tang, 2021）。

我們在收集新加坡地區的年長 butch 的資料期間，注意到一種性別互動的滿溢。酷兒女性主義的方法論強調我們要傾聽和擁抱田野現場內不斷轉變的情感表達，因此我們捕捉在研究現場，那些「空氣中隱約感受到的微妙變化」。受其引導，開始追蹤一種頑皮地盤旋在我們的訪談邊緣的陽剛動態，誘發訪談文本本身獨有的知識與理解。陽剛特質中有一股「活力」，難以捉摸卻又滿溢在研究者和受訪者之間的陽剛體現的互動。

我們試圖展示的這種「陽剛動態」不僅僅是性別身份表達，這種表達受我們研究互動雙方的不同社會位置如年齡、階級、種族和性相的權力關係影響；它也是我們在與彼此的社會性和關係性、與當地脈絡的糾纏中，性別化體現的混搭。我們的民族誌片段和我們的個人田野筆記，記錄了我們受訪者的生活描述，以及當他們敘述生命故事時，沿着敘述邊緣滋生蔓延的陽剛動態。

如果因為我們的回應不盡人意，以致 Joey 在訪談全程保持沉默，那會怎樣？如果藉由陽剛特質體現而產生了立即的「同一類人」(kinship) 的認同，導致對方期望過高，這種認同感會否很快就因一個不合格的姿態而瓦解至無力挽回？如果我們沒有順從地以「弟弟」的身份接受 Aden 的建議，那會怎樣？我們在與受訪者互動的過程中，修復和合理化了多少錯綜複雜的陽剛特質，這又如何影響對他們故事的傳達和接收？是我們的陽剛體現中的甚麼，鼓勵了我們的年長受訪者無所顧忌地與我們暢談他們的性生活？當 Aden 說「跟女人做愛的快感不在於她和我做。而且她們大部份根本不懂怎麼做。我愛的就是這樣，由我做主導」，她假設我們會「懂」。Joey 覺得我們太拘謹，想帶我們去夜店見識如何「跟女生們玩得開心」，這是意想不到的資料收集良機；但我們兩個對此感到困窘。我們如何解釋研究過程裡的沉默無語和高聲笑鬧？

在本文，我們不想止步於講述我們年長陽剛受訪者的故事。說出故事，特別是少數族群主體的故事，通常被理解成對

特定生命的生活現實「賦予聲音」的行動；這無疑是一項重要的政治和倫理事業。如果這些聲音超出言詞所能表達，那麼這個「新」敘事的輪廓會是甚麼？它們在知識生產中扮演了甚麼角色？我們的研究經驗證明，研究者和受訪者的陽剛體現以及它們之間的動態交流，就是這個「新」敘事的輪廓之一，它生產情緒、感受、強度、想像力、現實和幻想，這些都是，或可以是，「消失的」年長女同志的生活。

原文出自：Tang, S. & Tang, D. T. S. (2021). Not man enough! Queer Asian masculinities at the field site.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30(5), 573-583.